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

第
35
辑

周谷城题

文作忠藏书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5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 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2 字数/170,000

版次/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彭德才

HC 10/20

编辑说明

一、为了纪念湖南和平解放40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湖南和平解放》专辑，即《湖南文史》第35辑。为了体现“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性质，该辑侧重反映了湖南解放前夕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起义的亲身经历。

二、自1980年以来的近10年时间里，本刊已先后刊载有关湖南解放的文章130余篇。均在本辑附列目录，供读者参考。本辑都是今年征集的，凡与已刊文章内容相同者，这次皆未收录。

三、值得一提的是，对湖南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而今依然健在的一些老人，他们或东走台湾，或远居海外，故本刊对他们反映这段历史的文章征集不多，深感遗憾。我们热切盼望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能给本刊提供这方面的史料，以补不足。也盼望省内外有关人士继续撰写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本刊将陆续予以刊载。

四、对一时难以核实的史料，本着尊重作者原意和多说并存的精神予以保留。因所刊内容主要依据回忆，难免存在一些差错，恳请读者予以补充订正。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

我所了解的湖南起义	唐鸿烈 (1)
保护程潜的“应变计划”	程 杰 (20)
和平解放中的片断回忆	程岑华 (23)
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活动纪实	陈云章 (27)
唐生智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一些活动	唐仁受 (42)
陈明仁起义前后	唐生明 (55)
起义中的傅正模将军	韩子庚 (63)
回顾解放前的一段斗争历程	萧 艾 (68)
我所知道的省保安司令部起义经过	陈伯钧 (76)
省保安第二师的起义	周笃恭 (91)
保安第三团起义经过	谢德铭 (96)
省水上保安总队在长沙起义前后	肖伯良 (103)
省防空官兵集体起义记	万 万 (107)

我率三〇七师起义经过.....	张诚文 (111)
在湘国民党部队起义后.....	陆承裕 (119)
安化解放纪略.....	黄一俊 (126)
许新猷在岳阳起义.....	许子行 (132)
陈采夫与常德解放.....	陈克理等 (137)
我到益阳前后.....	陈扬汉 (143)
到湘南策动欧冠起义.....	肖如柏 (148)

历史文献资料

既不殖财亦不植党 决以政绩以谢乡人

程氏在欢迎会致词(1948年7月25日).....	(153)
对共党所提八项条件程主席发表意见.....	(154)
对共党八项条件 程主席表示态度.....	(155)
今日湖南应变的总方向	
——程潜主席4月11日发表书面谈话(摘录).....	(155)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四野继续南进的方针的指示.....	(156)
周恩来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我方反美反蒋问题给乔木①	
电(摘录)、(1949年6月2日).....	(156)
程潜：备忘录.....	(157)
毛泽东给程潜电(1949年7月4日).....	(159)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一).....	(160)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长沙作战的部署.....	(161)
维持安定与保存元气 程主席信心坚定如故.....	(161)
林、罗、肖、赵关于我与程潜谈判情形给军委电.....	(162)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二).....	(163)

陈代主席训词(1949年7月22日)·····	(164)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三)·····	(165)
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程潜将军和人民站在一起	
通电全国呼吁和平(1949年8月3日)·····	(166)
程潜为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致毛、朱、林的电文·····	(169)
林彪、邓子恢转程潜来电(1949年8月4日)·····	(169)
林、邓、肖、赵转李明灏等来电·····	(170)
程主任发表告湖南民众书(1949年8月4日)·····	(171)
程潜发表告将士书(1949年8月4日)·····	(177)
陈明仁发表文告(1949年8月4日)·····	(179)
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1949年8月4日)·····	(180)
唐生智等通电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号召	
完成全国解放事业(1949年8月5日)·····	(182)
湘全省在乡军官会拥护程潜将军通电·····	(184)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	(185)
陈明仁就任通电(1949年8月5日)·····	(185)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四)·····	(186)
中共中央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五)·····	(186)
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复电程潜、陈明仁·····	(187)
程主委与解放军和协代表团 书告湘省起义官兵·····	(188)
陈明仁急电毛主席(1949年8月12日)·····	(190)
毛主席答陈明仁电(1949年8月13日)·····	(191)
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复程潜、陈明仁·····	(191)
程、陈复电毛主席、朱总司令(1949年8月19日)···	(192)
程潜将军离汉北上前答覆记者七项问题·····	(193)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特别邀请代表陈明仁	
发言(1949年9月25日)·····	(194)
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给林彪的指示·····	(194)

北京归来（1949年10月21日）……………（200）

毛泽东给林彪、邓子恢、湖南省委的电报

（1949年10月31日）……………（202）

大事记与篇目

湖南和平解放大事记……………（203）

本刊曾发表过的和平解放史料篇目……………（214）

补 白

苦难湘人要和平……………（67）

解放前夕的长沙学运……………（75）

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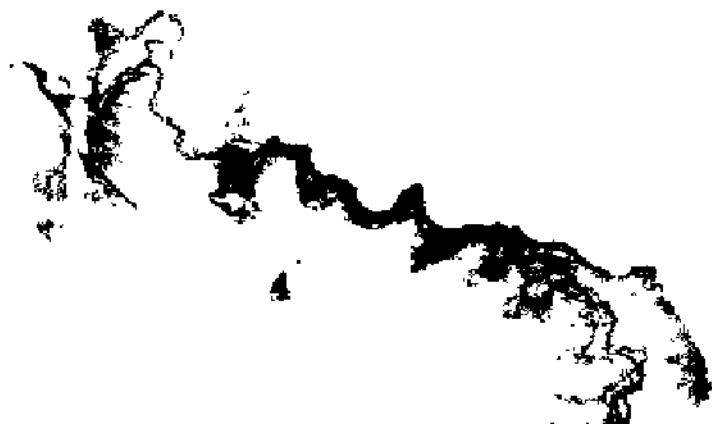
《庆祝长沙解放》……………（106）

议长选举内幕……………（118）

长沙市和平促进会……………（147）

衡宝战役……………（152）

湖南和平谈判……………（220）



我所了解的湖南起义

唐 鸿 烈*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了。在湖南举起义旗以前，当地一些军政人员虽曾各寻门路，互找关系，密谋起义活动，然而无一不以程潜马首是瞻，因此程潜本人的态度和活动举足轻重。本文仅就我亲身经历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叙述程潜密谋起义的一些史事。

在1948年夏以前几年之内，蒋介石历派亲信先后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籍隶湖南的军政人员却始终无法染指，相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以致“湘人治湘”的呼声，又盛极一时。程潜曾受蒋介石的打击、排挤，于1948年3月间又遭胁迫，中途愤愤放弃副总统的竞选，迫不得已领取了蒋所补续的一笔竞选费用之后，只得退而求其次，自愿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程潜向蒋力保湖南人李默庵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期控制该省军政大权。由于李系广州讲武学校学生又是蒋黄埔弟子，是蒋亲信，又出自程所保荐，大可籍此以避嫌，不料已为蒋所摒弃息养于上海的贺贵严，纠合赵恒惕等联名函蒋坚决表

* 唐鸿烈当时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

示反对；建议起用资历较深的湖南人。于是蒋采用陈诚之谋，度以另一亲信、黄浦弟子、湖南人黄杰以代李，征求程潜的意见。程与邓介松和我等商议，一致反对陈诚插手湖南，认为李既不成，力主程潜本人乘此机会“当仁不让”，亲身顶替，以为抵制。力求缓冲，可请另委李、黄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并兼其他实际职务，以辅助于程，将来看谁适当再保谁继任。计议妥定，经程潜面蒋提出后，蒋只得同意。因此，中央政府明令发表程潜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并以李默庵、黄杰任该公署副主任，且派李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驻于湘西常德，黄兼第五编总司令，驻于湖南衡阳。其实，程荐李、黄两人以为辅佐，蒋正好利用他们以牵制程潜，尤其是程的出任，既为权宜之计，终将落于李、黄任何一人之手，也正切合蒋之心意。加之程挺身而出，李、黄两人相形之下，以程究系湖南的老前辈，也只好暂为退让，容忍于一时。

援“一朝天子一朝臣”惯例，湖南省政府各厅、处长人选，几经商酌，始以程潜原所属武汉行辕秘书长邓介松连任省政府秘书长。经邓介松建议，以与邓原同为改组派后被CC所拉拢，曾助程潜竞选副总统的邓飞黄为民政厅长。又接受唐鸿烈建议，以与程原有历史渊源、在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色彩尚不明显而有一定业务技术能力的王恢先和李维城分任建设厅长和省银行行长。其间，三青团方面对邓介松出任秘书长不满，因其在竞选立法委员中虽经失败，但接近CC，曾派军统特务杨继荣面程表示异议。适我在座，向杨指出：“秘书长系一幕僚人员，向随主管共进退，主管自有权衡，任何方面不能反对，否则这个主席很难干下去。”程亦赞成我的意见，坚持邓介松任秘书长。程遂指我为私人代表与行政院联系，因此又接受我所建议戴朝震任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其他厅、处长，程意暂维原状，事实上各有背景，一时实无法更动，抵任

后始逐步调整。

自程潜抵任后，宣扬以“确保治安，开发经济，加强建设，兴办教育”作为所谓施政方针。由于程素不满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经授意邓介松等策动省参议员改选我父唐伯球（时任副议长）为议长，以排赵。程潜又感于省防空虚，地方治安武力单薄，除督促整编地方保安团队并改编其中一部分为第一、第二保安旅外，其后屡电中央政府在湖南成立新军。当时陈明仁已经失宠于蒋，心怀不满，被白崇禧拉拢。先充李宗仁代总统时期总统府参军，旋随白崇禧任武汉警备司令，始终并无实际兵权。因陈与程潜既系醴陵小同乡，又出自广州讲武学校程氏门下而后转入黄埔军校，相互关系较深。经程向白商调，白为利用陈以插手湖南，使其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地位进而控制湖南实际兵权，所以同意将陈调任第一兵团司令，驻于长沙，并由程派兼长沙警备司令。由于黄埔第一期所谓“老大哥”李默庵、黄杰以及陈明仁先后返回湖南，同学带同学，老大哥带小老弟，从此出身于黄埔军校各期的“黄马褂”纷纷“荣归故里”，既集一时之盛，又显赫于当时。就以这“黄埔三巨头”与程潜关系而言，陈最深、李次之、黄更次之，但他们仍各拥有实际背景和靠山，因而互争雄长，各以湖南省候补省政府主席自居，而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在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中，陈明仁以掌实际兵权虽于1948至1949年间，一再为白崇禧向中央政府力保继程潜之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但陈究感大势所趋以与程潜密谋湖南起义，终于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同时举起义旗，投向了人民；而黄杰则于建议撤销总司令兼职之后，奔台湾走广州，始终顽固不化，终于1949年8月间为陈诚力保出任最后一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招兵买马于湘西沅陵，不及一月，亡命于台湾；至于李默庵，原于建议撤销所兼绥靖区司令后，坐以待变，然日见形势逼人，转

面白请参加起义，竟于湖南起义前出走香港。

二

1947年冬开始，人民解放军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先后解放黄河南北各地。湖南在抗战八年期间深受日本帝国主义浩劫、摧残，胜利之后连年天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间，我曾向程潜游说，坚主反蒋联李（宗仁），促使和平。因又奔走于李宗仁之门，来往于南京、长沙之间，从事反蒋联李的活动。时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名义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主张，实则逼蒋下台，拥李宗仁登场，从而抬高挂系权势。程潜感于湖南实际情况既不可战，也不能战，故电蒋响应，力主和平。后蒋“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我遂又陪同程潜一再前往南京商谈所谓“和平大计”。当时在蒋方面原只利用和平为幌子，争取喘息于一时，企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在李方面则以挂系实力为基本，企图保持残余势力，以待价而估。至于程潜，在与我商谈中，认为“只要使人民少受痛苦，一切和平条件皆可商谈、接受。”但是由于蒋明为“引退”，暗则在幕后操纵、调动一切，经过各方面商谈，尽管已就所谓和谈代表团人选大体上达成了协议，然而实际上并无和谈诚意。尤其是行政院长孙科，当时公然宣扬：“既要惩治战犯，就万万不能接受。”事既如此，名为和谈，实则反对和谈，所以孙科坚决主张将中央政府迁往广州，行政院即首先带头迁动。

自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在长沙因既不满现状，又感大势所迫，曾密劝程潜步傅作义后尘，等待时机率部起义。由于程潜当时亦列名为战争罪犯之一，对党和人民惩治战犯深所顾虑，曾经对我说过：“你们监察、立法委

员也是战犯，这不是儿戏。”我闻之，虽亦有所疑恐，但知傅作义起义后并未闻加以惩办，心想“如果惩办起义人员，那还有什么人起义？”因建议先约李达同志一谈，试探一下情况再说，程同意。我拟乘前往南京参加监察院会议之便转往上海寻找中共组织。

自我去南京临时被推负责监察院所组织“国家财物清查委员会”工作之前，曾一度去上海，适与商船学校校长周均时遇晤。相互商谈，彼此感于大势所趋，相约周返重庆原籍、我返长沙，分别策动起义。其间，周曾邀我同往会晤当时寄住医院的邵力子，我以知邵并非党员，婉言谢绝。周即赶乘班轮回川，我则应邀迁住其家，于清查工作告一段落后争取监察院疏运包机先去广州，随即转回长沙。据方叔章告，程、李(达)会晤，李曾劝解程的顾虑，并建议召其子程博洪自沪来长，认为可能有所帮助，程已接受，但对惩办战犯一点，仍有所顾虑。后程博洪果一度来长沙，劝其父将醴陵所置田产交与农民。

不久，中央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传闻中央政府最后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因而和谈宣告破产，南京解放在即，李宗仁返回桂林老家。在程潜与唐伯球、邓介松、方叔章和我等先后商讨局势中，我已见长沙街头巷尾贴有“打倒刮国民党”、“打倒刮民政府”等标语，且认为李宗仁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留守桂林走局部和平道路，另则仍去广州与蒋合作。察其情况，去广州成份居多。因此建议程唯有走局部和平道路，等待时机宣告起义。但程认为有选派一人前往桂林，一探李宗仁真实态度的必要。事后，邓介松物色当时赋闲在长沙的闽系湖南人苏民，说明只是前往了解李宗仁态度。后据苏告，李已决定即去广州仍代总统。事既如此，桂系何去何从已一目了然，自不能再对李存丝毫幻想。经我自告奋勇并得程潜同意，代表程前往香港通过我与黄绍竑的关系，与中共华南局乔冠华联系起义事

宜。乔当即表示欢迎，并交代政策，以解除程的顾虑。自我汇报后，程确已逐渐消除顾虑。由于唐伯球感于程潜在湖南往往以“家长”自居，人多远之。当时赋闲居家在宁乡的周震麟、在东安的唐生智、在长沙的仇亦山等虽亦反蒋，然与程潜各有不同程度隔阂。为求统一意志，加强团结，有利于湖南起义计，经与邓介松和我商妥并得到程潜的同意，决定由唐伯球往访唐生智。唐伯球等人商议，由陈云章接唐来长，共商起义大计。旋又由唐伯球亲函周震麟，痛陈局势，说明利害，劝与程合作，共策大计。周亦函覆表示同情，惟称因病一时不能来长。此外，由唐伯球和我父子分访仇亦山疏解一切。据仇告我，他已接匿名函作力劝他“认清大势，靠拢人民”。他也认为唯有起义，才是出路。之后，仇向我提出请为其婿钟少祥代谋工作，经我向程潜说明利害关系，程乃派任钟为湖南省政府秘书。基于以上情况，当时以程潜为首所有反内战的人企求局部和平的统一局面开始形成。

稍后，在我前往广州就医期间，据曾与我留英同学、时任行政院秘书长之黄少谷告，白崇禧认为程潜年事已老，不足应变，已建议李宗仁将程免职，改任考试院长，以陈明仁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我遂赶回长沙转告程潜，但对以陈继任一节，为避免造成隔阂，秘而未宣。在我与程商谈中，知白崇禧亦曾以改任考试院长一事征询过他的意见。不日，陈明仁果然访问我，表示请予支持，我曾含糊其词。究以关系重大，乃利用李默庵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个人野心，动员他联名在湘军事将领通电反对。李为本身利害计，当即同意，即由李领衔联名黄杰以及当时驻在湘西的宋希濂等人通电李宗仁、白崇禧，拥护程潜，仍主省政。事后据李默庵反映，陈明仁拒不签署，显系利害冲突所致。自通电发出并在各报披露后，李宗仁、白崇禧迫于此一形势，自未敢轻举妄动，反而趋于稳定。

因此，以程潜为首密谋湖南起义的活动，得以仍然照常进行。

李默庵感于局势发展，形势逼人，也曾见机有所动摇，曾密向我表示：“如程潜有所决定，决随程一致行动。”经我转商于程潜，当经策定，以陈明仁驻守长沙，令李率领其所属并指挥湘南兵力守宝庆（今邵阳），以期配合策应，一俟白崇禧路经湖南退走广西时，即配合人民解放军予以侧击、追剿。因此，我即邀同李至程潜处，由李迳向程表明态度。当时李自称原系中共党员，后经背叛，为求慎重计，请程介绍他亲与中共党的负责人见面，始为稳当。程于说明意图后，命我陪同李前往香港一行，所以又陪同李至香港往访乔冠华同志。经乔与李谈话后，李表示愿在起义中立功。事毕，仍同返长沙。

不日，曾与我在大学时代先后同学的王烁然，自称代表党地下组织3130团策反于我。以我明知王在大学时代确系党员，后在相互过从中，亦知王在上海杨树浦从事工人运动地下活动，我除将湖南密谋起义情事据实以告外，并介绍与我父唐伯球联系。后又由我约李默庵，并由李邀集彭杰如、王劲修以及刘进（第一兵团副司令）等人，在我胞妹唐鸿钧寓所与王和王所约3130团另一负责人刘某（忘其字号）见面，策划起义事宜。其中所邀约的人员多与我先取联系，因我并不经常在长沙，后经商定由王烁然先与他们密取联系。王以工作关系曾经请我代觅适当住所，后经觅妥，与我所寓邻近，从此过从渐密。

后程星龄（系程潜远房本家，当邓介松在省府处境困难时，意欲利用他与程潜的关系有助于邓，经与我商议，由我向程潜提出派任程星龄为省府参事。后邓介松以加强经济建设为名在省府秘书处下设置经济委员会，经邓签报程潜派程星龄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密告我，谓已与中共省委汪某（解放后始知系指周礼同志）取得联系，我亦将已与3130团取得联系一事

密告程星龄。后据程告省工委，并不知此一组织，我半信半疑。事后与王烁然见面时，曾于便中询及3130团的组织关系，王称“该团系武汉军委所直接派遣”。我自无从查考，仍信任无疑，密取联系。

当时中央政府早已迁驻广州，阎锡山受蒋介石之命继何应钦之后任行政院长。武汉解放，白崇禧退驻长沙，桂系各路军队纷纷压境，不仅情势呈现紧张，且因征兵、征粮，更加重了水深火热的湖南人民的负担。群情激昂，长沙街头巷尾已见有“打倒白崇禧”的标语，当时还盛传“挖断粤汉路，葬送广西兵”。

白崇禧自退驻长沙后，眼见程潜并无“应变”措施，特务又从中捕风捉影，因而对程已加怀疑，竟先自督令陈明仁以长沙警备司令名义根据特务所拟“黑名单”乱捕乱押，大肆镇压。尤其是当李默庵旧属314师师长陈达经我认可，先与3130团王烁然等直接密取联系后，不料陈达竟先自行动，首先起义，致被白崇禧调动兵力将该师围剿于宁乡县莲花桥一带，仅该师程杰团因驻扎岳麓山才得以保全。事后加以改编，使白崇禧更加怀疑程潜，并因此又造成程既不满于陈达，又疑及李默庵背弃于程，擅自行动。事后经我向程密为解释，又认为我“荒唐”与“荒唐鬼”联系。如是，就不能不使我对王烁然心存警惕。

此后，由于程潜感于邓介松个性倔强，且多意气用事，外界已有所不满，深恐激成事端，经与我商议，由我力劝邓辞去秘书长职务，仍保留省府委员。我曾建议以程星龄继任，程潜感于同宗关系，先有顾虑，后亦无可。经我征询仇亦山等人意见，都认为“不熟悉情况，不恰当”。及至征询他本人意见时，则以“地方情形复杂，干不了”，无意出任。我遂商之于我父唐伯球，接受我父所建议向程推荐与程潜、邓介松都具有历史渊源的桂系中人、湖南人杨积荪继任秘书长，程即同意。

旨在利用杨与桂系的关系，调解、疏进程与白的关系，避免再遭受其压力。杨见湖南民穷财尽，群情激昂，亦认为白崇禧“操之过急”，感于程潜知遇之情，自愿为程与白之间的桥梁，竭力从中疏解。至于密谋湖南起义一事，则相约对杨守口如瓶。自杨到任后，果收缓冲于一时之效。此外，因我见当日中央日报载有民政厅长邓飞黄贪污事，邓为 CC 分子，深恐对起义有所影响，又经向程潜建议改派正在参议院内部配合工作的刘公武继任。程潜亦同意，除由我介绍刘与程见面外，我曾自告奋勇先向邓飞黄劝说请其自动辞出民政厅长职务。当时邓对贪污一事力为辩解，表示“决不自辞，除非将我撤免”。程潜深恐引起事端，不仅作罢，且加慰勉。由于我从中力劝邓介松、邓飞黄各自辞去所任职务，都因此造成两邓与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邓飞黄竟向外谣传我在于猎取民政厅长职务。

其间，曾与我熟识的工商业者曾诚意介绍党员刘润世与我父子相见，进行策反工作。在与我先后联系中，我密告李维城，使我的妹夫章劲伯认清形势，随同程潜起义，并嘱章劲伯做好省银行财产、物资、文卷等保管工作，以便日后移交。

当时湖南省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已无法维持，程潜除责成省银行行长李维城设厂自铸银元，以应急需外，并派我持程函件前往广州面晤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设法接济。因此，我又不得不以监察委员身份来往于长沙、广州之间。我在广州曾访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及阎锡山转达程潜要求，并说明情况，当允设法。事后在门首适与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遇晤，据告外界传说程潜“态度不稳”，试图从我口中得到真实情况，我满口否认。不日，李宗仁约我谈话，阎锡山也在座。李就程潜态度一事盘问于我，我力加掩盖并多方解释，表示绝无其事，且谓：“程颂公为党国元老，历来忠党爱国，且已名列战犯，如有流言，必系特务从中谎报邀功，或系他人别有用心。”我观察

李、阎颜色，似已收获相当效果，乃进一步提出如程仍有怀疑，则请阎锡山亲往长沙一行，以明究竟。”阎当即表示即可拨款并加赈济，并说：“抽不出时间，难于成行”。于是，我提出是否可以派贾景德代表前往，以为理直气壮，虚张声势。李宗仁表示同意。事后贾果通知我，谓即动身前往长沙，希望陪同一行，并请代邀其故旧方叔章在长沙一晤。我即以长途电话密告程潜并请转知方叔章妥为布置，以免泄露。

后我陪同贾景德乘专机携带款款抵达长沙，经程潜召集省府有关各厅、处长向贾汇报“施政”情况，贾当场表示满意，仅在长沙居留一日夜，又邀我同返广州。我因已与程潜商议应否派一代表前往北平接洽起义一事，尚须去香港征询乔冠华同志意见，所以应邀同行。在途中，贾忽又提出：“我看程颂公意态正为消沉，”又加试探。我加以辩解说：“时到今天，谁不消沉？我看阎院长也很消沉。”贾于是也有所感慨地说：

“今天真是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请转告程颂公放心，他和我阎院长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他的诗我是一向钦佩的，他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没有不想法子的。”至此，我认为已经水到渠成，无庸顾虑。事后行政院果已请发湖南省政府一笔经费，勉度一时难关。

我在广州期间，曾晤及原在英国先后同学现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他以湖南大学校长一职虚悬已久，意欲我接任，且经表示如有任何困难，一定代为解决。我感于湖南不久终肇起义，实已无意增添此一负担，且告“早已无意做官”，加以谢绝。但杭坚持，并容我考虑。后我转往香港向乔冠华同志汇报情况，曾要求电告人民解放军早日直逼长沙，以便配合策应，及早采取行动，并询是否可以派一代表前往北平。乔未加肯定，只是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旋我就应否就任湖大校长一事征询乔的意见。乔认为：“即可以团结一部分人，也可

以避免落在他人之手。”我亦以为然。

我在香港曾访晤黄绍竑，黄告正组织在港有关人员于必要时通电起义。并谓：“倘程颂公在长沙处境困难，盼来香港则由程领衔发表宣言”，再嘱我代为转达。后又晤章士钊，章将所拟以和平代表名义致李宗仁电稿一份嘱我带回长沙送程一阅。该项电稿经我存放在我的手提皮包内，自香港返抵广州匆匆下飞机时，竟将提包落在机仓内。事后发现，通过监察院秘书处派员向特务组织“机场检查站”索回，经加检视似有所翻动，但幸未遗失。

我在广州除向杭立武表示可以接任湖大校长职务外，曾就便参加监察院会议。事后应新闻记者之请发表对有关时局的谈话，原来语意双关，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有所讽刺。不料返抵长沙后见当日中央日报上刊载中央社所登电稿，竟然擅改谈话内容，以为假籍利用，反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帮腔。气愤之余，经自行另写一稿表明“一切应以人民利益是从”，亲交由湖南省政府新闻处刘伯谦印发各报、分别发表。

后我将章士钊所拟电稿送程，并向程潜汇报此行情况。由于白崇禧在长沙一再采取压力，催促采取所谓“应变”措施、当经进一步商定先由省政府秘书处指派少数人员将省府重要文件、档案、器材等疏运宝庆（今邵阳）待命，必要时为避免白崇禧加害程，即率领必要人员退驻该地暂避，一俟白退出长沙，然后赶回通电起义，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但程感于李默庵原已应允驻守宝庆布置指挥，而李遣送眷属去香港尚无返长确讯。以宝庆地区关系重要，一时难以物色其他适当人选，程颇为忧虑，也正愤慨。我当即表示亲往香港一转，促其速返。旋又谈到派遣代表以及湖大校长问题，程基于我自愿，拟派我一行，然未肯定，至于湖大一事，始知行政院已经电程潜征询意见，程已电复表示同意。我为慎重计，曾又

将此事告知程星龄，请其转为征询省委意见后，再作最后决定，程允为转达。

其间我曾将黄绍竑的意见转达于程潜，适唐生智在座。我建议程未当不可以就医为名前往香港一行与章士钊一谈，湖南之事可请唐生智暂代处理一时。程未置可否，转而注视于唐生智。不意唐生智竟对我说：“这不好，我不行，你老太爷不会有这个意见，即有也应该说清楚。”我于当时即感突然，又为诧异，一时竟无词以对。我为息事宁人计，并未向程作任何解释，也未转告我父。事后思考黄绍竑用意固属不利于湖南起义，然而却完全没有想到竟因此造成程与我父子之间的误解。以为我父子背弃于他，转而拥护唐生智，其实并无此意，再事实也不可能。

稍后某一日，我为派遣代表一事，拟与程潜再作进一步磋商。当我刚走进省府办公楼适与杨积荪遇。我顺便至杨的办公室一谈，忽闻有一人高声询我：“听说你要上北平当代表，什么时候动身？”我深以为异，且当杨之面提出，更为一惊。细看此人原为邓介松亲信、曾任过县长的余如愚，我当即否认并加威胁：“倘再造谣生事，一切后果唯你是问。”杨见我气愤，亦加告戒“万勿乱说”。余遂不敢声张，唯唯而退。事后我与程潜磋商时，由于我再三考虑结果，既已与华南局以及省委取得联系，加以交通不便，建议不必再派人前往；程亦同意。我深恐程有所顾虑，并未反映余如愚之事，仅曾询及是否将此事告知他人？程说“没有”。但我自审仅与程一人商谈及此，且未肯定，何以余如愚了解？不无所疑。事后与我父谈及，依他判断，邓介松当时已返湘乡原籍，并不在长，程应已与程星龄商谈，事必为他传出。并告：“我近来发现程星龄相当利害，应当注意。”且谓余如愚自被撤职后，已在省党部调查室工作，不能不戒备。”我始知余系一中统特务。言谈及此，我父又指

出：“你的同学王烁然已属荒唐，你的另一同学周匡斗又介绍我与一党员见面，不知周匡斗此人又是如何？”我父子原在家庭问题上一贯矛盾正深，我于当时见我父又连带疑及其同学，感慨之余，除说明周虽非党员，但决不是坏人，与党联系并不在于介绍人，劝仍大胆放心先与党员联系外，又经力劝我父将他所有田产尽数交与所种农民，以解脱地主身份，并将在香港市面所购有关党的书册捡了几本送请一阅。当时我父虽亦认可，但事后据我所了解究为我姨母所阻，未能实现。

由于白崇禧在长沙采取镇压手段，严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大肆搜捕，受难者大有人在，中央日报社长段梦非，民族资本家曾诚意等即先后被捕下狱。我除曾设法营救，终于配合其他方面力量幸免于难外，我曾密告程潜：“如陈明仁果系被迫确有困难时，最好劝他无论对任何人都应该采取明捕暗放的办法。”程答：“这个办法很好，等我想办法向他讲。”事后传闻似已收到一定的效用。

我为催促李默庵从速返长一事，本拟即去香港，奈为病所羁，稍愈后始成行。行前曾至程潜处将章士钊所拟电稿索回，以便带回交章保存。事后正上飞机时，适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与程星龄两人下机，交谈之下始知他们两人为起义事同去香港访晤乔冠华。我即追问情况如何？刘谓“与你所谈所知尽同”，而程星龄在旁始终一语不发。我上机后辗转思考，以从未闻程潜告及他们二人去港之事，不无所疑。我自抵港后，恰在公共汽车上与乔冠华相遇，经乔建议下车在附近一咖啡馆内交谈。我择要汇报情况后，乔要我速将湖南军事配备情况写一材料送至新华通讯社他本人亲收，并告他不久即前往北平，此后可与该通讯社总编辑曾同志（已忘其字号）联系。我将章士钊所拟电稿失误之事简略告知乔，乔说：“应提高警惕。”我内心深感愧悔。

由于我对湖南军事配备具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经先向李默庵充分了解并经核对后，曾就兵力包括番号、人数、武器、弹药配备情况，分驻地点以及作战能力等分项从详开列，妥为密封后亲自送至通讯社，适乔不在，经取得该负责签章的收条而返。旋又赶至李默庵处，就我观察所及，李在港已租住一门面堂皇的住宅，布置华丽，显系富有，亦非临时打算。在相互交谈中，我再三劝其速返长沙。而李却自称在黄浦一期中历来地位在黄杰以及陈明仁之上，表示愿在长沙协助程潜，应将陈明仁调往宝庆。我晓以大义，且经指出宝庆比长沙地位更重要，日后大可配合人民解放军侧攻白崇禧部，应为立功大好机会。经我一再催促，李始允稍缓数日容将家事处理妥切后，即行返长。但李默庵直至湖南起义后仍未回返。

我在香港曾利用机会访问原居长沙、临时迁港暂避的程潜夫人郭翼青。郭告在港正感寂寞，力劝我亦将老母、爱人以及幼小子女暂时迁港，以免她们在兵荒马乱中遭受惊吓，同时彼此也多一照顾。我以个人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为词，加以谢绝。郭却进一步地说：“你姨母有钱，请你转告她，我希望她来；我们两亲家彼此好作伴。”我只是问：“你们怎么是亲家？”郭说：“我的女儿拜她做干妈，你还不知道？”我始释然。

在我离长期间，白崇禧又更进一步既对程潜、也对我父唐伯球采取压力，一再督促组设“湖南省人民反共委员会”，指定由他们两人负责主持。我返长经将联系与催促李默庵返长情况分别向程潜汇报后，并向程询问何以组设此一机构。程告为形势所迫，经程星龄请示省工委同意敷衍一时，“只挂名，不做实际工作”。但白崇禧却利用这个招牌，通过种种关系，指使一些反动分子和特务进行罪恶宣传活动。当所谓委员会开会时，如程不出席，则推由唐伯球主持。当时唐伯球对程既有怨言、也有顾虑，认为“将来一河水也洗不清”。我曾根据程

潜所告加以解释，并经建议：“如颂公要你主持时，你也要代去，这样一个一个地推人代下去，就更加显得形同虚设了”。

其间，我妻告我：谓王烁然向他要了50担谷子，还是临时花钱买来送上，认为如系党的组织何以只差这一点。我父在旁闻及也就接着说：“我看此人靠不住，我是不和他联系了。你別害我。”我于当时虽亦为异，但认为也可能是一时接济不上，也可能是他私人有所图，为了起义，曾力劝父亲仍与联系，当然也应该提高警惕。

当时所谓3130团王烁然以及刘某等通过我以及我父唐伯球的关系，确已与一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发生了联系，也做了一些工作。该团究系何种组织，与党有无关系，因为我从未再作进一步了解，至今仍然不太明其底细。

又于其间，我见长沙《中央日报》载有湖南大学学生20余人联名宣言，云唐鸿烈并非著名学者，故反对接长该校。给我了解，原系校教务长易鼎新、理学院院长扬卓新早经活动竟任校长职位，自闻我即将出任校长，经策动其亲近学生联名表示反对。此在旧社会本为司空见惯，我在当时见既有人反对，而反对之人究非特务一类，加之观察当时程潜态度深恐我在被人反对声中出任校长连带受累，尤其是自我托由程星龄请示省工委后，并未见复，乃毅然径电杭立武请辞，决不就任。后经程潜因势疏导，教育部始派易鼎新代理。

在以程潜马首是瞻的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密谋起义中，除如以上所述各节外，据我父告我段梦非已受《中央日报》地下党同志所策反，方叔章自称以及就他所知曹伯闻已与党取得联系，唐生明告诉我已架设电台直通北平与党取得联系（我于当时半信半疑），程星龄也自称通过某人与党取得了联系。邓介松自接受我劝告辞去秘书长职务后，即心怀不满返回湘乡原籍，久久始来长沙。有一次邓曾告我，谓萧作霖正在联络组织

市面游行示威，以反对白崇禧更进一步地迫害，效用不大，反与起义不利。经告邓转劝萧，不可猛浪从事，后果作罢。此外尚有人向我自称已与党取得联系者，如刘伯谦等是。至于一时找不到门路，也大有人在，总之各显身手。我将所有情况先后密告于程潜，由于他们有的与程各有一定的渊源，有的即系程当时的部属，因而先后多与程或有所联系，也还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我在内却无一不是迫于大势所趋，互找关系。

三

白崇禧久留长沙不走，湖南人民莫不切齿痛恨。

由于特务告密，白崇禧曾经邀请约我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谈话。我以过去与白并无渊源，明知有异，但自持为监察委员、依宪法规定不经监察院同意决不敢有所加害，因而敢于应约前往。果不出所料，白对我几次去香港，多方盘问，并谓“你是监察委员，又是颂公的代表，你的行动关系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答：“纯为私事去港，不能说一去香港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并说：“监委也是战犯，任何人决不致于视生命于儿戏。”最后尚假籍其词劝白应尊重程潜的职权，一切事最好通过省主席。而白于当时却一言不发，我遂乘机告辞，转往省政府访问程潜，适唐星等人在座。程正在陈述白崇禧一再采取压力，深以为苦。据唐星告白已作疏迁准备，认为白必退守广西无疑。因此，大家认为局势发展已接近天亮，其间，程忽告我谓：“白健生（白崇禧）昨夜在这里谈起，对你正为怀疑。”我即答：“刚刚他找我谈过了。”唐星在旁即插一句：“这不要紧，谈过了就完了，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知唐星原与白崇禧早有渊源，后闻刘斐又有所撮合于其间，且传唐星在长沙与白尚有过从，既如是说，更为放心。我唯恐有所驾援于在座人员，并未详谈经过情况，后各自离去。

后传闻人民解放军已向湖南进军，白崇禧调动频繁，长沙城内形势，又呈现紧张。某夜白又传见我，不知何所根据而断定我与党有所联系，并指我在湖南“图谋不轨”，并嘱立即转告程潜自动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明仁接任。当时，尽管我力为否认，概不置理。我尚有所恃而不恐地说：“我可以转告程颂公，但不能凭白加罪于人。”我告辞刚走出白崇禧房门时，眼见陈明仁从另一房门匆匆而入白房内。当时依我判断，应已转知于陈，或于以加害，或嘱其准备就住，或兼而有之。我仍力持镇静转往程潜处。我念程年事已高，未便因此而使程对我有所忧虑。仅称白对我有所怀疑，嘱即转告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明仁接任。并经询程：“陈明仁究竟是否可靠，否则不辞。”程谓：“这很难说。”但表示决即摆脱此项职务。程为使陈明仁安心计，即召见陈，告以自愿让出，嘱即准备一切。我于陈尚未到达前即行辞出，是夜暂避其妹寓所。几经考虑，为避免影响湖南整个和平解放大计，决定离开长沙先至广州友人家暂避。一俟白崇禧退出长沙，再行潜回。倘万一白崇禧并不先行撤走或形势不容许潜回时，则唯有去香港再参加黄绍竑的起义活动，以免不离开而遭受白暗害。计议既定，为眷属安置问题征询我妻意见。由于对人民解放军军纪毫无认识，曾坚持陪同老母以及幼小暂避香港，且称所有金银首饰以及财务无论如何可以坚持半年到十个月的生活，志愿在港节衣缩食，不愿继抗战八年历受东奔西波之苦之后，再遭兵荒马乱之惊。我虽亦同情，然感于本身留英多年所受污辱正多，不愿再寄居于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允同至广州暂避。次日清晨，我至城外父唐伯球寓所商议。我父认为白崇禧毒辣，恐遭其暗害，应即暂避，并主眷属仍以暂避香港为宜。我为钱财计，经将程潜夫人郭翼青之意转告我姨母，又征询我父意见，当即欣然同意。因此我乃对外宣扬去港，以为个人前往广州，

然后潜回而避人耳目。当日适王烁然至我寓所，由于我对王心存警惕，只是对王说：“白崇禧一再胁迫，决定去港，我的苦心 and 态度以及行动，你日后一定会完全清楚。”于是我携眷仅带简便行李分乘飞机、火车先后离长。事前我以电话通知杨积苏，仅告：“白主任逼我离开湖南，现带家眷去香港。”该杨必然告知白崇禧。

我抵广州后，先将眷属寄居经营出口商雷泽骧的东山寓所，旋往访费景德告白崇禧强迫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职务，已引起湖南人的不满，请转报阎锡山慎重考虑，企图有所挽救，以免陈明仁万一不可靠，势必影响和平解放大事。当时，据贾称行政院尚未接到白电报，也未见李宗仁有何表示。言谈之间，认为白如此措施，未免操之过急，允即转告。不二日，贾果即通知，谓已接白电报，嘱即代为征询程潜的意见后，再行考虑决定。当时我见《中央日报》载白崇禧果已先行退守桂林，依我判断，程潜应已按原订计划至宝庆暂避，因即密报程潜加以暗示，并征询程潜的意见。后获电覆，表示同意，我始知陈明仁已无可虑，所以我函告贾“程已同意”，并检附原电。随后行政院始明令发表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托由雷泽骧因事赴港之便代觅住房，一面自行携眷逃往香港设法，以便及早潜回长沙。后得雷助，方始租妥住房三间，旋即迁入。我在香港曾访黄绍竑，经相互商妥，乘我重返广州之便，策动在广州的监察、立法委员去香港参加以黄为首的共同宣言。自我赶回广州，见报载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邓文仪等已赴长沙，知与湖南起义有关，企图有所阻挠。通过报导，显而易见湖南即将宣言起义。

我为争取时间，仅向监察委员林式增有所策动。不料当晚监察院长于右任派其秘书长李某（忘其字号）密告于我，谓国防部派军法局长徐业道持国防部密函，内称我逃往香港与共产党

密取联系并在长沙策动起义等，通知监察院请将我提交军法讯办，并出示国防部原函。我察其来意尚善，即邀同林式增及另监察委员二人等同至于右任寓所，表示绝无其事，如必须讯究，为维护所谓监察职权请在监察院内或行政院内执行，绝不至国防部。林等从旁支持，予亦表示同意，并允向阎锡山提出。时已深夜，我除密请林式增将我所存监察院宿舍内衣箱一口设法取去外，请林陪同寄宿李所住旅舍内。次日清晨，我即逃至我胞妹唐鸿钧同学李粹纯所住广州市惠复路家中，托由李粹纯代购黑纱短挂裤一套，并在附近理发店改剪平头，括去原所盖胡子，化装为一小商人模样。在李家潜居一日夜，又得李丈夫高权振（当时在广州市电话局任小职员）之助，代买至香港四等轮船票一张，并送至码头。因船在夜间开航，经我自雇小船划至距离船边数尺许海面暂停，候船鸣笛即将起航时，我即催促小船划至船边爬上舱板迳入四等舱，如此得以逃过军警、特务例行检查，安然逃抵香港。不日，林式增来港，我即介绍他与黄绍竑、贺贵严、刘斐等人见面。后我在香港见报载程潜于8月4日在长沙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且已进入衡阳，始知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终于和平解放了长沙等地，心始大安。此后，我又邀同林式增并一再力劝原留香港的李默庵一同参加以黄绍竑为首所发表的联合宣言，宣告与反动政权断绝一切关系。从此我遂由国民党政府“密拿归案”，又成了“明令通缉”。自所有参加联合宣言的人员先后返回国内后，而李默庵始终留在香港。

我在香港逗留约一月有余，其间经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曾同志取得联系，并征得同意，邀同林式增乘华南局所包货轮取道青岛，于9月初抵达北平。后受张唯一同志影响，自请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班第一班学习。12月间，电召留在香港的眷属自行觅轮抵达北京，全家既重行团聚。

保护程潜的“应变计划”

程 杰 *

我曾写过《追随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一文，刊登在《湖南文史资料》上。现将当年跟随两将军为和平起义亲身经历事迹尚未发表的继续写出，以纪念湖南和平起义40周年。

1949年5月上旬，我团驻扎在长沙白箬铺。一天，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程元（程潜之子）派人送信要我速回长沙有机密要事相商，我立即赶回长沙。程元对我说：“白崇禧一到长沙，就给颂公（程潜）施加压力，逼颂公上战车，故意找岔子。白崇禧每次来省府会颂公，事先运来几卡车卫士，在省府内外满布岗哨，气势汹汹，如临大敌，真是欺人太甚，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对付这个情况？”他又说：“载英哥（程载英，程潜亲侄）见到这种情况，恐慌得很，怕颂公吃亏！一再催我请你来商量。”我说：“既然如此，建议颂公将我们三一四师调回长沙市区，作好应变准备。”我们即刻去省府见了程潜，他说：“现在把一个师调进长沙市，更会造成紧张气氛，你们要冷静，也不用怕。你们给驻守宁乡的陈达师长去个电话，要他马上来长沙，大家研究一个应变的办法，到后再调动部队。”

当天程载英来到桐荫里我的家里，他说：“白崇禧对颂公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二月间白从武汉打长途电话给颂公，要湖南极力支持他继续戡乱。颂公当时没有考虑到，如实地把心里

* 程杰当时任三一四师团长。

话说出来了，他是秉承蒋总统和平倡议在作准备，一下子扭不过来，白崇禧就没往下说了。颂公也觉得说错了，将会产生恶果。果不出他所料，白到了长沙便对颂公耀武扬威。颂公于民国十七年到武汉曾被李宗仁、白崇禧扣押，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撵下了台。现在白崇禧向颂公逼要军粮，此事很急，没法应付，你看怎么办？”我说：“不是说颂公身体有病吗？就称病休息，一切交邓介松秘书长代行，拖着不办，敷衍一通。你即去向颂公建议。”程载英说：“这是一个办法，我马上就去。”次日报上就发表“程主席政躬欠佳，暂需休养，由秘书长代行……”的消息，这一着果真凑效。

第二天，我去东茅巷耕耘圃陈明仁司令官家里，陈问我：“驻扎什么地点？去看过颂公没有？”我回答去看了，并将程元请进城这回事略略谈给陈明仁听。陈明仁很严肃地说：“不用大惊小怪，他敢把颂公怎么样？白的长官部不久就要迁衡阳，用不着紧张。”这个时候，陈明仁和程潜表面上是互不往来，他一切表面言行完全站在白崇禧一边，也正在叫嚷“勘乱”，而内心里却和程潜心照不宣。我是血战四平街的团长，出入陈处，谁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因此我在这种关键时刻，可给程潜与陈明仁之间通气。陈明仁又说：“现在湖南政局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只有颂公才能顶得住，你我回到湖南在颂公指导下应为湖南人出一把力。”又叮嘱我说：“这种时候，你和程元都要谨慎，切不可乱说乱动，免得给颂公增添麻烦。”我回头把陈明仁讲的话报告了程潜，也告诉了程元。程元说：“有陈明仁老大哥关照就放心了。”

我到省府办公楼见过程潜后又到公馆（在省府内）会待从副官王首之。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老头子（程潜）现在弄得上不得上、下不得下，白崇禧逼他要兵要粮，焦急得很，吃饭睡觉都在办公室，弄得家里也提心吊胆。”我又重到楼上向

程潜建议，将我这个团调到岳麓山。他同意了，并指示说：“今后要随时与博全（程元号）联络。”

第二天我团开来岳麓山，当天晚上在小吴门外程元家里，程元与我，还有水警总队长陈立谟三人开了个秘密会。研究的内容是，程潜被逼得在省府无法立足的时候即离开省府往岳麓山出走。从省府至中山西路轮渡过江由警卫团负责警戒，河西岳麓山归程杰团警戒，水陆洲归水警总队警戒。由水警总队负责渡江的交通，在东岸中山西路轮渡口停一艘小火轮升火待发，省府内停一辆中型吉普车以备程潜出走时用，西岸码头由程杰派中型卡车待用，落脚地址设在左家垅方叔章家里。以上计划，由程元团长向程潜作了汇报。

第二天上午，三一四师师长陈达（他是黄埔六期学生，陆军大学高材生，曾任国防部作战处处长）从宁乡赶来长沙。会见程潜后，将驻扎宁乡迴龙铺的陈又平团也调岳麓山驻扎，在石佳冲口设师指挥所。

陈达师长作了一个为程潜出走的秘密行动计划，分为第一步、第二步两个方案，绘了行动路线图，去向是西南方面，分别坐汽车走和乘轿两条路线，到时把程潜所有的部队调集拢来。他的行动计划没有把陈明仁的武力考虑在内，他也不知道陈明仁和程潜有默契，我也不敢把陈明仁意图向陈达透露。陈的行动计划呈交程潜审阅后，程说：“这只能备而不用，有备无患。如果真的弄成这样，是出于不得已的下策了，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走这脚棋。”可是，陈达不听程潜的话，后来于6月15日由宁乡出走，提前起义，并要我力劝程潜也出走。陈部后来遭到白崇禧围剿被打垮了，由于我这个团因驻扎在岳麓山，没有随陈达行动，故未被歼。陈达这个保护程潜的秘密“应变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和平解放中的片断回忆

程 岑 华 *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我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的一个区委会任区委委员兼支部书记，主要在基层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与协助程潜起义的程星龄是叔侄关系，又和地下党省工委的统战组组长余志宏熟识，故受他们的委托做过一些具体事情。值此纪念湖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之际，特将一些片断情况回忆如下。

一、程潜提出起义《备忘录》的经过

省工委策动程潜起义，始于程潜1948年7月回湘主政之时。程潜于1948年底委托程星龄作为代表与地下党联系谋求湖南的局部和平。经过数月准备，起义条件渐趋成熟。为郑重其事，中共地下党方面在1949年4月间，希望程潜提出一份《备忘录》，程潜表示同意。《备忘录》由程星龄拟出初稿，经与余志宏协商修改，程星龄交我誊正。我是用当时通用的十行公文纸和毛笔楷书抄写的。

《备忘录》誊正以后，程星龄送请程潜亲自签名盖章后，经余志宏转给了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又由周礼设法转给了党中央。

* 程岑华当时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任支部书记。

二、程星齡在1949年1月间曾向程潜上书言事

1949年1、2月间，程星齡曾经秘密向程潜有过一次上书言事，信是由我替他抄正的。这封信不同寻常，前面无收信人称谓，后面未署寄信人名字，信末注明了赐阅后请付丙（即请烧毁的意思）。

信写得较长，因年代已久，无法完全记清，记得主要是谈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到与中共谋和是不是投降变节、背叛党（国民党）国。信的论点主要是内战已使民穷财尽，再也打不下去了。要求和平是全国全省人民的一致迫切要求，与中共和谈，实为全省人民之幸，实为万全之策。孙中山先生晚年就决心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原来的三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凡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有些人发动内战，反苏、反共、压迫工农，就是背叛了中山先生晚年的思想，现在决定与中共言和，正是继承和实现孙先生的遗志，完全是革命行动，正是大节所关，根本谈不上投降变节、背叛党国。

第二个问题，共产党胜利了是不是搞得长久。信中的论点主要是，中共是一个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有一批目光远大、立志为国为民的领袖人物，还有大批经过艰苦磨炼、脚踏实地的人才，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晋西北考察时，曾目睹八路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一支很有作为的队伍，是国家的希望所在。这样的政党与历史上的黄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根本不能相比，与苏俄十月革命前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也不能相提并论。要相信中共有长治久安之策，依靠他们是能够把国家的事情搞好的。

信是我用十行纸以毛笔正楷誊正的，抄好后程星龄要我密封好设法交给程潜。当时，我早由余志宏介绍在省政府的秘书处当职员，秘书处就设在省政府二楼程潜办公室的下面，递交比较方便。

当时我不曾问过程星龄上书的原委，后来问及此事，据他说，当时围绕在程潜周围的高级官员，对和平起义有三种态度：一部分是坚持赞成和平起义的，一部分是中间派，态度不甚明朗或时而动摇；还有一部分是坚决反对的顽固派，不时在程潜面前谈论要与中共作战到底，和谈无异就是投降变节，背叛党国，并常影射程潜是党国元老，务必珍惜晚节。再就是叫嚣共产党只会打游击，污蔑是一支流寇式的队伍，即使取得胜利，也会搞不长久。写信的目的就是批驳这些容易使人发生动摇起义的言论。他说程潜看信后，对他说过“信已收阅了，一些反对起义的人是些极端愚蠢的东西”。

三、省市机关中的公务员工协会

当时，省政府所属的各厅、处单位，出现了一个省级机关公务人员联谊会，并产生了一个领导联谊会的理事会。闹过要求发放薪饷，要求改善生活的风潮，把矛头指向当时政府的领导当局，一时颇为活跃。地下党及时了解到其理事会的核心成员为省政府新闻处的专员曾××，卫生处的职员尹××，都是一些有反动劣迹的人，其动机十分可疑，乃决定既不参与其活动，也不与之发生任何联系。

为了把旧政权营垒当中可以争取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使之转到瓦解旧政权，迎接和平解放的斗争中去，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在中下级的公务人员当中建立起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名叫公务员工协会（简称“公协”）。

这个组织参照解放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规定，制定了章程，明确提出“公协”会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个组织没有上层的领导机构，会员开始都由地下党员个别吸收，一般没有横的联系。发展以后由地下党员按照党的布置组织学习，分派任务。那时，省、市机关的地下党员都统一由长沙市工委领导，具体组织领导“公协”活动的是市工委下面的中共经世学会区委，后又改为长沙市机关团体区委、中共长沙市工委机关团体统战工作组。到解放时止，湖南公務员工协会在省、市机关共发展会员约二百人左右。

分散在旧政权各个单位的“公协”会员，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的主动联系群众，组织学习小组，讲明形势，宣传政策，揭露谣言，稳定人心，有的关心群众生活，团结单位职工，联合进步力量，建立应变组织，应付动荡局势，有的设法保护国家财产，保护档案文书，有的深入调查摸底，作好接管准备。所有这些，都大有利于解放以后的和平接管工作。

临近解放之际，“公协”成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为迎接解放、支援前线而勤奋工作。1949年8月初间，白崇禧为了进行破坏，曾两度派飞机围绕旧省政府的所在地教育会坪滥施轰炸，民、财、建、教各厅都环绕在教育会坪周围，因此，都有蒙受被炸的危险。地下党员和“公协”成员一道，不顾个人安危，不仅自己坚守岗位，还动员一部分离散人员返回机关。1949年8月5日，和全市人民一道，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市区，迎接了长沙古城的和平解放。

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活动纪实

陈云章*

“六团体”的简单情况

湖南省、市“六团体”指的是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现在把“六团体”的简单情况介绍一下。

在这“六团体”中，以湖南省工业会的历史最浅，它是1948年根据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的工业会法而成立的，就是把原属商会的公私工业组合，包括所有工厂和工业同业公会，从商会分出来而组成的。这个会只有全国总工业会和省、特别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两级组织，所有全省（或全市）的公私经营的工厂企业都属这个会的直接会员，因此这个会的组成力量较为庞大。其次资历较浅的是湖南省商业联合会，它在名义上是各县、市商会的联合组织，并无直接会员，湖南省农会、湖南省总工会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只是各县农会、各县市工会联合组织而已。长沙市商会是一个历史最悠久、力量最雄厚的商人联合组织。长沙市总工会则是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这“六团体”，除湖南省工业会外，其他五个团体大都是由国民党的CC和三青团两大派系操

* 陈云章当时任省工业会理事长、省、市工农商六团体联谊会和省、市51个人民团体和平促进会召集人。

纵，壁垒森严，斗争激烈。由于湖南从何键当权时代起，在国民党党务上，中央与地方有极深刻的矛盾，当时称之为甲乙两派（即叫钻子、皮刀派，是从这两字的象形意义而言），甲派指的是国民党中央，乙派指的是地方政权。他们的争夺主要对象除党务方面外，大都是公法团体（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把群众组织分为法团与社团，所谓法团是按照立法产生的组织，如商会、农会之类，社团是自发的组织，报经政府备案即可成立，如新闻记者联合会、戏剧工作者联合会之类），长沙市商会，更是他们决斗的场所。但由于地方实力大，在何键统治时期，这个商会始终由乙派把持，甲派无从插手。长沙市总工会情况亦如此。何键去后，张治中继任湖南主席，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就是取乙派而代之。随后继任湖南主席的薛岳、吴奇伟、王东原都是陈诚的嫡系，都是三青团的，所以长沙市商会、总工会一直把持在三青团手里。CC系虽力图插入，常常为选举理监事，闹得拖延不能打开投票柜，但终究无法取得控制权，只能争得一两名理监事而已。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当时湖南省国民党领导人都是CC的，管理公法团体的省政府社会处也是属CC的，社会处长一直是由CC系的人担任。这时按照规定先后成立了湖南省商业联合会、省总工会、省农会，这些省级性组织就由CC系掌握了，三青团也因为这些组织并无实际力量也就乐得罢手。湖南省工业会是一个新型组织，力量较为雄厚，一开始，CC与三青团争夺最力，本来这个组织的前身是湖南省工业协会（这是湖南工业界联合组织的一个社团，上有全国工业协会，是由工业钹子吴蕴初、刘鸿生、李烛尘等发起组织）由三青团系朱谦领导（朱是浙江人，朱家骅之侄，解放前夕去台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但湖南省社会处积极支持李毓尧（原湖南大学校长，CC系首要人物之一）。因此，三青团与CC系之间，为此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CC系的领导人张炯与三青团的领导人周天贤协商由我出来担任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我提出来的唯一条件是两派都不得干预理事、监事的选举，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任这个职务的。上面所讲的是“六团体”的大致历史情况。

张人价 忠藏书

扣留中央政府在湘搜括的金银

这首先得从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谈起。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重建祖国，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且夕数变，使得工商业无法经营。尤其是工厂因资金周转时间较长，在币值波动的情况下，不能维持下去，这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全国总工业会的常委会，在发行金元券的前一天，我正由南京飞往长沙，在飞机上，中央社记者要我发表谈话。由于事出匆促，思虑不周，我吁请工商界全力支持。事后我深知这种改革对工商界极为不利，因此我回长沙后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指出：“翻遍货币史，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进行中改革币制的，新币制的前途，说来是很艰难的。所谓通货，一定要有货才能通，假使不增加生产，即金元券也好，银元券也好，都免不了‘法币’的同等命运，改革币制的措施，中国将更进一步与美国合作，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亦将受到美国的支配。”随后湖南省工业会假营盘街国际大厦约集工商界举行经济改革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各方面代表52人，由省工业会常务理事李毓尧主持，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陈芸田、周维梁等人。陈芸田说：“由这几天中央银行金银兑换的拥挤和连日利息的降低，证明政府经济政策收了效。”张人价（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说：“觉得目前的社会是金钱决定一切，要政治统一，必先经

济统一，法币政策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可是今日法币已不能担负此任务，所以又要一种新币来负担。此次所采取之制度，不是金币本位制（实金制），也不是金汇本位制（虚金制），更不是金块本位制（准备制），而是与虚金制及准备制相近的新金汇本位制。从银本位进入金本位，是政府有眼光的作法。准备不同，亦为事实。”周维桢说：“币制改革后，豪门握有金银都涨了价，得了利益，公务人员都未得一点利益，暂时情形虽好，但是豪门一动，马上会坏，希望党政要人们自己相信，自己领导，来挽救危机。”我在会上一再指出：“此次币制改革，先天不足，必须后天得调，政府责任要多些。因为过去的政策百分之九十是政府自己破坏的，是豪门破坏的，希望今后做到守法合理。我极赞成资金转入生产，因为工商界同仁饱受‘法币’贬值的痛苦，必须争取政府的合法保障，政府不要动用发行金元券的储备金。”在这次会上发言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1948年8月的事。10月间，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长沙中央银行分行将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从此“六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扣留黄金、白银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展情况，国内外报纸竞相登载，云南、四川相继效尤，震撼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基础。这是“六团体”第一次联合起来甘冒风险的巨大行动。

先是1948年10月25日，长沙中央银行经理辛衡若在他的家里，宴请我和唐伯球等，无意中说出财政部命令他将所收存黄金、白银运上海集中。唐伯球把这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找我商量应付办法，从而决定由我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进行扣留。由于“六团体”的负责人，除省工业会外，不属CC就属三青团，从来是不相容的，通过我几天的奔走说合，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于11月1日借着讨论“工资”这题目，召集“六团体”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同日上

午，我先策动了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借讨论物价的名义，召开“留长省参议员座谈会”。这两个会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扣留长沙中央银行所收存的、正待运走的黄金、白银。在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我担任主席，首先发言说：“现在各地烽火连天，几乎没有一处是安乐土，而我们湖南与其他各地比较起来，尚是比较安全的地带，这次政府在湖南兑换的三万三千两黄金、二十余万两白银、八十余万元光洋，政府要运到南京去，是不合理的。照目前的情势看，只有从别处运到安全的湖南来，没有从安全的湖南运出去的道理。这都是我们湖南人民的血汗，我们要拿出力量来，不准他运走。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四川、湖南。东北现在是完了，我们湖南，要利用这丰富的宝藏，工农商融为一体，从事经济建设，单靠战场上和共党拚、流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需先流汗，从事经济建设，给湖南打下基础，才能确保湖南。目前劳工要增加工资，被指为共党，商人做生意被指为奸商，你们想这是什么世界？我们要谈‘民主’先要老百姓的生活不受威胁，如果中央有危害人民财产的法令，我们要抗议，中央有危害湖南人民生活的政策，我们要否决。谈到货物的限价，在欧美的配给制度上，只有限物，从未有限价的事情，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经济原理。而这次政府一面拚命发行通货，一面又严厉执行限价，这简直是自己打自己。金元券现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所以我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哲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蒋经国不仁，以上海市民为刍狗’（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我们湖南决不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我提议，要不准黄金白银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找出路。我相信，说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的。我们决不准他拿走，我们意志要集中，力量要集中，来解救湖南

人民的痛苦。我们团结，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40万人民，而且要团结湖南三千万人民。我们要拿出行动来，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了不运走的保证后，方能罢休。我建议，工农商各界，应该有一个经常的组织来与一切不合理的政策斗争。”当时全场拥护，并决定立即包围中央银行，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鼎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和我为领队，率同与会的全体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中央银行经理辛衡若、副经理陈忠范鉴于声势，当即电话邀请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前来调处。经三方协商后，作出由“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封，由该行经理辛衡若承诺电请中央总行缓运。如必要运时，由他通知省政府再由邓介松向我保证，省府得到运走消息时，一定通知我。当即请点封存金库，计存黄金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两、银元八十三万九千枚、白银二十二万余两、美金八百四十元、港币一百四十六元。扣留黄金、白银的第一步行动，是“六团体”第一次大联合的民主活动。

黄金、白银运走了

1949年元旦节休假中的一天午夜，我突然接到中央银行一个行员打来的电话，说是黄金全部运走了，白银亦定今晚起运。我随即告诉邓介松，要他设法处理，并亲赴金库请点。结果计尚存黄金一万零一百四十五两又0.579盎司，白银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三两（这因为上次封存后，中央银行继续有所收进，以此比上次封存数多一点）、银元六十五万零三百三十六枚。邓介松乃报请程潜将辛扣押，责成他追回已运走的黄金。

我又用“六团体”名义打电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几天后，程将辛释放回家，嘱其不得离开长沙，但他乘机脱逃，邓即派市警察局长刘人奎亲赴江西把他捉回。不知怎的，解放前夕，程潜又让他逃往香港去了。

“六团体”的这一行动，造成了下述三种影响：

一是对国民政府借改革币制为名，搜换民间金银的一次打击。云南、湖北、四川等省相继响应，挽回了一部分正待运走的黄金、白银。

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省政府的几个月军政费用，就是靠这笔扣留的金银铸成一百多万银元来维持的。为推动湖南和平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六团体”这一富有民主意义和显著效果的活动鼓舞了大众，加强了团结，为往后呼吁和平，反对戡乱，从而促使湖南最终走上和平过渡，都是以此为起点。从此使原属于三青团及CC两系的壁垒森严、互不相容的工农商团体，消除歧见，组成“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联谊会”，推选我为联谊会主席，我往后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以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联谊会主席的合法身份公开进行的。

呼 吁 和 平

刘作忠藏书

1949年1月，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当时我正在上海，随即由沪飞汉，3日晨到达长沙，从事和平运动（详情见《湖南和平运动片断回忆》，这里只谈“六团体”的活动情况）。

我回到长沙后，即走访湖南省社会处长刘修如，商讨省人民团体响应“元旦文告”事宜，决定由省社会处于4日下午召集省会各公法团体共51个单位的代表开会，由刘修如主持。

我在会上发言：“孙科组阁，即决定了和平政策，其中本省左恭（左是共产党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孙科亲信）、章士钊等全力支持。左恭对孙科说：‘一个大政治家能够做一件确实与国家民族有千利而无一害之事，他即算自己做了牺牲品，但从历史看是伟大的。孙先生有这这个机会，就是应该决定和平。’当时总统极不赞成，张治中陈述和平意见遭了蒋先生的骂，所以孙也只好托病居沪。总统才电胡适来京，嘱为组阁，深恐局外人打断胡适的意志，不准胡接见任何人，迨见总统。二人相向而泣，胡既不肯组阁，又不肯去美游说。至于经济上大家更明白，而每天人民的死亡，按当局估计在60万以上，大家想想，世界上的惨剧，谁有胜于此。军事上我们知道徐蚌之战，大军达50万，世界大战中，新式武器效力可算极大。但而今徐蚌之战，是不是能完全挽救危局？这都是军事上非和平不可的原因，我们想全国人民哪个不愿和平呢？这是我们一个机会。我主张为表示和平诚意，除同意左先生的意见外，并建议当局停止戡乱一切措施，要求和平。”这一席话对与会者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尽管刘修如表示反对，说是“要持重”，但大会终于作出了决定，组织湖南省市51个公法团体和平促进会，推定我和彭国钧、张福云、林醒民、谢瑞琪、陈芸田、周鼎霖、周鼎霖、柳春、何国璋、罗创书为筹备人，由我负责召集。但国民党三青团从中极力破坏，并由社会处另外组织了一个把我排除在外的“湖南省和平促进会”，与这个会相对峙。

“六团体”和平促进会的成立

由于51个公法团体和平促进会难于召集，我转而想以“六团体”作为推动和平的合法组织，经反复奔走商讨，终于取得了市商会崔伯鸿、市总工会林醒民的同意，其中尤以张福

二、林醒民最为出力，从而成立了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和平促进会，此为蒋发表“元旦文告”后湖南首先成立的一个和平组织，而且在当时全国范围讲，是第一个公开发出和平呼吁电文的人民团体。其电文如下：

一、致蒋总统电：“南京蒋总统钧鉴：一、读元旦文告，伤心国运，受惜民命，仁心仁愿，充布行间，哀我子遗，相定之余，无不感奋，本会等为拥护钧座主张，並电毛润之先生作沉痛呼吁，惟签议钧座在此国运民命千钧一发之会，当发表钧座祈求和平赤忱起见，拟恳电飭全国停止征兵征粮及一切戡乱绥靖工作，以示钧座愿望和平之诚意，争取国民之同情，消弭共党之疑惧，便利第三者之调处，是否可以，敬乞裁决。”

二、致毛泽东电：“延安毛润之先生勋鉴：目前国家已面临存亡绝续阶段，人民挣扎于生死边缘，厌恶战争，求取和平，此为全国人民在完成抗日大业后之一致愿望。犹忆当政协失败之时，消息传出，亿万生灵如获丧钟，往事已矣，不愿追咎。兹幸蒋总统伤心浩劫，俯纳輿情，与民休息，发出和平主张。而蒋先生文告内一再强调为和为战，唯尊意是夺。窃念先生一介书生，崛起湖湘之间，数十年奋斗，所追求之目标，要不外救民救国。而救民之唯一途径，即在避免杀戮，放下武器。寻求国是之唯一善策，即在集全国英才，筹议于庙堂之内。以先生学养之深沉，爱惜民命之殷切，绝不致河汉斯言，同意蒋总统和平主张，化干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奠国基于磐石。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如何之处，敬候明教。”

这两个电文是我即席草拟的，次日国民党团负责人张炯、朱有为、周天贤、刘业昭等即集会商议，说“六团体”给蒋介石的电报不是呼吁和平，而是讽刺总统破坏政协。给毛泽东的电报“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等语，简直是把国民政府的公法团体变为共产党的应声虫。并讽刺总统不

学无术，不爱惜民命，实属罪大恶极，应予追处，并指使省商业联合会等五团体负责人陈芸田、林醒民等在报上登载启事，说六团体发出的这两份电文是冒用他们的名义搞的，不予承认。

迎 接 唐 生 智 来 长

1949年4月间，白崇禧对程潜的压力越来越大，程潜无法抵挡。4月22日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约集刘公武、蔡杞材、周君南和我在他家商议应付办法，大家认为只有把“隐居”在东安的唐生智接到长沙来与程潜合作，表示湖南团结一致，以对付白崇禧才是唯一的办法。用什么名义去接唐生智？当然不能用程潜本人的名义，程本人不但不敢如此做，唐也不会来，而且如果是他个人接来的，也起不了任何影响作用。用省参议会名义吧，又由于参议会党派关系复杂，不易通过，最后决定只有以“六团体”名义为最合适，这不但这个团体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也是白崇禧最不敢得罪的公法团体。为此，我首先将这情况反映给中共湖南省工委，征求他们的意见。省工委深表赞成。唐伯球把这情况告知程潜，程欣然同意。我遂约集“六团体”领导人在我家商议，一致通过，推举我为迎接代表。我于4月24日邀同“省市51个公法团体和平促进会”常务委员周靖襄和省参议员席楚霖（他是以个人身份作引路人陪同前往的）从长沙出发，25日到达东安唐家，畅谈通宵。唐表示：“如果是为着替程潜保驾，我是决不会去的，为着湖南三千万人民，我是可以去的。”当我们离开东安时，粤汉铁路局特为唐预备了一列专车。车过衡阳时，我打电话给程潜，要他亲赴车站迎接，程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省工业会，要他们组织一两百人去车站迎接，所以唐到达长沙时，在车站欢迎他的有几百人，情况是空前热烈的。第三天即由省参议会及“六团体”召集各

界人士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湖南省自救会就是在这欢迎大会上产生的。

挽留程潜继续主湘

1949年4月间，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调程潜任国民政府考试院代理院长，并任命陈明仁接替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在接到这命令后，不敢抗命，但又不愿意交给陈明仁。为此，特找唐伯球和我商量，我们即决定用省参议会及“六团体”名义，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李宗仁终于被迫于4月24日复电同意。在这里，补充说明一点，以往一切函电均系湖南省工业会领衔。但这时，我正遭受白崇禧及军统密谋暗杀的威胁，因此通电致请彭国钧先生领导的湖南省教育会领衔（彭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教育家，他领导的省教育会按法令属于社团）。我要求他出面领衔时，他慨然应允，此电名义已是“七团体”了。由于彭的领衔，李宗仁、白崇禧对此更加重视。兹将往来电报抄录如下：

1949年4月21日公法团体致李宗仁电：

“广州李代总统钧鉴：报载中央于湘省有易人说，民众万分惊骇。盖自战云复起，中央机构及部队移湘省者在三四十万人以上，公粮军饷，供应已极窘迫，垂以人心浮动，各县处处不安，警报频传，诸须应付。在此危疑震撼之日，幸颂公（程潜号颂云）老成物望，坐镇湘垣，各方得所维系。如或轻言更易，失去重心，更恐各地增长变乱，愈难收拾。恳请垂念湘局，准予维持现状，以资镇定，而求安全。迫切陈情，伏维赐鉴。湖南省教育会理事长彭国钧、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陈芸田、省农会理事长周鼎占、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长沙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长沙市商会理事

“陈宗陶、左学谦等叩马。”

1949年4月24日李宗仁复电：

“湖南省教育会彭理事长并转芸田、鼎古、云章、醒民、福云、宗陶、学谦诸先生：马电诵悉，颂云先生勋高望重，依畀方殷，挽济艰危，尤赖老成，尚希多所赞助，悉力并赴为盼，特复。李宗仁辰梗府二顿。”

欢迎陈明仁主湘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我感到程潜是个空架子，实力全在陈明仁手里，不取得陈明仁的合作，在紧急关头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在我几次和陈明仁谈话后，他对我明确地说：“我在黄埔毕业后，这是第一次回湖南工作，我不能把长沙当四平街，要是我在武汉，我一定同共产党拼到底。”程潜也多次对我讲过：“我这是第三次担任湖南主席，湖南在抗战时期损失太大，长沙经过了‘四战一火’。我不能在我最后的一次主席任内，使湖南在这次内战中再遭受损失。”程、陈的爱护桑梓，不愿使湖南在这次国共内战中遭受破坏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也都向我表示过，湖南和平交接后，即解甲归田。陈明仁的态度尤为坚决。他在谈话时，一再警告我：“这话只有你知我知，如果传出去了，白崇禧会要我的头，我也就会要你的头。”因此，我和程潜商量后，认为陈明仁接替他担任湖南主席是适宜的。程向白崇禧举陈自代。所以当李宗仁发表陈明仁继任湖南主席时，我和唐伯球商议用湖南省参议会及“六团体”名义召开“湖南省会各界欢迎大会”。推仇鳌任大会主席，由我去织机街耕耘圃陈明仁家相迎。陈明仁是坐我的汽车进入会场的，他的那句“决不让长沙市民听到枪声”的话，就是在这会上宣布的。

“六团体”的联合宣言

自从李宗仁被迫收回撤换程潜省政府主席命令后，白崇禧对程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迫使程潜自动辞职。为此对“六团体”恨之入骨，采取手段是软硬兼施，一面分别约宴工商界人物个别谈话，企图破坏分化“六团体”的团结，一面强迫长沙市工商界筹缴“戡乱费”银元50万元，并以坚壁清野疏散相威胁。在此情况下，“六团体”的负责人决不示弱，坚决抵制，经几度磋商后，推请工商界元老左益斋亲自率同省工会代表陈宗鉴、省商联代表林端生等十人向白崇禧请愿，将50万银元的派款，减为20万元，其中并搭配一半银币。“六团体”为此发表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联合宣言，语气极为尖锐严厉。本来白崇禧在解散湖南省自救会，逼走唐生智以后气焰逼人，“六团体”的这一宣言，给他迎头一击，湖南民气为之一振。

上面所讲的是“六团体”从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起直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这段时期联合行动情况。

当然“六团体”联合行动的动机，是从维护本身利益和爱国家、爱家乡、爱和平、爱民主、爱自由的思想出发的。如扣留黄金白银行动是由于金元券的发行使得工厂停闭，商店关门，百业萧条，而且商业银行和民间私藏的一点金银，都被迫换成金元券变成一张废纸面起的。又如白崇禧到长沙后，力图向工商界勒索50万银元，并且以坚壁清野，迫使工商户撤离长沙，而当时的市场情况，诚如“六团体”联合宣言所讲的“现已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候，除生命外，已无可牺牲”的地步，所以“六团体”的联合行动，是从本身的利害与泄愤出发，但在客观事实上对湖南的和平解放，确实起了一定推动和协助作用。很明显的，程潜在湖南的地位，决不同于龙云在云南、刘文辉在西康的地位。云南、西康等于是龙云、刘文辉的私产，

蒋介石要解除他，就非动用武力不可。而对于程潜呢？则只要一纸命令就行了。因此，程潜假如得不到省参议会及工商法团的支持，他将一无所靠，如果参议会、工商界反对他，他将无法站住。再具体一点说，假如当年“六团体”不扣留黄金、白银，他就无从得到一百多万银元的巨款，他的地位就无法维持。他的经理处长马培荪最近还告诉我：“当时程潜曾向我们说：‘陈云章不错咧！要不是他扣留这笔金银，我们就无法维持下去。’”又如“六团体”从东安把唐生智迎接到长沙，以及当李宗仁调程任考试院代院长时，“六团体”配合其他方面电恳挽留。凡此种种，对当时湖南的现实情况以及程潜终于能留在湖南领导起义，起了何等的影响作用，更是人所共知的。写到这里，寻思往事，感慨万千。我在前面讲到“六团体”中除省工业会外，都有自己的派性，都有自己的背景，从来互不相容，但在这一段时期里，始终不畏强暴；不顾生死，团结一致，其中虽曾产生过小的分歧，但终究言归于好，奋斗到底。犹忆因“六团体”的联合宣言内容过于激烈，陈宗陶、张福云都表示怕惹出大乱子，不敢签署。这时，陈芸田早已能够和我合作了。我对他讲，这宣言如能取得左益斋同意，陈宗陶他们就不会再有顾虑。当时左益斋正面病住东茅街仁术医院，陈芸田持宣言请左支持，左当即签字，这宣言要不得到左的同意，是无法发布的。

（1983年8月口述刘振鑫整理）

附注一：刘斐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三十二辑上所发表的《1949年北平和谈片段》一文中，竟说：“经过我在武汉、长沙之间的几次往返、沟通，白崇禧和程潜之间的关系……程潜就敢于公开搞些反蒋主和的措施了，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我在看到此文后，1962年在广东从化温泉见到刘斐，我问：“这是谁对你说的？”他说：“是程颂云（程潜）自己对我讲的。”我说：“扣留黄金、白银是1948年

10月间的事，那时东北战役还没结束，程潜就敢于以湖南省政府主席身份扣留中央银行的金银，这就说明他早已背叛蒋介石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了，何待1949年8月才起义呢？”刘才明白这一事实真相后，连说有人就是爱吹，他要我写一材料让他转交文史资料委员会更正。我说：“关于湖南这一段时间的史实问题，不是针对一件事、一句话纠正过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我看到已发表的有关这类资料中，可说很少是合乎客观事实的。当然，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上，不可能写出事实的真象，所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几次向我约稿，我没有写过一个字，就是这原因。”

附注二：唐生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十五辑写了一篇“1931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一文，谈他在1949年来长沙这事时，竟说：“这时，程颂云从长沙派唐伯球到东安来找我，我乃去长沙与程颂云及陈明仁共同商量如何迎接解放起义事。”看到后，我对唐生明说：“令兄怎么也和程潜一样，过河拆桥说瞎话呢？在当时的条件下，程潜敢派唐伯球去接他吗？如程潜敢出面接他，程潜就自己有能力对付白崇禧了，还接他来长沙干甚么？唐伯球如用省参议会名义去接他，就得参议会作出决议，省参议会能通过吗？如果他是奉程潜命令以私人名义去接，那他就是程潜的私人，这起甚么作用。”唐生明说：“我大哥这几年来是有些糊涂了，请你原谅。他这篇东西，我事先没看过，我一定要他更正。”1963年唐生智邀邓介松由武汉来长，替他写自传，特托邓向我解释，并邀我去他家吃饭。邓对我说：“孟公对你决无不良之意，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知道湖南统战部对你有意见，不便提到你。”我和邓一道到唐家后，唐就对我说：“我正要他（指邓）给我重写一份这样的资料，一定把它改正过来。”我说：“这根本不算一回甚么了不起的事，说清楚就算了。”

唐生智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一些活动

唐 仁 曼*

唐生智自1945年9月回东安以后，一直以有病及守母丧为由，拒与蒋介石见面。1948年冬，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在上海，蒋介石把唐生明召去（当时他任总统府中将参军），要他告诉唐生智，想请他来谈谈，唐生明转告了唐生智，唐生智同意了。

唐生智以去沪治牙病的名义，先住在唐生明处，由唐生明介绍了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并由唐生明陪同去南京见蒋介石。唐原希望能向蒋提些意见，劝说蒋采取明智的行动，但毫无结果，乃回上海。在上海时，唐生智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联地下组织的人如吴成方、郭春涛等人会见过多次，李济深也派人来，希望唐生智做策反工作。唐经中共南方局转介与湖南省工委接上头，并提出要做好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首先做好策反与联系发动工作。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吴成方还专程来长沙与湖南省工委联系，还通知民革地下组织的方鼎英等人，并对方说：“首先要尊重和征求唐生智的意见，推动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以迎接解放。”

在上海，唐生智对交警总队负责人周伟龙做了策反工作，黄克虎参与了此事。周伟龙答应在时机成熟时，拉出部队，发动起义，并控制交通枢纽。同时，还拉出了一部份兵力到湖

* 唐仁曼系唐生智之子，当时参加了有关活动。

用。此事被毛人凤发觉立即报告了蒋介石，便将周伟龙抓起来，当尔到台湾于1950年4月将周处死。此外，唐生智还对宪兵司令张镇（湖南人）做了工作，但张有些动摇，以后张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被打了毒针而死亡。还和姜和瀛取得了联系，姜和瀛在湖南和平解放前派宪兵保护了唐生智和长沙的进步人士。

1949年4月，白崇禧急于将湖南控制在桂系手中。他采取种种措施想赶走程潜并迫害进步力量，这时形势非常紧张。于是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与陈云章、刘公武、蔡杞材等人在唐伯球家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白崇禧和促进湖南和平解放的事。大家认为，有必要请唐生智出面来对付白崇禧，并依靠社会民众和国论为后盾，决定不用省参议会名义而以人民团体名义出面。于是陈云章邀请六团体负责人及51个人民团体及和平促进会常委周翊襄在陈家开会。陈将在唐伯球家商量的意见提出，大家一致赞成，并推举陈云章为代表前去东安迎接唐生智。由席楚霖带路，周翊襄陪同，于25日到达东安。28日唐生智与他们一道来长，沿途还约了刘兴、周斓、冯天柱等随同来长，随行的还有唐的秘书唐春林、吉百熙等人。因粤汉铁路湘粤段护路司令蒋锄欧系唐生智旧部，特为他备了一列专车。在途中，唐与随同来长的人商量用什么名义把省参议会和各人民团体组成整体，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唐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说：“白崇禧总不能反对湖南人自救吧。”4月29日上午10时，唐生智来到长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程潜也率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唐住在东茅巷9号唐生毅（唐生智三弟）家。当晚陈云章陪同陈采夫去唐生智住所，互相交换了意见，谈到午夜2时才离去。

省参议会及各界人民团体还举行了欢迎宴会。唐在宴会上即席发表了演说：“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

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三千万人民服务的。”

5月2日，湖南省各界联合会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省会各团体各界人士欢迎唐生智大会。会上首先由唐生智发表演说，他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自保自救，并发起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随后各界人士发表讲话，纷纷响应，群情激昂。民革成员周翊寰在会上发了言。他说：“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孟公（唐生智字孟萧）讲的多么亲切感人。湖南人民决心和平自救，全力以赴，坚决反对战祸的摧残。为了和平，头可断，血可流，和平自救不可丢。我们要冷静头脑和认清大局、明辨是非、主持正义、奋勇向前，湖南的前途是光明的！”

接着会上推举唐生智为湖南人民自救会的主任委员（代表湘南），陈渠珍（代表湘西）、仇鳌（代表湘中）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代表湘北）为常委兼总干事，还统一计划各县都建立自救会，暗中还计划要掌握各地的地方武装以推进湖南的和平解放。

这个组织实质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群众组织。它贯彻了当时地下党的意图，即从群众意向和舆论上对和平解放和程、陈等人的起义予以支持。

湖南人民自救会一成立，全省各地纷纷响应，有些地方也成立了人民自救分会，如祁阳县首先成立了祁阳县人民自救分会，负责人是周焕与刘嘉，并组织了县、区、乡三级自救武装，他们武装抗击了白崇禧的围剿，炸毁了白军的军火库和桥梁……。

这期间，唐生智以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到学生、人民团体和社会各阶层中去发表演说，宣传湖南人民要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自救的观点。如5月14日，全省“在乡军官自救会”成立大会在上学宫街十号开会，唐生智、陈明仁都到了

会。会上先请唐生智讲话，唐说：“抗战八年刚结束，内战一起，民不聊生，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我们湖南人民应该同心协力，团结自救，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为了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向程潜推荐了一批他的旧部安排担任一些县长、专员、司令等职，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撤回广西的退路，程都同意了。如程潜发表刘兴任衡阳警备司令，但原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抗命不从，乃改任刘兴为永宝警备司令。

1949年5月，白崇禧大肆镇压和平自救运动。到处派特务监视进步人士，还开出了要暗杀的不下五十人黑名单，一时杀气腾腾，阴云笼罩着长沙城。李宗仁、白崇禧在唐生智搞湖南和平自救运动时，就暗中派特务监视和跟踪唐生智，并打算暗害唐生智。5月23日，白崇禧邀仇鳌、唐伯球、彭国钧、陈云章等人去吃饭。席间，白崇禧说：“由孟潇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将此事告知唐生智，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唐的四弟唐生明与地下党组织商量，权衡轻重，最后确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湖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并拟派地下党员到东安协助唐生智进行迎解工作。

5月24日，唐生智与李觉连夜离开长沙，先到邵阳。在邵阳，唐生智积极开展了和平自救活动，宣传湖南人民要团结自救。当时由县参议会、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知，邀集地方绅士及群众团体、工商界等数百人在县参议会礼堂开会。唐发言非常激动，历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种种罪恶，并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会上还有从武汉大学回来的李剑农教授，县参议会议长赵恒和蔡锷旧部雷飏等十余人

发了言，内容都是关于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而且大家发言都很慷慨激昂。唐生智去邵阳的第三天，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搞统战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寿祺也到了邵阳，在李剑农家里秘密地会见了唐生智。刘寿祺对唐说：“目前形势非常紧张，但白崇禧已是日暮途穷，不可能在长沙呆多久。邵阳情况也很复杂，孟公在此地不可久留。最好立即回东安去，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到时可截击白军。”唐生智同意刘的意见，并说回东安后，将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人民武装上面。

唐生智从长沙回东安时，参加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为了唐的安全，还专门派了一个班的宪兵护送，这些宪兵的武器精良，都带了长短枪。他们留在东安保卫着唐生智的安全（当时的班长叫田诚，他后来在军政大学学习，并在湘西工作）。

唐生智回到东安以后，便在东安和附近各县都组组了一些地方武装，在东安还将雷政的保安团的力量也加强了。与湘中二支队莫新春部、湘南民联第三纵队陈安球和陈一凡等人均保持有密切联系。早在二月底，国民党邵阳保安副司令张伯候率邵阳、武岗、新宁三县的八个警察中队围剿莫新春部时，唐生智曾出面制止零陵两个警察中队对莫部的进攻，使莫部摆脱了前后受敌的危险，以后唐还赠送了莫部一批武器弹药。当唐生智从邵阳回东安途中受到白崇禧派的武装特务追踪威胁时，莫部曾派出部队前往保护。

此时，在东安县对进步力量打击迫害很猖獗，唐生智家附近经常有特务活动，并跟踪来唐家的客人。一次陈安球、陈一凡等人来唐生智家想请唐出面营救唐勋，并打听当前形势。唐的秘书唐春林和副官周仁山接待了他们，唐春林说：“唐总监（唐生智原来的官职）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已被国民党注意了，正派暗探在这一带活动，唐总监不在家。”并谈及湖南可能

会和平解放，并答应设法营救唐勋，并说他们来的行动已被特务发现。他们走时，周副官嘱咐不要去旅社那里了，以免发生危险。出去时，分散行动，一部分人从后山翻走，特务由他处理。周送走他们以后，就组织3人将两个钉梢的特务抓到后山上处死了。

唐生智回东安不久，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湖南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张华廉（后改名张凡）来到东安芦洪市东山町唐家，根据原与省工委协商的意见，是给张凡以唐的秘书名义或安排在唐生智办的耀祥中学当个挂名的教师。张凡到后与唐商谈了一天一晚，以后安排住在耀祥中学的校长室二楼，这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唐公开安排他为学校的历史教员，要唐的学生、总务处主任周敬安负责张的生活、安全和联系工作。随即介绍了一批进步的学生与张凡认识。

张凡首先在学校举办了一期社会发展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约有60多名要求进步的学生，为期一周。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还学习了《土地法大纲》等著作和文件。学习班主要由张凡讲，结合自己阅读资料和讨论。学习班结束后，吸收学习班学员立即开展了各项群众工作和宣传活动，组织了一批人，去各地农村组织农会和搞减租减息活动。

张凡经过与一部份进步学生的接触考查，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团员。当时发展的地下党员有秦正华、吴立民、周寿嵩等人，由秦正华任支部书记。发展的地下团员最先有唐仁曼（唐生智的长子）、林少玮（唐生智的外甥）、肖国益、翟玉卿（翟树卿）、刘东川（刘理鑫）等五人，由唐仁曼担任地下团组织的核心小组长，对外称新民主主义研究小组。地下党团员均为单线联系，由张凡直接领导地下党、团负责人，负责人直接领导本组成员，各成员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并发展一些进步

群众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小教联、妇联等外围组织。地下党组织着重抓了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联系地下武装力量、了解敌情、策反地方部队等工作。地下团组织重点发展了青年志愿协助解放服务队，至东安县解放为止，共发展队员约40余人。地下团组织还搞了侦察敌情，开展宣传，贴传单，担任张凡的联络和保卫工作，保护唐生智和护校工作等，解放前夕还做了迎接解放军和支前工作。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命地下党员刘寿祺先去邵阳，代表省工委要程潜迅速返长与陈明仁商讨通电起义的问题，并去东安与唐生智联系传达省工委意图。21日，刘寿祺在邵阳会见了李觉和刘兴。刘兴谈了唐生智最近的一些情况和去东安问题。刘寿祺随即冒雨走小路步行一天赶到东安（邵阳到东安约130多华里）。刘寿祺到了唐生智家后，会谈了两天。刘首先介绍了长沙和全省的形势：“自救会”被白崇禧强迫解散后，在省工委领导下，长沙各界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高，自救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当前解放军进军的形势很好，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即将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作好准备，免被白崇禧暗算。还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希望唐执行五月份在邵阳与刘寿祺商定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崇禧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表示完全同意省工委的意见，唐介绍了最近一段时间，他组织东安附近各县地方武装、与湘中二支队、湘南民联三纵队等地区武装的联系及自己能直接指挥雷攻的一个保安团，并拟加强这个保安团的力量等情况。

早在唐生智从长沙回来后，即着手将东安的武装力量组织和加强起来。他做了东安地方武装雷攻的保安团的工作，并将部队布置在东安县西北方向以阻击从邵阳来窜之白军。进可以

向东和向南截断湘桂线配合各部队阻止白崇禧的后退，使解放军能消灭白军。唐将姜和瀛派来保护他的一个宪兵班也交给雷攻，张凡后来也在雷攻部队住了一段时间，做雷攻部队的工作。8月，张凡还在雷攻部队中分别召来了地下党、团负责人秦正华和唐仁曼来研究布置工作。

此时，欧冠还经常派人与唐生智联系，如派了他的主任秘书张溉来唐家，是由他的侄儿，参加了青年服务队的张绵盛陪他来的。张溉谈了欧冠的情况和征求唐对下一步的做法，张溉将唐的意见带回去，对欧冠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曹茂琮除了亲自去东安外，先后派曹国伟、谢绍元、谢吉六等人去东安会见唐生智，共商迎解和起义的事并接受唐生智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唐的具体意见是抓武装和抓县长的安排，曹都照办了，将江华、新田、道县、零陵县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7月下旬，刘寿祺离开东安唐生智家不久，白崇禧为了防止他的后路被切断，就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学生、旧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义，到东安去看唐生智，劝说唐要急党国之难，为党国多出力。还说：“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长，看他是否有意屈就？这里风传东安情况非常混乱，你也就便了解具体情况究竟怎样？”曹茂琮去东安会见了唐生智，谈了一整晚，唐生智拒绝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建议，并请曹转告白，问白有何打算？“现在解放大军已经迫境，白健生（白崇禧之字）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上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回到老巢却犯了孙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则要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也不好过。究竟何去何从？应该有所决策”。

唐生智虽然回了东安，但仍由四弟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在长

沙进行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动。程潜于7月29日回到长沙后，8月1日，长沙的局势已经明朗化。陈明仁向军官们宣布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听不到枪声。长沙各界也拥护当局主张、联名发布和平宣言，签名的有578人。3日，长沙人民组成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由37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当晚8时，程潜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四野司令员林彪：“潜等业经八月一日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5日，唐生智等104人在长沙发出通电，响应程、陈两将军，并呼吁西南、西北地区立即行动，为完成全国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6日晚上八时，湖南省地方人士及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方面，以唐星为首席代表，唐生明、刘公武等为代表的湖南代表团到浏阳河边东屯渡西岸迎接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8日，湖南和平谈判会在长沙南门外段楚贤家的地下室举行第一次会议，湖南地方及起义方面的代表有：唐星（首席代表、代表程潜），熊新民（代表陈明仁）、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刘公武（代表以仇鳌为首的湖南社会和平力量）。第二次会议改在衣铺街唐生明寓寓续继会谈，双方商定了有关改编起义部队及成立临时湖南省政府等事宜。

白崇禧自7月21日乘机飞往衡阳至长沙和平解放后仍在衡阳。他又派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带了一个连的兵，从衡阳到东安来找唐生智。唐说：“如果李品仙带部队来，我就不见。”结果李品仙将一个连留在冷水滩，只身前来求见，这才在离东山町约5公里地的马家石山会见了。李品仙带来一笔钱，广西特产和香烟赠送给唐，并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致意，希望唐能与他们合作，说湖南是唐的根基之地，此时唯有请唐

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带来广州国民政府的邀请电，请唐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之职。还说已为他准备好了去广州的飞机，请唐去广州上任。唐对这些建议都断然拒绝了，李品仙只在马家石山住了一晚就走了。临走时唐生智对李说：“你带来的钱和礼物，我都不收，请你带回去吧！”李表示很尴尬。为了不使对方过分难堪，唐生智又说：“我爱吃腐乳，这几罐桂林腐乳我就收下了吧。”并说：“请你将我的一级上将军服替我退回去，交给李宗仁。”随即令人将一套缀有青天白日勋章的一级上将军服交给李。并说：“这种官，我是永远不当了。”以表明他的决心。

李品仙走后，不到一星期，白崇禧即派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迳直来东山町唐生智的住所要求见唐生智。一二六军军部驻扎在冷水滩，是白崇禧撤退到衡阳后，派一个军（缺一个师）的兵力驻在交通要道冷水滩的，目的是想保持他的退路通畅和防止唐生智组织的兵力切断湘桂线。唐估计到李品仙来是用软的一套，张湘泽来就会用硬的一套，故避而不见，要刘兴和秘书唐春林接待。刘兴说：“孟公不在家。”张湘泽说：“一星期前李品仙到这里还见到了孟公，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我们劝孟公去广州是好意，是为了孟公的安全。现在这一带要清扫散匪，要坚壁清野。如果孟公硬是不见，他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障了。”唐生智知道这些话是威胁他的意思，还是坚持不见，张便悻悻而去了。

张湘泽走后，唐知道白崇禧要对他动手了。一天傍晚他把夫人霍福光、子女唐仁曼、唐仁怡、唐仁彬、唐仁诚等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他们几次找上门来，威逼利诱，用尽了手段，还在我的附近安排特务监视，跟踪来看我的客人，我是不会和他们搞在一起的。看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晚我就要走了，让他们扑个空。”还说：“对我来说，我到国外去是

很容易的，你们到国外去也是没问题的，但我爱我的祖国，也不愿你们离开自己的祖国，我们家要为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他说“从我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是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我愿站在他们一边。我们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他还说：“我也知道这次他们是来者不善，抓住我没有什么好结果，但我已做好准备……”。他说这话时，非常激动。然后就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家。

不久，白崇禧就派一二六军三〇五师师长覃琦，带领一个师的兵力，以搜匪清剿为名，率部驻在离唐生智家只有4公里远的芦洪市。首先将唐生智办的耀祥中学封了，张贴了省政府主席黄杰的告示：“查私立耀祥中学宣传赤化，有违戡乱国法，特予查封。”在各交通要道都张贴了“打倒灰色分子唐生智”的标语，并到东山町唐生智家搜查。这时，唐与全家都已避开。覃琦还扬言，如果唐生智不出来，就放火烧掉唐生智的家，抓住唐生智就不客气了。这天正好湘南民联第三纵队的负责人陈安球去唐生智家，走到唐家门口，看见二楼窗帘挂了一条白手巾，陈知道出事了。他有意从大厅门边横过，见几个国民党军官正在和唐春林（唐的秘书兼耀祥中学校长）谈话。唐春林见陈来了，示意赶快离开。陈刚走出大门，唐春林就匆忙走出来对陈说：“桂系部队来了一位师长，正在找孟公的麻烦。前线形势很好，陈一凡在紧急部署战斗，要你积极配合大军作战，截击南逃的白崇禧部队。”覃琦还组织兵力，层层封锁包围，到处搜捕唐生智及家属。对可能隐藏的山头，都派大量兵力，象梳头发似的进行搜山，并派一部分兵力围剿驻在花桥附近的雷攻部队，并将雷攻的兵力阻挡在西北一隅。驻在水滩及东安境内的兵力已达两个师以上。唐生智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白军始终无法抓到他。

唐生智这时在哪里呢？他先是化装趁黑夜到了他的老师和

挚友顾伯叙的家里，以后又化装为郎中先生到了他三妹唐湘家中。唐湘家是交通方便，人口较多，地区平坦的区域，这正是白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他们总认为唐生智会躲到深山丛林之中，所以他们派人到处搜山。唐先是藏在唐湘家的柴堆中，留出一个空隙，正好放下一个行军床，唐就日夜呆在那个窄小的空间中。以后因唐睡觉时鼾声较大怕被人听到，于是在唐湘家的谷仓中隔出一小段出来，做了一个夹墙，里面可放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小桌子、一条凳子，谷仓只有前面一间房子能进去。这时地下团员唐仁曼和林少玮（唐湘之长子）就住在谷仓前面那间房子里，担任保卫和联络工作。有次唐生智在晚上12点以后，叫唐仁曼进去谈情况，唐仁曼谈到最近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新闻和三〇五师在到处搜捕唐生智，并扬言抓住唐生智就不客气的消息。唐生智沉思了一下，一边拿了一下桌上的左轮手枪，一边说：“如果他们真的来到这里抓我，我就和他们拼了！”那时情况的确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保卫他的除唐仁曼和林少玮外，只有三、四个人，并且他们都不知道唐生智的具体住处。万一有大批部队来，真是寡不敌众，而且不易逃脱。幸好白军把注意力一直放在一些偏僻的山林里，附近根本没来过。

白崇禧的三〇五师搜捕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便想出一条更为毒辣的计谋来。他派来两个东安人，一个是龙炎武（总统府中将参军），另一个是莫御（粤汉铁路护路司令）来东安协助三〇五师搜捕唐生智。由于龙、莫二人都是东安人，也形人情都较熟悉，他们到处找唐生智的熟人和亲戚打听消息。并配合三〇五师召开了唐氏家族会议，扬言知情不报者，九族皆诛。同时他们安排了大量便衣密探，四处搜索。由于龙、莫二人熟知地方情况，虽然没抓到唐生智，但先后将顾伯叙、刘兴和唐生智的夫人与子女全部抓走。当时唐仁曼与林少玮也被抓走。他们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

酒。”这时已是中秋节的时候。

唐生智的家小由龙炎武陪同，先是押到冷水滩，以后押上火车送到桂林。顾伯叙被押到零陵一二六军军部，由于顾是唐生智的师友，对唐影响很大。为了逼他讲出唐生智的下落，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致使他双脚残跛，最后还实行了假枪毙。由于唐生智夫人霍福光的一再要求，才将顾伯叙与唐家一家人一起押到桂林。到桂林将解放时，白崇禧亦不让唐、顾二家留在桂林，并限定只能去香港、澳门。最后由唐的旧部李品仙将唐、顾二家送往香港。

刘兴被抓到冷水滩后，扣留了很久。由于刘与李品仙都是唐的旧部，李也就没有将他交给白崇禧。在临解放前夕，将他一家都放了。

在唐生智隐蔽起来之前，就要青年志愿协助解放服务队员唐伯里去通知张凡，并将张凡等人送上山，在唐伯里家隐蔽了四、五天。以后又将张凡和一部份武器弹药，送到花桥雷攻部队中。由于三〇五师对雷攻的攻击，唐生智通过唐仁曼安排地下团员肖国益将张凡送到麻溪翟家地下团员翟玉卿家中。在那里坚持开展了各项地下工作，并向农民群众开展了宣传活动。

白崇禧抓不到唐生智，就命令部属将唐生智的家和耀祥中学烧毁。10月19日，由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从邵阳方向斜插入花桥，直指芦洪市，三〇五师仓惶后撤，烧房子的计划未能实施。

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电示前沿部队（吴克华部）负责人何英，专程到唐生智家看望他。这时，唐生智已回到东山町的老家。由于长期的隐蔽，身体很虚弱，又患病，便在家中休息与治疗了一段时间。解放军还派了医生给唐生智看病。唐生智将学校交接给当地政府后才离开。

12月14日，唐生智由中共省委统战部干部张立武，解放军21兵团副司令员李觉陪同，由东安来到长沙。

陈明仁起义前后

唐生明*

一

我大哥唐生智于1949年4月29日带着刘兴、周斓、冯天柱一起到长沙后，就一连发了两个电报催我从香港赶快回湘。当时，我爱人徐米正在生孩子，便匆匆安排了一下，于5月11日乘中航公司一架港长班机动身了。那天港穗间气候恶劣，狂风大作，机尾颠簸不停，飞了45分钟才从香港飞到广州。同机的一些人都怕死，不敢再坐了，我因事急仍然冒险飞长沙，在路上几乎出事。

到了长沙，我直奔东茅街9号三哥唐生毅（叔沅）家，在那里见到大哥。他把情况简单介绍后，说：“我们两弟兄分个工，我负责促程颂公，你负责促陈明仁，要负责到底，完成任务。”此后，我就留在长沙，专和陈明仁打交道。

我认为，陈明仁之所以能够起义，主要是他自己内因起作用。正如他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此次毅然转变，决非受人威胁利诱，实本良心主张，但求有利于国家人民，不计本身得失荣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作为他的老友、密友和牌友，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什么他比较相信我？这要从1947年说起。

* 唐生明系唐生智之四弟，总统府中将参军。

1947年夏，陈明仁在东北死守四平街，与共军作了一次恶战，蒋介石大为赞赏。蒋介石为了召开国大而登上总统宝座的需要，极力吹嘘“四平之捷”与“延安大捷”同等重要。

几乎全军覆灭的陈明仁，在“凯旋”回沈阳的那天，当局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自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以下的在东北的军政头头，弹冠相庆，狂欢拥抱。蒋介石并以总统名义，授予陈明仁“青天白日”最高勋章一枚，以资表彰。当时，报纸对此大加渲染，煞有介事地吹得天花乱坠。其实，所谓的“四平之捷”和他们所吹嘘的“延安大捷”一样，其中已孕育了全面崩溃之势。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于同年秋天来华，其目的就在于挽救蒋家王朝在各条战线惨败的颓势。这位特使宛如太上皇，自南京到华北及东北巡视一番，了解到局势不妙，大有挽救不及，无可奈何之概。因为，沈锦一线中断，长春不通，偌大东北，业已被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国民党军龟缩于几座孤城，势如覆巢之卵，岌岌可危。于是，蒋介石迁怒归罪于陈诚不力，一面电促何应钦从美国来归任国防部长，同时委派顾祝同任参谋总长。对于陈诚，名义上是让他出巡东北，实际只是借此赶出南京。陈诚带着满腹牢骚来到东北，念念不忘再返南京，重操兵符大权。

陈诚，一贯专横跋扈，到东北后，并没有稍为收敛，反而常常显露自己如何得宠于蒋，继续大搞排除异己，企图以东北这块地盘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为此，他一方面排挤熊（式辉）、杜（聿明），树立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打击何系人物（指何应钦元老派）。故此，熊、杜倒台于前，陈明仁则撤职查办于后。

熊是政学系的台柱，当然是为陈诚所不容的。杜聿明与陈明仁同是黄埔同学，从历史关系来说，他们都是亲何的实力

派。要指挥陈明仁，必先搞掉杜聿明。所以，他就以杜久病在沪为借口，将杜所掌握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这个发号施令的机构，归并于他掌握的“东北行辕”之中。据当时了解内情者说，陈诚是借魏德迈之口，在蒋介石面前，以熊、杜“贪污、腐化、无能”六字为罪名，搞掉了熊、杜。这种利用“洋大人”告状，谋得渔己之利的手段，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官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恶面貌。

对付陈明仁，陈诚则利用他在保定军校八期的同学刘翰东，以辽北主席之名，出面控告陈明仁驻防四平时贪污不法、盗用公粮及日伪投降后封存的仓库物资等罪名，予以撤职查办。陈明仁就此赶出东北，几成阶下之囚。弹指之间，受高赏而变为受奇辱。当时蒋军将领对此莫不为此寒心，议论纷纷。

二

陈明仁遭此不白之冤，满腔悲愤，寝食失常，无由申雪，只有切齿痛骂陈诚。1948年，蜚居上海国际饭店后，终日闭门不出，往日嗜赌癖性，也毫无兴趣。整天与陪伴他流泪以待的，只有他的结发妻子谢芳如。陈明仁的那股犟牛脾气，经常发作，妻子也难以说服，只好听之任之。记得是某日午后，谢芳如发现其夫，更反常态，狂饮白兰地酒，酒后又徘徊在十二层高楼窗前，谢已意识到其夫轻生之心已决，因此，乘陈醉倒卧床昏迷不醒之机，急忙给我打了电话。在电话中，她如泣如诉地说：“唐大哥呀！唐大哥，子良不好了，赶快来劝劝他。”这一突然讯，我深感事态严重，立即用电话，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并让他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当时在上海的宋美龄。随即，我邀孔去了国际饭店，我们连说带劝地把陈明仁送到鸿恩医院，给以休养看护。

次日，我再上鸿恩医院看望陈明仁时，宋美龄也接踵而来。

她看到陈明仁那股颓唐丧气企图轻生的情景，她以夫人兼师母的身份对陈进行劝慰；并声称她是代表校长（指蒋介石）来的，使得陈明仁受宠若惊。临行前，宋又对陈说：“有关你的冤屈情况，唐生明已向我说明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忠于党、忠于国、忠于校长的，四平之役又是立了大功的。假如校长明了情况，决不会如此处置。”劝说陈明仁要识大体，不要灰心丧气。

宋美龄亲自看望，给陈明仁以极大的安慰，心境也大为好转，但由于受陈诚的刺激太深，不可能三言两语即得以平复。他回顾自己，已是光杆司令，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全国形势土崩瓦解，个人前途渺茫，不能不使他又陷于沉思、徬徨中。

记得十余天后，陈明仁出院来我住地，推心置腹地向我说：“全国各战场每况愈下，国事前途实堪忧虑，老头子（指蒋介石）在划破船，这只破船看来非沉不可。我们同在这只破船上，又将怎么办？胡宗南打下延安，背上包袱。刘峙、薛岳、汤恩伯、熊式辉、杜聿明、孙连仲等人都是一败下台。陈矮子（指陈诚）恋栈不下台，势必也会是一败涂地。我们靠黄埔这块招牌打天下，打了20多年，看来我们迟早会同老头子一起声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我一听陈明仁话中有话，悲叹十分，心中奇怪，他平日对我不谈吃喝，就论脾经，再不就是痛骂陈矮子，而对蒋介石从不谈半个不字，一贯忠心耿耿对蒋不抱任何怀疑的人，今天竟而牢骚满腹，自比“破船客”，难道是“轻生”的念头还没有打消掉？我紧紧的凝视着他，一时间没有摸透心底，难于劝慰。他沉思一阵又说：“我这个受了陈矮子的严重打击的人，何（应钦）、顾（祝同）不见得会重用我，看来老头子方寸已乱，也顾不得这么多。你平日多次向我说到要‘良禽择木而栖’这句古语，今天看来很有道理。我虽非良禽可比，择木倒不可不择。当然啰，我所说的择木，还是要在‘破船’上来

择，死马当成活马医，这样才不愧是英雄硬汉的本色。”

接着他又说：“纵观各实力派，东北、华北、山东的三大军团没有我的份，挤身不进；武汉被桂系的白崇禧紧抓着，我挨不上边；西北的胡宗南，居然来电而且措词恳切，邀请我去帮忙，但西北战场我是人地两不熟，也不知道胡来拉我用意何在？想来想去，捉摸难定，我只有请你来为我考虑一番，以定行止了。”说完后，仰天长叹一声，期待我的回答。

这时的我，已经与党的地下工作者发生了联系。同时，我又想到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知友陈赓大将对自己的教育和关怀，想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都站在人民一边，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使我这个在前半生有着复杂经历的人，深感内疚。我虽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深深感到：为人应该有正义感，作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力尽所能，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才不辜负良师益友的教诲，弥补自己的过失于万一。

而对着陈明仁当时的矛盾心情，究竟应该对他如何进行工作才好呢？我考虑到这个人的牛脾气，是一个有硬汉子之称的武夫，觉得不可急促直下，只能象下棋一样，一步一步地下，否则会激起他的反感，欲速则不达。因此，首先必须打破他投奔胡宗南的念头。胡是个顽固到底死跟蒋介石的走狗，如果把陈明仁网罗去了，必将助桀为虐，是大不利于人民的。而且他一去，以后我就难于见其面，更少了说服他的机会。所以，我就对他说：“子良兄！你如果去依胡，我看倒不如去依白（崇禧）。胡这个西北王，他的地盘眼看动摇，延安虽说打下，可是连脚都站不稳，还能谈到其他吗？而且胡宗南用人，向来是“黄”、“浙”、“陆”、“一”（即黄埔同学、浙江同乡、陆大毕业、军校第一期）这四个条件必备，尤其是以浙江同乡作为中心，籍此可以和老蒋通气。你一来对西北地理不熟，二

来与胡系部队又无历史渊缘，你这一去，好象鸡群里来了个鸭子，又何苦去依人作嫁呢？与其将来进退两难，不如现在婉言谢绝。我们都是湖南人，还是靠住两湖为好，而两湖现在程（潜）、白（崇禧）手里，划这个‘破船’，不论划得好不好，总比投靠胡宗南要有前途。”陈当然尚不了解我此步棋的用意何在？双手抱着头，沉思片刻后，无可奈何地对我说：

“季澄兄，你出的主意颇合我心。程与我有师生、同乡之谊。当年我进黄埔是他主办的第六军讲武堂合并去的。今天，他虽居党国元老，可惜徒有虚名，并无实力。桂系军师白崇禧，名望实力俱全，可是，我与他素无渊缘。仅在第二次四平战役解围后，他来东北视察，与我谈得很投机，还给我戴了不少‘高帽子’，难道说仅凭这点关系，一面之交，他会重用我这个一贯忠于老头子的人吗？”我觉得他说的也确是实情，若要插入桂系集团，对他来说，确也不易，蒋桂门户之分，有泾渭难同之实。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就把我与白崇禧在北伐前后有过的一些来往以及白崇禧怎么引我进黄埔军校的经过，向他作了介绍，说明我和桂系人物的私交一直是无间的。接着我又向他打气：“你是一个打硬仗以猛将得名，当今形势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有这个优越条件，白崇禧是不能不起用你的。”但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我和陈明仁都是黄埔学生，直接引荐，桂系军人难免见疑。因此，我提议最好请当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出面，我自从中斡旋，尽量争取在对陈明仁的地位安置上，不会低于过去，而且还要力争抓到实权。陈明仁对我的这一番筹划，深表赞同。后来的结果，也完全如愿以偿，这就是陈明仁进入桂系的梗概。

三

陈明仁投身到桂系后，果然得到白崇禧的重用。1948年秋，

首先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陈便利用这个头衔，广为收罗自己的旧部，重整旗鼓。后陈又擢升为第一兵团司令，卫戍长沙。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白崇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真是大刀阔斧，很有派头。其实，白之所以用陈，是要的手段，希望陈明仁在重赏之下，把在四平之战的死拼硬打那股牛劲使出来，为他打头阵，作桂系的牺牲品而已。对于此种情况，我是了如掌指，但不好明言以告。而陈明仁只意识到白崇禧用人痛快，受宠若惊，一时大有以效忠蒋介石之心回报白崇禧之势。后来事实教育了陈明仁，白崇禧的如意算盘终于成了泡影。

陈明仁已身居要职，希望更得我的帮衬。他建议我，也组成一个类似兵团司令官衔的大衙门，我谢绝了。并对陈明仁说：“我不是要做大官，只想做点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当今时势，更不应为个人谋。对外来说，我是总统府中将参军，有这个头衔，我蛮可应付了，不劳你费心。我倒要求你有事和我商量来办，发牛脾气干蛮事可不行啰！”陈明仁听罢，慷慨激昂地拍着我的肩大声地说：“你我之交已非一日，最近数月，你与我共患难，这是生死刎颈之交呵！我向来鲁莽从事，不及你粗中有细，到处有人缘，总归一句话，今后只要你的话在前，一切都听你的。”这席话正是我拉他走第二步棋的开端。

当时，北平和平起义之风，已在国民党统治区越吹越旺，和平运动也正在湖南各地酝酿。为了打击反动势力，防止反动派破坏，促进和平运动，利用陈明仁守卫长沙的这一武装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而要保住这支武装力量，关键是陈明仁能否取信于白崇禧。

当时的陈明仁在程潜和白崇禧为争夺湖南这块地盘的明争暗斗中，由于多种原因，左右为难。因此，我就乘机向陈明仁指出了程潜迟早会被白崇禧挤出湖南的道理，劝他只有取信于白，才能抓到实力，有实力才有戏唱，否则，不堪设想。

为了便于做好陈明仁的工作我千方百计通过陈明仁，于1949年7月底委派了我所熟悉的而且比较进步的黄克虎当了陈的代理参谋长。黄任代参谋长后，不仅使我们内无顾忌，而且还可以给我们上下通气，事无大小随时与我们商量而行。至于我与陈明仁的关系，通过黄也就更加密切了。

当时的陈明仁，他的内心世界，已经有了进步的萌芽。他已经感到蒋家王朝不得人心，朝不保夕。共产党之得失下，是人心所向。他曾经感慨地说过：“我生平只知拼命打仗，以死报国，而今是国不成国，君不成君，臣不成臣，如何是好？”这说明他内心斗争激烈，何去何从已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因此我乘机劝他说：“目前国民党人心尽失，败亡之局已成，你是看得到的，至愚的人也蒙不过去，何况你是明眼人。‘良禽择木而栖’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如果立足点不以人心归向为转移，那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悔莫及喽！”蒋介石下野，李、白虽有野心，想继蒋家衣钵，只是白日做梦。而今兵临城下，程颂公能识大体，以大湖南主义家长自居，倡导和平运动，尚得人心……。”陈明仁听了我这番劝告后，愁眉苦脸一扫而开，拍案而起逼视我说：“只有共产党得民心了！……。”

当时，他那种迫切的心情确实动人心弦，而我反而慢吞吞不愧不忙带开玩笑地说：“你号子良，就该说良心话，办有良心的事；我叫季潜，也该说有理的话，办有理的事。”

从此，我们的一切就开诚布公了，为迎接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定工作。

长沙和平起义了，我终于“负责到底”完成了任务。起义后，陈明仁任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我任副司令。不久，李克农同志又要我去香港协助策动“两航”起义，我又坐着飞机回香港去了。

起义中的傅正模将军

韩子庚*

傅正模将军是随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的重要将领之一，对湖南和平解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从1937年起即跟随将军，戎马倥偬12年，关系较密切，起义期间将军又一直住在我家，所以我对起义的经过情形知之较多。

傅正模将军是湖南浏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历任步兵团、旅、师长、副军长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解放前夕，先后任第六战区中将高参、重庆国防部第三军官总队总队长、上海师管区司令、第五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和第一兵团（即陈明仁兵团）副司令等职。

起义前后，将军每次从驻地衡阳来长沙，都是住在我家，即长沙市城南区青山祠翕园二号，人称韩公馆，或称“傅公馆”。我本人亦随将军起义，并任第一兵团第二军总务处第一科上校科长。

1949年上半年，湖南形势十分紧张，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败局已定，千里防线既破，湖南即首当其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令白崇禧由武汉退守衡阳，控制湘赣，大批的军备物资源源运来，军统特务也蜂拥而至，形势是十分险恶的。

* 韩子庚跟随傅正模将军12年，与傅正模一道起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军先后4次往返于衡阳与长沙之间，其起义之举，就在这4次活动中由酝酿、策划、直至成功。

将军第一次来长沙是在3月中旬，其夫人包粟晖女士同行，在我家小住数天。这次来长沙是专为拜晤陈明仁将军，据我所知，短短数天中曾两次亲往织机街耕耘圃陈公馆拜访，两位将军在言谈之间对时局所见略同，彼此皆表示了愿意合作共事的愿望。

将军第二次来长沙是在4月上旬，记得适逢将军长女云英小姐生日，所以还在我家便宴庆贺。这次将军是专程拜晤陈明仁将军和晋见程潜将军，请示对时局的看法。此外，还曾去益阳一行，我亦随侍同往。在益阳视察了他自己开办的一个抗属农场（即竹荆寺正晖农场），并会见了驻军头头王中柱等人。在将军任陈诚所部第七十五军第四预备师师长时，王曾任该师副师长，当时是驻益阳第×师师长。

将军第三次来长沙是在7月下旬，此时将军已就任第一兵团副司令，于是由兵团在我家架设了自动电话。将军的公务十分繁忙，而与此同时，广州行政院和盘据在衡阳的白崇禧也加紧了对将军的控制，白曾示意授予将军以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之职。而对这一情况，将军甚为焦虑苦恼，曾多次私下与我交谈，因当时包夫人还在衡阳，处于白的监视之下，如果贸然拒绝白的授意，则势必危及包夫人的安全。此事，程、陈两将军也洞察其情，对将军的处境深为理解，几经磋商，最后决定派我去衡阳，护送包夫人先去桂林，再相机来长沙。但正当我准备启程时，将军又突然决定亲赴衡阳。

将军第四次来长沙已是7月底了，这次是取道广州乘飞机来长沙的，但包夫人并未同行。原来将军虽已接受了“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的任命，但包夫人却仍被“邀留”衡阳，白

崇禧之用心固然良苦，而将军亦洞若观火矣。因此，一下飞机就驱车往见陈明仁将军，细陈详情，叙谈有时，然后才来我家。

此次将军来长沙，明为奉命接任霍揆彰的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实际上仍与陈明仁将军一道处理兵团军务，至于接任之事，则仅去信岳阳莫一钧（莫曾任将军的秘书），嘱其与董总部作初步联系，但他始终未回信，此事也就没有下文。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情况也很复杂。一方面程、陈两将军的和平意图日趋明朗，另一方面广州行政院和衡阳白崇禧更加紧了对湖南的控制，军统特务和一些反对和平的顽固分子也加强了活动。我记得有一天忽然接到黄杰的电话，黄曾任第五编练司令部司令，与将军有共事之谊，他在电话中要求会晤将军，但将军请他来我家会面，他却又未来。后又多次来电话，我均以将军外出为辞推却了。不久，又有一位广州来客邓文仪先生打来电话要求会晤将军，也被我婉言推却了。还记得在七月下旬的某天，由广州空运一批新式武器来长沙交傅总部。这批武器共有十多箱，由我代收后存放我家。我随即打电话告知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兵团即派员来我家并会同我将这批武器运去兵团。事后将军表示这样处理很及时。

7月底，李明灏先生秘密来到长沙。李先生是著名和平人士，在国共双方皆颇著声望，他的到来，标志着湖南起义已到了最后摊牌的关键时刻。

8月2日清晨，有一位身着便装的客人来到我家，他笑着问我：“你爸爸起床吗？”我知道他把我误认为将军之子建平了，便告以姓名。当时刘东麓（岳阳团管区司令）也住在我家楼上，适刘下楼看见来客，才知道客人就是李明灏先生（刘的前妻是李的胞妹，故而认识）。我立即报告将军，将军十分高兴，寒暄之后与李先生密谈了约半小时，然后两人同车外出。中午将军打回电话，告诉我他在唐生明家开会，嘱咐不要准备

午餐。直到晚上九时许才回来，我见他精神兴奋，面带喜色，便问他会议情况如何？他说：“开了一整天会，一切都就绪了！各方一致同意和平解放，至于迎解的具体事项，近日内即可拟就。”

第二天（8月3日），将军去兵团继续开会。此时起义大计已定，但对将军来说，还有一个难题尚待解决，就是包夫人仍在衡阳，处于白崇禧的监视之下。当时形势十分紧迫，既不可能待包夫人安全撤出之后再宣布起义，也不能够置包夫人的安全于不顾。为求两全之策，将军几乎绞尽脑汁，最后经与程、陈两将军及李明灏先生反复磋商，才决定一方面立即派人（即胡正鹏）飞赴衡阳将包夫人护送到桂林，另一方面则安排一条“假拘捕”的苦肉计以障人耳目，于是便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

8月4日，程潜、陈明仁联名发表通电，宣布湖南实现和平解放，通电有“……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之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等语，通电署名者有：长沙绥靖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等三十多人。

而在8月5日的《中央日报》上，却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称：“程、陈两将军随将匪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傅正模以及白匪崇禧留置长沙的所有特务匪徒拘捕。”这本是起义领导机关为保护将军亲眷的安全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在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将军就已被任命为起义部队即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兵团第二军军长。在8月7日晚上，程、陈两将军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将军还兴高采烈地出席作陪。

总之，将军以第一兵团副司令的身份参加起义；而同时又以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的身份被“捕”，这种看似荒唐的局面，正是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殊不料时隔十多年之后，这条消息竟然成了将军的弥天大罪，当时发布这条消息的

原委，知情者何其多矣，而当将军遇难之时，辩诬者又何其少也，岂可悲也哉？抑可寓也哉？

和平解放以后，起义部队于1950年春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一兵团，将校级军官都进入军政大学学习。上级还特地给将军安排了一套住宅（即长沙市县正街四十二号），不久包夫人携子女从香港平安回到长沙，将军终于合家团聚了。

回想当年起义虽已告成，但局势却并不平静，频繁的空袭和特务窜匪的骚扰暗杀活动，真是防不胜防。记得就在宣布起义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将军和我乘坐小车去岳麓山兵团驻地，刚驶近江边，就发现有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跟踪盘旋，将军见势不妙，一掌将我推出车外，自己也跟着跳出，我们刚刚卧倒，飞机就俯冲扫射，有几发机枪炮弹正好击中汽车的后座，真是好险呀！

在时过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幕死里逃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昨日事，而将军已作古矣。

苦难湘人要和平

解放前，湘省人民饱经战祸，受尽苦难。八年抗战，湘省破坏最剧，出兵达200万，出粮超过5000万担，敌骑蹂躏50余县。抗战胜利，元气未复，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1948年，湖南征粮1600余万石，1949年征粮额1800万石，配兵额25万。1948年发行“金元券”，搜括湘省黄金3万3千两、白银20余万两，银元80余万，致使民穷财尽，物价飞涨。加之，祸不单行，1949年春夏又遇百年未有的水灾，殃及64个县市，淹没1535万亩田地，死亡近6万、灾民200余万。故湘人痛恨内战，要求和平更为迫切。

（文 积）

回顾解放前一段斗争历程

萧 文 *

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了，回顾解放前几年的斗争经过，记忆犹新。回首前尘，深深感到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告慰死者，激励未来。可是，提起笔杆，千头万绪，简直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那就让我把话扯远点吧。

我生长在湖南宁远。宁远这块土地上，出过不少著名人物，其中有一位带有传奇性的人物，姓成名铁侠，字百炼，家住离县城大约20华里的白土村。成铁侠幼年读私塾，粗通文理，爱好书法，并学画花卉鸟羽之类。20岁前在农村教初级小学。不久，投笔从戎。最初考进唐生智部下当“学兵”。由于性机警，待人侠义，且有一定文化，因之提升较快。等到当了排长、连长之后，又进过短期军官训练班，更有了“资本”。轮到何键当湖南省主席时，他已经是少将，长沙警备旅旅长。这时，他在今民主西街拐角处兴建了一座“天台别墅”（门额上这四个字至今尚依稀可识），与周南女校高材生刘某结婚。笔者也就是在这时，外出求学，路过长沙，被同乡拉去，蒙受过他一次款待。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张治中替代何键主湘。成铁侠旅长当不成了，悄然回到故乡宁远，与旧部张明达等用计把欧寇深沟高垒、用精兵固守、埋藏在碉堡中的上千条步枪、弹药等弄到手，立即建立一支拥有三千余人的队伍，打出

* 萧文当时参加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

“湖南抗日突击队总司令部”的招牌，并发表宣言，声称经过短期整训，即将假道湘赣，开赴前线。这一来，使得张治中措手不及，只得求援于唐生智。最后由唐生智之弟唐生明出面调停，改编突击队为省会警备第二旅，唐生明任旅长，成铁侠任副旅长，发给全旅给养。张治中还叫人写了一篇骈四俚六的文告传遍三湘。从此，成铁侠成了新闻人物，同时也成了欧冠的死对头。

成铁侠再次垮台后，曾经一度出钱在桂林办报纸，从而结识了一些文化人。直到把本钱亏蚀净尽，政治上什么也没有捞到的时候，走投无路，只好与住在沦陷区的唐生明联系，取道香港，到达上海。先后出任汪精卫汉奸政府苏北及浙江省保安司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发布命令：限令敌伪军队就近向我抗日武装缴械。当时多数敌伪军队别有用心，纷纷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成铁侠经过再三考虑，毅然决然把所辖部队集中，向新四军投降。此举曾经受到毛泽东、朱德的嘉奖。接着，还自动请求到湖南老家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由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广安排先到中原局江汉军区报到，1946年成铁侠秘密到了湖南。

1947年秋末冬初，在成铁侠、张冰、李荫田等共产党员策划下，以衡阳盐务局税警队为主力的武装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名为“中国民主联军”，总司令为李万衡，政委成铁侠。在由衡阳开赴新化出发前，因叛徒出卖遭到失败。李万衡被捕，成铁侠及其他中共领导者，或向常宁、桂阳撤退，或逃回江汉军区。这次武装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湖南第一次武装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之大，及于全国。湖南省内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起义军的情形（当然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夸张、演

染)达半月之久。反动派提心吊胆,寝食为之不安。

李万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步科,家住宁远仁合圩附近,是我的同乡、好友。1942至1943年,我在衡阳与张冀合办《国际论坛报》,得到他大力支持。从那时起,他就倾向革命。他被捕入狱后不久,江汉军区派来联络员欧阳魁了解起义失败后的事态发展,并相机进行营救,还带来了成铁侠给有关各人的信件。特别叮嘱我要用各种社会关系把李万衡从军事法庭改为由一般法院审讯。我先是派人冒充家属探监,用宁远方言与李万衡直接交谈,瞭解案情后再谋疏通、缓解。当时正值金圆券改制,手头拮据万分,只好把买进不久的培元桥复初里私宅变卖,作为活动经费。最终李万衡出狱到了江汉军区。

以上是我与江汉军区三分区开始联络的情形。再说刘润世,他是岳阳人,在长沙一中、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念过书,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充当岳阳县农民协会秘书。“四·一二”事变,逃亡在外,改名换姓,后来混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团附。抗战伊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特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归队,被接纳为特别党员。部队进入福建,其时福建省主席为刘建绪,刘润世利用湘人关系,居然当了长乐县长。日寇逼近,率领县警察大队上山打游击,逐渐扩充队伍,开辟根据地,终于建立了“闽浙边区游击纵队”,经华东局党委批准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游击纵队在与日寇作战中,击毙了日军大佐一人,并缴获其登陆艇,因此,士气大振,并深得民心。

1947年,经福建中共地下省委委派回湖南工作。具体任务是在湘鄂边区,即岳阳、监利、蒲圻一带建立山头,迎接大军过江。嗣以形势巨变,江汉军区党委城工部长何定华催他赶快回湘搞策反,多与上层打交道,广为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并指定他今后与江汉军区三分区城工部长郭伯诚直接联系。1947年底,他到了长沙。先与医务界有老关系的人接

船，站住了脚，然后试探寻找由江汉军区三分区派来湖南活动的成铁侠有过联系的人，进一步了解新的形势，以便开展工作。于是，在1948年春就在留芳岭15号和我接上了头，以后又陆续结识了胡建文、黄定戎等人。

刘润世最初交我的任务是：设法打进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党报——《湖南日报》做主笔，与报社负责人汤继成达成默契，充分利用岳南铸字印刷厂的条件，印制宣传品。综计我在《湖南日报》任主笔期内，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八、九种。绝大部分是交湖南大学学生散发的。我与湖大地下党员、经济系教授朱剑农由宣巽东陪同见过一面。据说，这些文件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我还介绍刘润世和欧阳魁相识，并约定凡是发往江汉军区三分区的电报，都交欧阳魁转给湖南省银行吴某（名字忘记了）拍发。

我也向刘润世汇报了欧阳魁衔成铁侠之命，通过种种曲折，在长沙县霞凝港建立了一支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由曾任国民党53师师长周起铎出面组织的县自卫队。1949年春夏之交，白崇禧进入长沙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长沙。一些上了黑名单的进步人士准备到霞凝港暂住。与成铁侠有联系的《晚晚报》康德和《国民日报》欧阳敏讷先后到过那里。还建议地下民盟的萧敏颐必要时也去避风险。

1949年初，长沙各界人士都在谋求湖南“自救”，也就是说和平解放已有了端倪。针对这些情况，我们的工作开始转变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而奋斗。这时，刘润世一面报告江汉军区域工部，一面与湖南地下党省工委欧阳方同志协商，征得欧阳方同意，成立对内不对外的组织——湘东革命工作委员会。具体由以下人员负责，更为广泛地联系各界人士加紧工作：

宣传——萧艾，通过吴思敬进一步掌握报纸。

学运——黄定戎、宣戛东，以湖大为重点。

策反——胡建文、吴健人。

工商——曾诚意、萧蘅、沈明扬。

联络——卜琦、寻先治。

这仅是内部分工，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切从需要出发。例如：为了策动一支国民党军队起义，这是朱刚伟牵线的，因为这支军队指挥官是朱刚伟原先的部下。但这支部队的上级指挥官和萧艾、胡建文有某种关系，结果就由朱、萧、胡三人远离长沙，到部队中去接洽，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很好。又如：关于湖南工矿重点调查，本是工商组的事。但胡建文是省建设厅主任秘书，他又介绍萧艾做建设厅荐任视察，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写好一册数十万字的《工矿调查报告》（解放后送交中共湖南省委）。

如前所述，我们的工作，既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以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为重点，经过研究，认为促使湖南和平解放，主要目标应放在程潜、陈明仁身上，迫使他俩作出果断的决策。具体措施是加强与程潜、陈明仁最接近的人密切接触，把他们争取过来。决定萧艾去做刘岳厚、蒋岷的工作，胡建文、卜琦去做何汉文的工作，胡建文、宣戛东去做汪士楷的工作。还由萧艾向欧阳魁交代，要欧阳敏讷等人去做程博能和程潜家族中其他人的工作。

在这里，我要简单地谈谈刘岳厚的情况。刘与程潜为醴陵同乡，醴陵一县前后出过三位省主席，全国只有广西容县可与比肩（容县有黄绍竑、黄旭初、何柱国）。最奇的是，醴陵的程潜、何键、刘建绪均把刘岳厚认作“智囊”。凡遇重大问题，都请他借箸代谋。何键主湘时，国民党甲派中人如张炯、王祺，都对刘岳厚恨之入骨，使他受到“停止任用十年”的处分。他在那十年中，办报、办企业、与在野名流过往，反而成

就更大。眼下他充当长沙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可说是程潜贴近的人。刘岳厚年过六旬，头脑犹十分敏锐，思想也相当开放。30年代末期在衡阳手创《开明日报》，曾接受不少进步人士在报社工作。1946年，住长沙的国民党国大代表以联谊会的名义开会座谈，一致决定急电蒋介石在湖南停止征粮征兵，以纾民困。这件骇人听闻的事，就是刘岳厚和蒋崑倡议搞起来的。由蒋崑推荐我在座谈结束时当场起草电文，刘岳厚审阅后谬加赞许，并当众声言与我作忘年之交，而且约定第二天去小吴门外藕芽冲三号他的私寓叙谈。蒋崑交卸省田粮处长后继任长沙市长。程潜回湘，财政上一筹莫展，甚至连日常用度也依靠蒋崑代为筹措。更不用说在竞选副总统时曾经得到蒋崑的大力资助。因此，他视蒋崑为左右手，三日不见，就接二连三地在电话中喊：“静逸，你怎么不来见我？”我当时教课、写稿之余，承兼蒋崑的私人秘书，对他颇为了解。他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就有不少左派朋友，和他谈起法国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的历史，他都讲得头头是路。因此，我乐于去游说。记得我第一次和刘岳厚谈到“正经事”的时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他把客人都打发走了，空荡荡可容上百人的斋室里只剩下一老一少。他坐在可滑行的太师椅上，见我靠近，问我最近有何佳作，我背诵了和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一首拙词。他要我写在纸上，对末尾两句：“君知否？是谁家天下，便看今朝。”反复吟咏。忽然站起身来，拉我去附近藕塘边散步。他那半月形镜片下露出炯炯发光的眸子，口里却叨念着拙词中另外几句。

“怅蜚鸿遍野，韩生孤愤；蛾眉谣诼，朋子离骚。民主潮流，自由世界，巧舌如簧枉费雕。”此刻，使我惊异的，不是老人过目不忘的特殊记忆力，而是使我看见了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因此我单刀直入地请他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他坦诚相告：他已经做了不少，今后实当全力以赴。我

辞别时塞进他手中一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据我所知，刘岳厚对湖南和平解放，贡献甚大。比如说，当程潜彷徨未坚之际，他的儿子程博洪从上海来到长沙。父子相聚，密谈竟夕。第二天程潜终于作出了决定。但就在程博洪去见乃父之前，先与刘岳厚作了长谈。刘说：“尊公辛亥革命之役、倒袁之役、北伐之役、以及在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始终都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他在国内居有崇高地位，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尤其是在三湘子弟中，被奉为‘家长’。前年竞选副总统，五百湘籍国大代表，自始至终，无一人动摇，被人誉为‘五百壮士’。由此可见，他的地位远非谭组庵、赵炎午所能及。希望这次经受得起考验，不要落在唐孟潇之后，辜负了三千万湘人的期望。”他这席具有份量的话，成了程博洪对乃父进言的主要内容，深深打中了程潜的心。事隔多年，我从程潜身边工作的人员口里得到证实，认为是可靠的。

汪士楷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岁留学俄、法，加入过共产党，并出席过第三国际召开的会议，深受程潜尊敬，同时也为陈明仁奉为老师，当程潜回湘创立克强学院时，坚邀汪先生屈就院长。而汪与胡建文订交于莫斯科，彼此私谊甚厚。何汉文留俄时写过《俄国大历史》，在国内，他与蒋赜政治上的靠山都是于右任。胡建文于1948年由楠木厅迁居肇嘉坪，就与这位老同学再度同住一个屋子。何汉文这屋子贴隔壁为卜琦的家，因而成了我们的“交通站”。何汉文夫人邵一萍是著名画家，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我们接触多了，思想上也不免带点赤色。

刘岳厚、汪士楷、蒋赜、何汉文这四位对程潜有影响的人，在和平解放事业中，立过功劳，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然而，我看过30篇写湖南和平解放的回忆文章，却无一字提到他们，这难道是公允的吗？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了。8月6日，我们聚集在熙

台岭41号曾诚意家，庆祝解放。到有刘润世、成铁侠、胡建文、张蕴良、寻先治（他刚从牢里放出来）、萧骧、沈明扬、黄定戎等十余人。第二天，张立武代表中共省委、省政府到坪肇嘉看望湘东革命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说我们为湖南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人民不会忘记。又过了几天，刘润世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充当调查研究室主任，兼省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因为他离湘时间太长，对情况不够了解，拉我去协助做调查研究工作，一直到10月底。我们这些人一向是在家里吃饭，不拿公家一文钱，也不要任何名义，所以我在统战部工作了几个月，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这篇文章，草草写成，对曾诚意、萧骧、吴健人等在地活动时期所做的大量工作写得很少。老实说我们是在临近解放时才碰头的，以往没有横向联系，

解放前夕的长沙学运

1949年4月7日，由湖大发起，举行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争取真和平大会”。会后万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4月12日，正式成立“长沙学联”。4月20日，长沙学联又发动了“和平签约运动”，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22日，学联与一百多个人民团体负责人，商定于4月24日举行10万人示威游行，后因破坏，故将游行改为总罢课3天。6月12日，特务抓走湖大尤汉河和一师钟振龙两位学生代表。19日又暗杀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24日下令解散长沙学联。但和平运动是扼杀不了的。长沙市各界4千多人在湖大举行了追悼高继青大会，送葬岳麓山时他们含泪高呼：“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夫子）

我所知道的省保安司令部起义

陈伯钧*

1947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委张弼推荐我到省保安司令部一总队任少校政工干事。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兼任保安司令，他早年在湘军十五师当过师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由湖北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因此，十五师的一些老人多去找王谋一官半职，至少也可以解决“赋闲”之忧。当时省保安司令部仅有两个直属总队，一总队驻长沙执勤，二总队驻湘西沅陵一带。因此一总队实际上是王东原的警卫部队，总队的骨干，多半与十五师有渊源。少将总队长周先仁就在十五师当过副师长。在我去一总队之前，总队政工室主任的缺一直空着，保安副司令陈为韩鉴于推荐我的背景，原拟派我充任此职，但因总队长的老同事邓光性（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在十五师政治部当过上校副主任）没有地方摆，于是就发表了邓为上校衔少校级政工主任，实际上同我是一个级别。邓接过差事，感到委屈。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发感慨：“别人升官发财，我呢，降职降级混日子。”开始，邓一个月到总队部应两三次卯，往后就干脆不来了。每个月的薪饷都是我派传令兵送到府正街他家里去的。

1948年8月，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

* 陈伯钧当时任少校文书科长。

不久，白崇禧在武汉组成“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武汉行轅移驻长沙，改为长沙绥靖公署，辖湖南、江西两省；绥署主任仍由程潜充任，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还兼省保安司令。程回到湖南，省会各界人士聚会表示欢迎，尊称他为“颂公”、“家长”。9月中旬，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召集司令部及其直属总队上尉以上官佐在礼堂排成队列静候颂公训话。这天上午9点，程潜由肖陪同，缓步进入礼堂，并向全体官佐点头致意，然后走上会台讲话。程态度和蔼，言语亲切，确有长者之风。他讲话的大意是：去年以来，中央意拟还政于民，实施宪政。颂云未遑考虑个人得失，参与了副总统的竞选。嗣以各方力量相互对抗而未获所望。此事虽在意料之中，固无足介怀。然事情亦有转缓之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能有机会回到湖南，为家乡办事，诚以为幸，极感光荣。“八年抗战，湖南灾难深重，长沙大火，古城化为灰烬，四次会战，遍地硝烟，寇骑所至，烧杀掳掠，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真不忍一一追述。抗战胜利，祖国光复，医治战争创伤，方期休养生息，又不料燃起了新的战火。现今农村凋蔽，工商不振，三湘民众喘息未定，复将重陷困境。目睹此状，能不令人忧急如焚。是以颂云深望今日到会的全体袍泽，共体时艰，献智竭虑，我们大家计道亟谋解民于倒悬的良策。湖南保安部队是三湘父老的子弟兵，保境安民，为地方造福，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今后我等必须睿观大局，尤应注意本省之生存与发展，一切行动唯三千万民众之利益是从……。程的这次训话对我的思想启发很大。因此，他后来在农村实行二五减租，停止征兵，拒用银元券，乃至最后号召和平起义，我都能够理解。

程潜训话后不久，保安部队实行整编。这时驻在五里牌唐生智私人所建佛堂的一总队，改编为保安第三旅第七团。总队长不用说，早已“请辞”离职，新任团长何震藩，到团接事的

那天，大家才明白，原来他就是程潜训话时站立于台侧，身高一米八二，右肩斜披宽红带的值星官。何到任后，了解到老资格的邓光性长期未曾到部工作的实际情况，即以部队长名义宣布我为政工室代主任。团部除政工室外，其他如副官室、军需室、文书室、军械室的官佐，全部换成了他自己带来的人员。11月上旬，全团官兵在协操坪（今东风广场）接受了长沙绥署的点验，没有好久就奉命开赴南京。开始我对此心里一惊，连忙去问何震藩。何平坦地告诉我，去南京的任务是把士兵拨交国防部指定的部队接收以后，全部官佐立即返回长沙再接新兵。他还要我开个政工会，明确任务，消除疑虑。但等到我召集各营连指导员来团开会时，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三营指导员徐鸿鉴（军校十五期毕业）在会上发言说，一总队的士兵来自各专区的保安队，都是抗日时招募的一些躲壮丁的农民，训练了这么久，又打过一些小仗，素质算是不错的了，如今要交出去，未免太可惜。会后，他还告诉我，何是刘嘉树（绥署参谋长）推荐来的，他俩是小同乡，何如果向刘请求，七团的兵不交出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何竟然愿意交出去，这很可能是何想借此机会把兵交出去以后，再更换下面的营连排长。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从往后的事实来看，果真如此。12月初，保安团2200多官兵（不含别的部队）从长沙火车北站乘专列至武汉，再乘大江轮到南京。队伍过挹江门时，站岗的八个宪兵还很傲慢地要求部队整顿军容以后才准通行。我们在南京停留了10来天，每日清早飞机成队列地飞向淮海战场，半空嚎叫，来往如织，大家都知道局势已经十分严重。就拿我们所到的一些军事机关来看，也都现出了惊慌的气氛。12月下旬，七团官佐乘火车经上海、杭州、南昌回到长沙，沿途车站多是军人上下，一片混乱。●

1949年1月，保安七团团部驻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这时我的思想认识又有了变化。去南京前，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失尽民心，终究要垮台，至于何时垮台，则无从预断。南京归来后，我的结论是“大势已去，亡无日矣”。问题是我个人出路何在，心急如焚。不过当时也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程潜德高望重，职位显赫，面对当前局势，他总不能不考虑一个万全之策。我们是他的部队，跟他走也许有一线生机。因此这时我急切希望七团尽快补充兵员，成为一支真正的部队。3月，团部转驻浏阳永安市，终于把益阳、沅江、汉寿接回来的新兵，编成了一个营和两个直属连。后来司令部拨给我们一个直属大队，又编成了一个营。绥署给了不少出院的伤病员，也编成了一个营。全团除绥署给的这个营和上级派来的副团长李忠忱以外，其余各营、连、排长都是何震藩的益阳亲友，士兵素质远不如前。4月份，七团返回长沙，不久又开赴湘潭，驻女子师范。这一时期，我按照何震藩的意图，组织各营、连指导员在市内搞了一些宣传活动，还召集镇、保长及商界人士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我根据去年9月程潜训话的精神，阐述了保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当前的行动，希望地方人士竭诚拥护程潜省主席治湘的各项主张，协助我保安部队加强城防治安，维护社会秩序。6月间，保安副司令彭杰如来湘潭巡视部队。保三旅旅长张际泰召集各团排长以上军官集中在湘潭剧院听彭训话。彭讲了一个多小时，大意是：（1）省内各军事系统所辖兵力分布情况。白长官（指白崇禧）主力位于衡山以南、衡宝公路两侧；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所辖各军、师安插在长宝路各城乡点线之间。而我保安部队则应集结于潭宝路西侧一线，俾以静观大局，相机行动。（2）共军进展很快，大部队

已经过江，可能即将进入湖南。我保安部队应临危不惊，要有思想准备。对于各种军事力量，均应镇定自卫，严加防范。此外，还要切实维持好地方治安。（3）保安部队全军上下要注意时局变化。程主席兼司令带领我们，自有主张。我们要上下一心，紧密团结，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从程颂公的指挥。彭这次讲话的特点是：明确之中有模糊，模糊之中有启发。如“要有思想准备”，什么准备，是战还是和？“要镇定自卫”，对其他军事力量，本是友军，为什么搞镇定自卫？程潜“自有主张”，什么主张？总之，这些话耐人寻味，细心人还是可以领会得到的。彭这次来湘潭视察部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消除张际泰与何震藩之间的矛盾。原来张、何二人在湘潭都想扩充力量，何想利用湘潭在乡军官搞一个补充营，却为张所觉察，对此大发脾气，曾公开指责七团，因此张、何二人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彭这次来湘潭，张、何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不久，七团由湘潭开往花石，每个士兵发两块银洋（何也让政工室借了二十元，因为政工经费系由司令部政工处拨发）。许多士兵都到镇上买日用品，不知哪个连的士兵所付的银元有迹印，与店主发生争吵，这时恰遇张际泰路过，他大发雷霆，竟把那个士兵枪毙了。此事引起了七团官兵极大的不满，何认为这是张有意压他的威风。本来，何与彭杰如是同乡，关系甚密。彭肯定会随程起义，何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脱离大部队而提前起义，我认为有三个原因：（1）地下党的同志主张提前行动（七团开出湘潭后，经常有穿便衣的客人住在团部，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2）何可能认为提前行动将会得到共产党更多的礼遇和更大的器重；（3）也可能是何对张际泰表示不满的公开举动。总之，何起义如此之快，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因为7月上旬，七团离开花石镇，来到了离衡山白果不远的晓南港。这

里是一个偏僻之乡，没有大屋，政工室驻在团部附近的另一户民家，每天只是叫传令兵于上下午各去团部联系一次。住了3天，我自己去团部想问问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谁知一到那里，团部却已不翼而飞，问房东才知道，一清早就已全体开拔，去向不明。“是副官室忘记了通知我们？”我感到有些纳闷。只好带着政工室人员折返湘潭，寻找团部。路上，边走边打听，到第三天中午，在射埠附近遇见了李忠忱，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一道吃中饭。他告诉我：“何与保安八团团长王谨权一道‘屯杆子’，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前天开赴新桥与八团会师。第三营（绥署补充的那个营）营长喻森把队伍拖走了，七团力量明显削弱，现在看样子，王谨权要吃掉七团，军心惶惶，乱哄哄的。”原来李对何素有意见，他继续对我说：“倒向共产党是大势所趋，我们早已心领神会，而何震藩却搞得很神秘，有什么事从没有同我商量过。奇怪得很，我这个副团长远不如他那个当排长的弟弟。他拉队伍采取笼笼哄哄捉迷藏的搞法，不垮台我不姓李。”饭后，李邀我带着政工室人员（两个干事、一个文书、两个传令兵）到司令部去。他告诉我司令部已迁往邵阳，于是我们同李一道奔赴湘乡，沿潭宝路，步行去邵阳。走到湘乡永丰（今双峰县），保三旅也到了这里。我和李随即去旅部报到，见到了旅长张际泰和参谋长熊彭年。他们不知为什么对我们的晋见不大感兴趣。所以我和李没有等到张发话，就走出了旅部，带着政工室人员继续朝邵阳方向前进。

到了邵阳，在农民银行见到了省保安副司令官彭杰如。彭一见到李忠忱，马上询问七团的下落。李如实地汇报情况，我站在一旁插话补充。彭听过以后说道：“何震藩投向共产党是对的，问题是仓皇起事，单独行动，过早暴露，对全省保安部队整体起义的部署有影响。特别是没有选择地点，在白崇禧的身边唱反歌，白顺手一个巴掌打过来，他就吃不消。再则有什么事情

“该与重要骨干交换意见，一旦有事，却要别人贸然相从那也不行。”我觉得彭的这个结论是比较公正的。彭讲话刚落音，他的主任秘书邓充闻（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当过县长、县田粮处长，程潜竞选团的重要成员）拿着一份文稿走进来，请彭审阅。彭过目后立即问我能不能写毛笔字，我不好怎么回答，踌躇之间，李忠忱连忙说能写能写，于是邓就邀我到另一个房间，誊写那份文稿。原来这是一封写给程潜的汇报请示信件，信的大体内容是：邵阳城内复杂，成刚（一兵团十四军军长）态度暧昧不可靠，保安部队分散，城内力量只有一个团，控制不了局势，拟将保安一、二、三师（这时已改旅称师）及其他部队，迅速从湘乡、永丰、青树坪、新化等地，向潭宝路廉桥以西地区集结，邵阳前线指挥责任亟待明确，并请增拨枪弹军费，以增强起义行动的战斗力。信封上写的是“清肖作霖兄代呈颂公钧启，彭杰如于邵阳军次”。接着彭又叫勤务兵找李忠忱进来，任命李为参谋处中校科长，负责联络，任命我为少校机要秘书，并问我带的人可靠与否，我回答完全可靠。于是彭嘱邓将关防印信都交给我，带来的人仍然跟着我，由我安排。从彭的房里出来以后，我向邓汇报，中尉干事罗毅（军校二十一期毕业，应用其专长，让他当参谋去好了。上尉干事李行程，寡言爱静，办事可靠，宜于担任监印，文书与传令兵等人亦可命其具体管理。邓同意了我的意见，这天已是7月31日。

三

七月中旬，广州当局调令程潜任考试院长，所遗本兼各职，均由陈明仁接替。随后，白崇禧即以保证颂公安全为名，威逼程潜离开长沙，借此镇压湖南和平起义运动。为了转移视线，暂避锋芒，程于7月21日赴邵阳，长沙绥署及省保安司令

部随程一同迁邵。据说，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就是程在邵短驻期间所拟定的。程于29日秘密离邵返长，旋于8月4日，与陈明仁以及在湘军政要员联名通电起义，坚决脱离国民党当局。广州方面对此慌了手脚，立即撤销陈明仁的职务，派黄杰在芷江任省主席，并命其配合白崇禧驻衡阳一带的队伍围攻、拉拢和瓦解程、陈布置在潭宝公路一线的部队。因此，8月上、中旬，邵阳一带便成了湖南和平起义的前线。这一时期，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在瞬息多变的时局中，审时度势，迂回用兵，终于获得了起义的胜利。现在回忆起来，有以下几件事情值得一述。

1、撤离邵阳。程潜返长后，8月3日，彭杰如去邵阳机场“欢迎”从芷江乘飞机而来的黄杰、邓文仪。彭回司令部后曾向有关部属通报了情况。他告诉大家去机场迎接黄、邓二人的有一兵团副司令官张际鹏、长沙绥署参谋长王天鸣、副参谋长谢慕庄、十四军军长成刚、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等人。他指出黄、邓此行纯系拉拢、收买驻邵的黄埔老同学，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切实掌握部队，抗拒湖南和平解放。彭特别指出成刚平日表面愿意追随颂公，完全是伪装。黄、邓这时候还敢于飞到邵阳来，就是依仗成刚为其保镖。彭还告诉大家，成刚在机场西南摆了一个配备有重火器的加强营，我们的独立团陈兵于机场东北，两军对峙，箭拔弩张，一触即发。现在双方都摊了牌，我们则必须严加戒备，提防十四军、邵武（冈）线五十八军的袭击。这天下午，彭命令司令部所有人员及直属部队撤出邵阳城，当晚赶到距城70里许的廉桥以西上下马村宿营。8月4日深夜，电话总机值班员告诉我，刘进（一兵团副司令官兼湘潭前线指挥官）曾打来电话说，明早8时约集彭饒（七十一军军长）、彭杰如、李觉（一兵团副司令官）、谢慕庄、保一师师长何元恺、保三师师长张际泰在廉桥保三师师部开军事会

议。果然第二天一清早彭、李、谢三人乘马到廉桥开会去了，大约10点多钟他们就回来了，而且没有多久，就传下命令，随时作好行军准备，结果这一天并没有走。第二天吃过早饭，部队才向西北方向开拔。为什么作这样的部署？原来彭、李等人到廉桥并没有见到刘进，相反张际泰却得到准确情报，白崇禧四十八军正朝廉桥方向逼近，为此彭杰如命令何元恺师向永丰以西、张际泰师向青树坪以西火速转移，严加戒备，各自堵击当面来犯之敌。在这样的部署下，司令部则必须转移到适当的指挥位置，朝新化田心街方向行进。这天，我感到彭杰如好象不愉快。问了邓克闻，可能是这样一些原因，彭杰如与李默庵、王劲修、刘进是老同学，而且交情很深，开始他们4个都一致主张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而此时此刻，景况全非。李默庵驻常德十七绥靖区撤销后，回到长沙绥署仍然当副主任，可是与陈明仁水火不相容，已被迫去香港。王劲修随程潜来邵阳，这两天单身一人由邵返长，王返长后，可向程、陈汇报他的动态，而此刻毫无消息；下落不明。至于彭杰如与陈明仁虽是黄埔一期同学，但与陈没有什么交情，只有刘进与陈关系密切，并且掌握一兵团的指挥实权，处此关键时刻，与刘会晤，至关重要。这次廉桥开会，刘是召集人，而刘未到。什么原因？诸事萦怀，彭不可能不心情焦灼。

2、领导多头。司令部从邵阳撤出后，似乎有几个头头指挥。彭杰如不用说，是当然的一个，但还有两个，一个是李觉，一个是谢慕庄。行军时，他俩多跟着直属团队走，宿营时也到各处窺看一看。对于谢，机关人员以为是新来的参谋长（其实不是），倒没有什么看法。对于李觉，有些人员只知道他是何键的女婿，当过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区司令官等要职。至于现在叫他总司令，什么机构的总司令却闹不清（当时系陈明仁副手，任一兵团副司令官和湖南绥靖副总司

令，前几天奉程、陈之命宣布解散长沙绥署而来邵阳，现随保安部队行动），总认为李是搭着我们起义，保安司令部他管不着。其实李觉身材高硕，脸面白皙，蓄平头，身穿一套白纺绸中式便服，丝袜、白底青喇叭布鞋。行军时手拿蒲扇，戴一顶白细草帽，颇有大将风度。但对下级说话有些陡骤，神情相当严峻，因此，机关人员对他有意见。有一天，电台呼叫，和长沙联系不上。谢着急地来到电台，限定上午接通。隔一会李又来严厉地说“呼叫不上，军法从事”。为此，电台人员很不服气。倒是彭比较宽厚，下午来看了一下，既没有说什么，也毫无责备之意。傍晚时分，电台居然与长沙方面呼叫上了。另外，司令部可以说还有一个头，那就是保三师师长张际泰，按理说，彭是张的直接上级，张应接受彭的指挥，但张的言行表现出好象与彭平起平坐一样。张、彭会见或通电话时，张总喜欢这样说“我请示了颂公”、“颂公的指示”、“我的部队……”，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未过多久，程、陈传来电示，所有保安部队连同六十三师、原三十四师副师长祝凯新部，统归彭杰如指挥。随后李、谢也离开部队回长沙去了。

3、起义训话。程潜通电起义后，白崇禧派飞机沿潭宝、衡宝两线撒了许多五颜六色的传单，传单内容无非是呼喊官兵携带人枪来归，并提出各种赏格，千方百计想搞垮起义部队。另外还可以听到一些无稽之谈，什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已被共产党扣押”，“起义部队已被缴械”等等。彭杰如为了稳定军心，掌握部队，曾分别召集司令部官兵及直属部队训话。训话内容大体是：（1）解放大军兵临长沙，即将占领湖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迎上去，倒向共产党，一条是跑到衡阳跟白崇禧当炮灰。但是跑得了吗？共产党即将占领全国，任何人想跑是跑不了的。我自己决定，也奉劝大家坚决投向共产党，走光明大道。（2）白崇禧每天派飞机撒传

单诱惑我们，许金许银，这是假的；果然是真，你还没有得到赏赐就当俘虏。一句话，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使白崇禧瓦解起义部队的阴谋得逞。（3）程颂公，党国要员，德高望重，他老人家通电起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必须坚决听从颂公的命令，决不可有丝毫动摇。（4）现在如有人不愿意参加起义的，可以请假离队，但决不允许背后煽动军心，扰乱部队。否则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官兵听过彭杰如的讲话，也从中知道了他一些经历：抗战时期，他历任师长、军长，去年在东北辞却卫立煌要他带一个兵团的任务而跑回湖南选择起义的道路。听了彭的讲话，大家从心底里拥护程潜和平起义的主张，做到了无一人叛逃离队。

4、捷报频传。长沙方面通电起义，白崇禧在衡阳慌了手脚，连忙调动他的主力四十八军冲向潭宝公路，五十八军窜过邵阳，九十七军急犯湘中，妄图三面拉网，并利用一兵团叛逃部队作内应，一举消灭潭宝路西线的所有保安部队。此时，各保安师、团正处于集结阶段，尚未构成抵御强敌的战斗兵团，司令部机关人员的情绪也有些紧张。当时彭杰如的部署是，命令保四团，横过潭宝路，主动迎击四十八军的先头部队，战斗终于在衡宝线上的水东江打响。该团是保二师的主力，英勇善战，结果打了一个漂亮的小胜仗，缴获敌军五、六百支长短枪。胜利的战果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而且增强了起义必胜的信心。战斗结束后，保四团旋即返回司令部驻地附近，并受到了彭杰如的犒赏。此后部队开始向西北迂迴行军，途中曾在一个村子里停留过两三天。一天清晨，我走上屋侧小山远望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期然彭杰如带着两个警卫也走上了这座小山。我连忙打招呼，还问了一句不指望他面答的话，“副司令官来了！今后我们兵向何方？”大概是他的情绪比较好，竟然停住同我攀谈起来了。他说：“保四团团长雷观壮还蛮会打仗。

这次给点颜色给四十八军看看，它们就不敢小视我们了。现在我们摆脱了白军的尾击，完全可以组织力量对付叛逃部队。”他还说，据所得情报，四面八方都是叛军，但他们很惊慌，战斗力肯定不强，如果我们打阻击战，一方面能削弱他们的力量，另方面等待时间，争取配合解放大军的行动，则可完全消灭叛逃之敌。他还问我会不会打枪，打仗怕不怕。我回答：“高中读书时受过军训，我家住屋挨过日本飞机两颗炸弹，我自己还被鬼子抓到过，但很快就跑脱了，受过大惊吓。”他笑了一下，早饭后派勤务兵给我发了一支“左轮”手枪。部队继续迂迴行进，到田心街遇上了九十七军、一〇〇军中背叛起义的官兵，保安司令部立即把保四团、独立团、直属大队的兵力都部署好，准备战斗。结果敌军急于逃命，打了几阵子，边打边撤，不到两个小时，就全跑光了。这一时期，根据电台所得战讯，保一师在永丰一带遇着七十一军的装甲炮兵及其八十八师的部队，经过激烈战斗，打退叛军多次进攻，摧毁了他们一个营。后来又在谷水地区与九十七军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也有所缴获。保三师在青树坪一带与四十八军、九十七军的部队多次接火，迫使敌军仓惶南窜。保二师在新化大桥与五十八军发生过两次激烈战斗，俘获人枪甚众。据参谋处统计，从8月6日至21日的半个月中，共俘敌800人，缴获长短枪近2000支，其他如战马、电台、弹药均有所获。正是这些捷报传来的同时，我们又听说解放军一四七师已由益阳、安化、新化进军邵阳，一三八师正沿潭宝路直取邵阳，都感到很兴备。这时李忠忱外出联络已回到司令部，据他说一兵团两个副司令官刘进、熊新民，三个军长（十四军成刚、七十一军彭锬、一〇〇军杜鼎），五个师长（十师张用斌、六十二师夏日长、八十七师杨文榜、八十八师刘勋浩、十九师卫轶青）逃离了，听来令人惊诧。李告诉我，他在湘乡城见到了解放军四十九军钟伟军长，钟军

长详细了解了我们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和行动方向。李还告诉我，解放军首长对我起义部队阻击叛军表示满意，认为今后的任务应该由他们去完成，起义部队可能即将开赴后方休整。不久果如其言，彭杰如电令保一、二、三师及六十三师和祝凯部队均向长沙湘江西岸集结待命。司令部人员及直属大队则沿金竹山、杨家滩、娄底、谷水、壶天、流沙河、陶家湾、到宁乡，乘本部留省而开来的三十几辆卡车返回长沙。

5、严守军纪。在阻击叛军的日子，部队军容严整，人强马壮。行军的序列是警卫一大队、二大队、司令部机关、独立团（团长李宗青，系李默庵之弟，十七绥靖区撤销后，他把这个部队送给了保安司令部）、保四团。保四团兵员足额，武器配备也比较好。至于直属大队及独立团，则一概是卡宾、汤姆逊机枪、马铃机枪、三〇远射程步枪、火箭筒等等，直属大队当班长的还多一杆德造快慢机。二大队长什么时候都是腰勒两杆快慢机，护卫在彭杰如的左右。行军途中，彭杰如申饬所部，严守军纪，做到了不拉夫，也不出钱雇请民夫，所有军用物资，一概由部队设法自运。十多万银元的军费，就是装在木制的小型子弹箱内，由二大队负责肩运，办法是两人一组，一个挑箱子，一个背武器，轮换挑运。彭要我每天宿营后写些标语，派两名传令兵于第二天行军提前出发，把标语贴在沿途集镇、墟场或大路两侧显眼的地方。标语的内容是“湖南保安部队是三湘父老的子弟兵”、“湖南保安部队秋毫无犯，保境安民”、“湖南保安部队军纪严明，爱护百姓”、“湖南保安部队是程潜指挥的队伍”、“湖南保安部队坚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湖南保安部队坚决倒向共产党”、“湖南保安部队过境，地方民众各安其业，毋庸惊慌”、“湖南保安部队恨元购买物品，价格公平合理”等等。开展这些宣传，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沿途老百姓都主动供应茶水，特别是进入杨家滩、娄

低、谷水等集镇时，商界人士还放鞭炮表示欢迎。那段时间久晴不雨，农民没有蔬菜供应，但他们自愿把鸡、猪卖给起义部队。

6、接待青年。田心街阻击战后，沿途许多知识青年一批一批来部队参军。彭派我做接待工作，不管是什么对象，我首先郑重说明，我们是程潜的队伍，不是人民解放军，你们要参军，必须到长沙去。大部分青年一当知道我们部队的性质后，就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星夜奔赴长沙。但也有少数青年要求先在我部暂留，以后遇着解放军部队或是跟随我部开往长沙后再参加解放军，对此，我也委婉地表示了谢绝。

四

8月底，省保安司令部开返长沙，没有回到旧址袁家岭，而是驻在蔡锷北路棋盘街的一座仓库内。这时已奉命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三军”，后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团第五十三军”（先后军长都是彭杰如）。住长沙的半个月时间内，我所经历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第一件，彭把我叫去，缴销旧关防，领回新关防，并由我监印发出一兵团第三军司令部第一号人事命令，我被任命为机要室少校文书科长（原司令部办公室改为机要室，上校主任为邓允闻，下设文书科、电务科）；第二件，彭召集司令部人员，介绍认识新派来的副军长蔡杞材；第三件，新任上校参谋处长杨彩卿拟稿，彭同意批发，由我监印发出全军各师分别开赴浏阳永安市整训的行军命令。司令部驻长期间，补发了七、八、九月的薪饷，将官20元、校官15元、尉官10元、士兵5元。我们在棋盘街，伙食开得好，只是吃小米大家不习惯，但蔡杞材吃得很香，他说，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垮了蒋家王朝几百万军队，我们应该学著吃小米，不然就没有资格当解放军。大家听了这话感到很新鲜，也深受鼓舞。部队于9月中

旬开赴浏阳永安市，驻李家大屋。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办铅印四开张的《学习》小报(每周一期)，第一期主要是庆祝开国大典；第二期是报道起义部队的殊荣，程、陈二将军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最优渥的接待；第三期是报道军部举办排长以上首届军官轮训班的学习动态。这时上级派来了军代表，驻我军首席军代表是覃应机(兵团首席军代表是唐天际)。彭杰如派我和另外两个校级干部听军代表讲授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课程，目的在于协助军长、副军长、参谋长等领导，拟写为军官轮训班讲课所用的各种讲稿。11月份，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须抽出大批干部调训，我被派往湖南军区教导团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学习。1950年8月学习结束，我请求回家乡常德参加教育工作，得到了批准。

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

1949年8月3日，“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成立。第二天，推举傅作宾、高翔、梁绮、王蔚霖、曹国枢、张文远、张福云、卢德亮、黄性一等为主席团成员，“交联”、“学联”和新闻界从业人员互助会为召集人，曹国枢任主席团主席，刘晴波(化名王益林)为秘书长(随后正式成立了“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同时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以唐生智、程星龄、肖敏颂、张以藩、程一中、唐星、仇鳌、曹伯闻、曹典球、易鼎新、龙伯坚、凌敏猷、黄雍、唐伯球、胡迈、陈长簇、宋仁楚、伍善同、周唯真、周权初、劳言祥、陈庚、席楚霖、刘岳原等33人组成(以后又增加了谭丕模、肖杰五、朱剑农、王学庸等)。(众群)

省保安第二师的起义

周笃恭*

一、保安二师的简要经历

湖南保安第二师的前身是保安第二旅，由保安第四、五、六团及旅直属部队组成。第四团团长雷观壮、第五团团长刘磐、第六团团长谢成章。

王东原当湖南省主席时，就积极扩充保安部队，企图作为第三线兵团。办法是把保安总队改编为团或以3个保安大队编为一个团，以三个保安团编成为旅。先后成立有三个保安旅，旅的编制为10800人。在保安第二旅来说，人数就没有足额过，经常约9000人左右。旅长起初是丁廉，我于1948年秋接任第二旅旅长，时副旅长是黄玉溪，参谋长是桂次莲，政训处主任是周拔凡。当时驻常德、澧县一带，第四团曾在湖北省公安、石首县担任江防。

1949年3月，沅陵发生事变。当时湘西各县地方恶势力在反动军人阴谋策划下，企图以湘西为根据地，与共产党长期对抗。张玉林等劫夺辰溪兵工厂武器之后，汪援华、曹振亚等发动永顺、桑植、保靖、古丈、乾城等县各股匪徒袭击沅陵，把湘西各县闹得乌烟障气。

当时湖南省政当局责令驻常德的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派部队进剿。李默庵令保安第二旅撤离公安、石首江防，集

* 周笃恭当时系湖南保安第二师师长。

结部队经慈利、大庸向永顺汪援华、曹振亚部进攻。先头部队第五团到达大庸时，忽闻沅陵已被匪徒袭击。又接十七绥靖区司令部命令，限一日内由大庸赶到桃源汽车站，计行程100多公里。这时直属保安第九团亦由常德用汽车输送到桃源。在桃源集结后，按计划用汽车输送到沅陵马底驿下车，向沅陵城搜索前进。那时候十七绥靖区沅陵指挥所主任马叔明和湘西师管区司令，都由沅陵撤退到了马底驿，随即一同向沅陵前进。次日，湖南保安副司令王劲修赶到，由他统一指挥。到达沅陵对岸望城坡，王劲修同城内汪援华、曹振亚通电话，同意和平处理，撤了沅陵前任王县长，新委了一个县长，并委派汪援华为湖南保安第四旅旅长，汪、曹退出沅陵。后来省方认为处理失当，因为这次匪徒袭击沅陵，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沅陵人民生命财产受了很大损失，民愤难平。王劲修不得不引咎辞职，由彭杰如接充。沅陵方面指挥改派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担任。

刘嘉树到达沅陵，即令保安第二旅并指挥直属保安第九团，先进攻盘踞古丈之罗文杰等部，尔后再进攻永顺汪援华、曹振亚等部。我旅接受任务后，即率四、六两团及保安第九团直向古丈城进攻，派第五团沿酉水河前进，向古丈罗依溪进攻。旅进攻古丈城时，罗文杰等部在古丈城外高山凭险扼守。径逐山攻击，敌不支溃退，旅遂占领古丈城。到第三天，接到刘嘉树电话说湘西各县匪徒，企图再次袭击沅陵，声势比前次要大得多，要第二旅并指挥保安第九团撤到离沅陵城30里的鸟宿，堵击各县匪徒进攻沅陵。到达鸟宿后，在酉水河两岸二酉山构筑工事，以资防守。沅陵城有一〇〇军的六十三师汤季楠部防守。结果在鸟宿与匪部打了23天，敌以伤亡惨重，分途溃退到各县老巢。在这次战役中，旅伤亡连长以下300多人。

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沅陵白田头休整，不久又移驻新化、邵阳、隆回等县。1949年4月间奉令改编为保安第二师。

二、起义前的酝酿

保安第二旅改编为保安第二师时，形势已一天比一天紧张，解放军快要渡江。适保安副司令彭杰如在湘潭派参谋李铁肖来新化，出示彭杰如用纸烟盒写的话：“一切由李参谋面达。”从字迹判断不是假的。我们在师部谈了两个钟头，说话的大意是白崇禧部队在湖南搜刮情形，要拥护程颂公的主张，配合解放军，消灭白崇禧主力于衡阳附近地区。李去后，我坐卧不安。这时，我想到国民党所作所为，失尽了人心，灭亡是必然的。但是我为国民党卖了20多年力，平日所作所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今天要是同共产党合作，谁知会怎样对待我？加之过去听说共产党是如何如何的残酷，更怕自投罗网，真是进退两难！

过了一个时候，程潜主席、彭杰如副司令都由长沙来到邵阳，来电要我到邵阳会见。我和新化县长伍光宗同车去邵阳，在邵阳资水河边一棟大房子里见了程颂公。程非常愤慨地说：“白崇禧欺压我们，剥削湖南人民太厉害！对共产党，我有把握同他们谈判和平。”他还拍着胸膛说：“一切都由我负责，但是一定要配合解放军，消灭白军主力于湖南，要好好掌握部队。”我又去见彭杰如副司令，适他外出。等到很晚才回来，一见面他就说：“我们要拥护程颂公的主张。”其他话与程颂公所讲的大致相同，说了一阵，我回旅馆休息。次日又到彭那里，有一〇〇军副军长谷炳奎、陆军十师师长张应宾、淑浦向绳祖都在座，彭对他们也做工作，说要拥护程颂公的主张。我和谷、张、彭过去都同在陆军十师工作，所以见面无话不说。后来省政府委向绳祖为湖南保安第六师师长，命令系由我派人转送，但最后他没有参加起义。我回到新化以后思想斗争很厉害，心想不听程颂公的话，又怎样办呢？国民党已垮到这个样子，非彻底垮光不可；又想如果把部队带到湘西打游击，又因

发生沅陵事变时曾和那些地方恶势力打仇了不能去；又打算在必要时大家逃跑，又以儿女都在身边，既没有多带钱，又无到台湾去的入境证，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又想到程颂公是一个战犯，他不怕，我又怕什么？遂决心起义。我召开连长以上官佐会议时，提出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应如何应变的问题，开始大家默默无言，后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有人说必要时我们打游击。我说我们拖家带着能打游击吗？而且共产党是打游击的能手，那我们会被消灭精光，这不是办法。还是跟程潜主席一道，看他如何应变，就是我们应变的方向，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会后议论纷纷，说师长态度变了，这便埋下了危机！我到第六团时，有一位副营长和一位连长要杀害我。团长谢成章在我睡的地方守达通宵，事后才知道，真是危险！原来打算在人事方面加以调整，没有来得及，仅在邵阳同彭副司令商量，认为第五团第二营营长极不可靠，把他调到邵阳保安司令部当中校参谋，另由彭派王某接充第五团第二营营长。

我从邵阳回新化后，形势变得很快，白崇禧离开长沙到衡阳，程颂公由邵阳回长沙去了。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乘飞机到邵阳活动。那时刘嘉树在芷江来电话打听长沙情况，有一次他要我找第六团谢团长讲话，我即制止通信人员不予接通，恐其有破坏活动。事后证明刘嘉树是反对起义的。过了几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发出通电起义（我亦列名，非常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把我的姓写错了，写成“王笃恭”）。于是白崇禧先发制人，邵阳打起来了。这时保安第二师兵力仍是分散的，第四团在邵阳到衡阳之间的水东桥向衡阳警戒，第五团仍在隆回，第六团在新化大桥边，师部在新化城。

三、邵阳事变后的战斗

邵阳事变，一开始是起义与不起义两种力量打起来的。那时

在邵阳起义的部队事前没有充分准备，一发生武装冲突，即仓促撤出邵阳，但仍在邵阳附近保持接触。

这时，我师接到上级命令，配合友军，收复邵阳。师率直属部队并指挥保安直属第十二大队方觉部，推进到大桥边与第六团会合，调第五团推进到邵阳到桃花坪之间的和尚桥，阻击敌人由邵阳经桃花坪西窜武冈，令第四团在原驻地水东桥阻击衡阳方面来犯之敌，并令其就近归保安副司令彭杰如直接指挥。同时彭杰如派参谋杜北海到常德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四七师联系。接着郑贵卿师长派武装兵一班来大桥边与我部联系。解放军行军迅速，于8月17日到达新化，又派副师长黄玉溪与刚到新化的郑师长协商，由一四七师推进到巨口铺。我师也由大桥边向邵阳进攻。

白崇禧策动邵阳市事变后，继派鲁道源部及一〇〇军六十师张应宾和陈光中等部，向新化方面进攻。遂于8月19日晨开始进攻巨口铺一四七师阵地，同时进攻大桥边我师阵地。从19日起到21日激战3昼夜。我第六团及直属十二大队，伤亡200多人。解放军一四七师奉令夏休，撤到安化扼资水防守。这时，我第五团已推进到和尚桥，为敌所隔绝。该团团长刘磐迟迟不绕道撤出，后来师部又撤离新化，该团被引诱而投敌。我第四团原担任邵阳到衡阳之间的水东桥向衡阳方向警戒。对衡阳方面来犯之敌先头部队迎头痛击后，又配合友军在廉桥西北地区田心街，堵击一〇〇军及九十七军之各一部。先后撤获长短枪500余枝，其他军用品一部分，但该团副营长张智仁以下30多人伤亡。

第四团随同保安司令部先到浏阳，师率直属部队、第六团及直属保安第十二大队方觉部，由百溪渡过资水经过安化、宁乡、长沙到达浏阳，以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二一九师，我仍任师长。

保安第三团起义经过

唐岱 谢德铭*

一、率先起义

1948年冬天，中共中原局社会部派杨觉新、邢文康、倪格等同志赴长沙，成立3130长沙工作总部，决定以塘拔、杨建、张仕义等上层进步人士为主的“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为基础，组建中原军区（1949年5月改为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主要任务是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地下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

当时驻守在湘潭的湖南省保安第三团，团长由保安第一师副师长漆启宇兼任，副团长蒋麒生代理团长工作。蒋麒生出生于湖南湘乡润山乡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年书，1930年当兵，历任班、排、连、营长、副团长等职，他性格刚强，为人直爽。江南地下第四军特派员唐岱，早在1935年即与蒋麒生一起共事，并且结为“金兰之交”。1946年在南岳第27军官总队，唐岱任第一队上校队长，蒋是该队中校队员，两人关系密切，私交甚深。1949年3月，唐岱奉命来到湘潭保安第三团进行策反工作。两人见面，格外亲热，好友相逢，无话不谈。蒋麒生问：“当前大家都在谈论时局，不知老兄有何高见？”唐岱说：“现在形势发展之快，的确出乎人们预料，

* 唐岱系江南地下第四军暂六师副师长，改编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副司令员。谢德铭参加了当时的起义和战斗。

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已是江河日下。看来国民党败局已定，不知你有什么打算？”

蒋麒麟沉思了一会反问道：“如今国事日非，时局很乱，老兄见识高深，你说我该怎么办？”唐岱微微一笑说：“你是带兵的人，懂得兵权的重要！当前战局发展很快，你应该善于自处。”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蒋麒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晚上，蒋又来唐岱房间，询问往事，感慨万千，其中谈到国民党集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情况，尤其对保安部队另眼相待，更为气愤。唐岱说：“现在形势看得很清楚，解放军在汉口一旦渡江，湖南首当其冲，华中‘剿总’白崇禧就是想把保安部队当‘替罪羊’，为他卖命当炮灰。”蒋麒麟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是。唐岱见蒋麒麟有些动心，进一步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劝说：“现在国民党军心涣散，前途暗淡，共产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劝你以人民利益为重，率先起义，走向革命，走向光明。”

蒋麒麟听了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沉思了一会问道：“老兄，你能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吗？”唐岱说：“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商量的。现在中共中原局在长沙成立了工作总部，我可以和地下组织联系。”蒋麒麟一听，高兴地说：“老兄说得对，现在人民厌恶战争，跟国民党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举旗起义，跟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

经过几次交谈，蒋麒麟起义的决心已定，就积极行动，进行部署。4月1日，蒋麒麟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他说：“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反对内战，希望和平，已是广大军民的强烈要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绝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军官们表示：“我们坚决服从蒋团长的命令。”经过一番疏导，官兵们都拥护起义。蒋和唐商议之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万一走露消息，后果不堪设想。蒋麒麟当机

立断，于4月3日晚上，率领一、三营和团直搜索连八百余人，全副武装开出湘潭，经过90公里急速行军，顺利到达湘乡洞山。乡亲们听说起义部队来了，奔走相告，有的腾出了房子，有的支援了粮菜，有的送来了门板……。由于当时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联络点经常转移，起义部队尚未和党的组织联络上。为了便于开展敌后斗争，决定暂称“湖南野战军第一纵队”（群众称为游击队），蒋麒麟为司令、李镇襄为副司令，唐岱为参谋长，纵队下设两个支队，并且召开大会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打倒恶霸地主，惩办土豪劣绅，收缴民团军火，封存所有公粮。

二、首战告捷

洞山，是蒋麒麟的家乡，离长沙100多公里，距湘乡县城45公里。这里东有包金山，北有范度仑，西南是连锦的群山，易于隐蔽，战守均宜，对开展敌后斗争极为有利。

4月9日晚上，队部正在研究工作，侦察员报告：谷水镇驻有湘乡、邵阳、新化、安化、宁乡五县边区联防“剿匪”指挥部，约有300多人，指挥官是胡桂卿，这人作战勇敢，心狠手毒。队部研究认为，谷水镇离洞山只有10公里，如果不拔掉这个钉子，对我们是很大威胁。决定先下手为强，打他个措手不及。4月12日清早，队部派军需谢德铭去谷水镇，以购货为名进行侦察，查清了敌人的实力、活动规律、进出路线和枪支弹药放置地点。晚上队部召开作战会议，作了周密部署，要求各连精心组织，严守纪律，打好起义后第一仗。

谷水镇，座落在涟水北岸，是连接湘乡和娄底水路的交通枢纽，也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约有200多家店铺，是湘乡比较繁华的集镇。这天深夜12点，部队趁着夜幕出发了，在田间小路肃静地行进着，大约两个小时就到了谷水后山一带，把重

兵埋伏在联防指挥部——彭家祠堂两侧。在昏暗的星光下，彭家祠堂显得格外阴森，大门前面哨兵游来游去，我们一个班在祠堂前面两百米的地方佯攻，当哨兵集中精力观察前方动静时，埋伏在祠堂两侧的战士，箭步冲到哨兵身后，用毛巾塞进哨兵嘴里，两支小分队左右包抄，迅速冲进祠堂大院。“哒哒哒！”连放几枪，战士们大声喊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正在沉睡的官兵，顿时乱作一团，有的跪地求饶，有的举起双手乖乖缴械投降。当两名战士踢开后院一间卧室，见一当官的正在慌忙摸枪。“哒哒哒！”战士一梭子弹打中他的胸膛，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外号“胡兵团”的联防指挥官胡桂卿。拂晓时战斗已经结束，共缴获步枪140余支、冲锋枪20多支、轻机枪三挺、子弹5万余发，战士们带着枪枝弹药胜利返回洞山。

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湘中反共堡垒——边区联防指挥部，这个消息象一声惊雷，震动了湘乡城乡。当时在群众中流传一首顺口溜：“洞山有支游击队，百姓见了人人爱，一举消灭胡兵团，为民除了一大害。”湘乡县警察局长贺石渠得到这个消息，惊慌万状，特地派了一个警察中队，将胡桂卿尸体连夜运回县城，举行所谓“公祭”，《湘乡民报》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湘乡县参议长吴崇钦把这作为重要“敌情”，立即上报湖南省政府和华中“剿总”，请求火速派兵进剿。

三、转战湘中

不到半个月，白崇禧果然派了三个团，进驻谷水镇一带，准备吃掉率先起义的湖南保安三团，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熊新民亲自坐镇指挥。5月中旬，谷水镇到处是军警，到处是岗哨，许多店铺关门，作坊停业，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5月下旬一个晚上，国民党以一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

到洞山，以“搜匪”为名，将纵队司令部——石燕湾层层包围，”其实部队早已转移，连个影子也没见上。国民党军队扑了个空，恼羞成怒，逮捕群众50余人，押到谷水镇，关在仓库里。后经蒋次升（美国留学回国的教授，现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出面说情，得以担保释放。国民党军队连续几天在洞山一带搜查，毫无所获，便到处张贴通辑令，还趁火打劫，搜刮民财，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6月上旬，尹立言率千余人窜到壶天地区，派人和我部联系，说他们是反蒋的“西南民主联军”，号称有三个军的兵力，还拿出“民促会”的宣传品给蒋麒麟看，企图瓦解保安三团。后来湘中地下党负责人官健平告诉我部，尹立言是国民党新八军军长，我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把尹部赶出壶天地区。这时国民党八十七师一个团在白鹭湾与我部接触，隔河对峙，双方开枪射击作试探性进攻。我部隐蔽在密林之中，对方不明虚实，使用迫击炮轰击，未见我部动静，以为撤退，便渡河追击，我部埋伏在树林中，以逸待劳，等对方主力过河后，便集中火力射击，还用曾国藩时期的火炮，里面装上炸药和铁沙，发射时声音特大，铁沙散布面又广，国民党军队称为“园子弹”（铁沙是圆的），士兵听说我部打园子弹（原子弹谐音），狼狈逃窜。我部乘胜追击，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12挺，步枪200余支。第二天国民党八十七师由恩口渡河尾追，在杉山、西阳缴战数小时，我部利用山熟路熟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最后摆脱对方追击，向娄底方向转移。这时我部已发展3000余人。

6月中旬，中共华中局3130长沙工作总部派戴剑虹等五位同志，携带总部命令来到驻地杨家滩，表彰我部率先起义后，粉碎白崇禧多次堵截、追击，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并授予我部番号为“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 暂编第六

师”，任命蒋麒生为师长，戴剑虹为政委，唐岱为副师长，李方人为参谋长，杨慕农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杨宗浩为一团团长，曾请球为二团团长，谭兰桂为三团团长。

从5至7月，国民党八十七、八十八师一直对我师进行尾追、堵截，与敌人发生大小战斗50多次。我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避实就虚，神出鬼没地转战在湘中地区。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使我师越战越强，至7月中旬，暂六师已发展到5000多人。白崇禧对地下武装发展壮大极为恼火，他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上说：“游击队碍我交通，断我给养，决不能任其妄为。”接着他拼凑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和十四军的六十三师，加上地方团队约万余人枪，由军长彭镗指挥，对我师进行大规模“进剿”，部队每天行军作战，经常吃不上、喝不上，生活十分艰苦，最后决定向湘乡、安化、新化交界的冯家大山挺进。我师进山以后，彭镗立即下令四面包围，严密封锁。我师虽然打退多次进攻，但由于十多天未休息，部队已相当疲劳，加上粮食已断，最后只能以野菜野果充饥，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7月24日傍晚，我师决定突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由于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了，1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十多名干部英勇殉职，我师遭到重大损失。在韶山集结时，只剩下千多人枪，经过四处联络，三天之内又有千多名失散战士归队。

四、接受整编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通电起义，长沙宣布和平解放。8月6日，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将江南地下第四军暂六师的组织关系介绍给解放军十二兵团，兵团派齐一夫同志来我师接收，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我师配合解放军消灭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于9月16日，召开全省地下武装整编会议，暂六师政委戴剑虹、副师长唐岱参加了这次会议。肖劲光司令员在讲话中指出，江南地下第四军，创建时间早，活动范围广，群众基础好，钳制了国民党兵力，支援了解放军南下，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他希望部队搞好建编，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会议结束后四十九军即派出以田继舫为组长的40多人工作组，协助我师进行教育和整编。9月下旬，全师在湘乡大青墩举行大会，由一四五师政委陈德主持会议，代表上级宣布，将江南地下第四军暂六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归四十九军指挥，并任命蒋麒生为支队司令员，戴剑虹为政委，唐岱为副司令员，李方人为参谋长，田继舫为政治部主任。接着一四五师师长沈启贤讲话，他说：暂六师的前身——保安三团，是湖南保安部队起义最早的一个团，你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促进了湖南和平解放。现在白崇禧军队退至衡阳、邵阳一带，修工事，布防线，妄图和我军顽抗。希望湘南支队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为湖南解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四十九军首长要求湘南支队在湘乡至邵阳公路沿线执行搜索警戒任务，肃清散兵残匪，确保交通安全。由戴剑虹政委负责支前工作，发动群众筹备粮草，10天时间就为前线运送军粮20多万斤。

10月初，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向衡阳地区发起钳形进攻，迅速攻破敌人防线，歼灭一〇〇军军部、一二二军军部、六十三师及新八军一个师。接着向南追击，又将白崇禧精锐部队第七军、四十八军围歼于祁阳以北地区。湘南支队完成任务后即与一四五师合并，战士补入各团，干部送中南军大和湖南军区教导团学习。10月20日，四十九军在湘乡县城举行了欢送大会。

省水上保安总队在长沙起义前后

肖伯良*

1948年6月，湖南省水上保安总队成立。陈构任上校总队长，我为中校副队长，周祖厚为中校督察长。总队成立后在沅江县训练了3个月，然后在洞庭湖区巡逻。

1949年1月下旬，省保安司令部忽然下达命令：“总队立即停止在湖湘水上一切活动，全部调回长沙岳麓山畔，停止待命。”我奉命后，随即将部队集中沅江，率领回长。武装部队驻扎岳麓山和银盘岭附近，总队部驻裕湘纱厂内头一栋，船艇等都摆在纱厂下江边。我到长沙后，陈构、周祖厚二人前来对我说：“大局非常紧张，传闻武汉将要解放了。解放军势如破竹，白崇禧桂系部队纷纷南溃。省主席王东原调走了，换了程潜。据马路消息，他们计划死守长沙，与解放军大决战。这样本来的长沙，会重遭浩劫，我们的前途也未可料。”我说：“我们有了资本（武器）何患之有？”陈构又说：“保安司令部也有新旧两派（新派是亲共派）。”我问：“您择哪一派？”他说：“我择新派好，因为国民党迟早不免会覆灭的。其理由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我说：“您的看法悉与我同，我们坚决走新的路线。”2月中旬，陈构、周祖厚回总队时，面带愁容，闷闷不乐。陈构对我说：“情况不好，我们水上总队将由你率领编入李默庵那个兵团（实力绥靖区），我还回保安司令

* 肖伯良当时任省水上保安总队中校副队长。

邵任高参，周祖厚调邵阳保安团任副团长去。保安司令部已经确定，只待主邵兼司令程潜批准。”又说：“我们三人艰苦建队，昙花一现，又各自纷飞。”他一面说，一面泪如雨下，不禁三人同声哭泣。2月底，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奉到主席兼司令程潜的手谕：“任命陈立谟为湖南省水上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原总队长陈构调保安司令部高参”。3月3日，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将上项命令文件给我，并告之陈立谟于本月4日到差。我于是日上午集合总队部官员及各队队长，在河西渡口码头恭候，陈立谟于10时许率3人乘轮来此。到达总队部后，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并介绍总队成立经过、人员武器、训练程度、官兵名册和有关案件。会后，陈立谟对我细声说：“湖南省水上保安总队颇有威名，颂公重视，他再三叮嘱：‘好好掌握。’我以为有几千兵力，今日看了名册，连官兵都不上800，其力量并不雄厚，将来何以摆布，以济事功。”其面露难色。我慨然回答说：

“兵不在多而在精，战不在兵而在将。岳飞以五百精锐之士破金兀术，大败十万拐子马，况我有八百余众。”两人同声大笑。下午我集合总队官兵、船只等，点名报数，交代清楚，陈立谟开始正式视事。3月5日，陈立谟从保安司令部彭杰如那里领来了加拿大手提新式冲锋枪15枝，交给我分发下去。不几日，陈立谟又领来了大量的新军服、经费、粮食等发给官兵。

陈立谟系军校八期毕业，颇有知识，慷慨激昂，好言词，能谦恭下士，善与人交，但性傲可顺而不可逆。他了解我的思想进步之后，认为“志同道合”，关系日益密切。一切军事调度全权交我，彼呼我应，是以两无猜忌。自此之后，他以向上级和各阶层联系，打听大局动态和搜集情报为主。4月以后，陈立谟引程元（程潜之子）、刘伯谦、谢一中等一班权威人士，经常在我总队部往来。有时，他们在总队开些秘密小会，我也参加。5月10日，陈立谟对我说：“今天我带你去看望颂

公好么？”我听了很高兴地回答说：“久闻其名，很想见他，这是我的愿望。”是日上午10时许，陈立谟将我引进程潜私寓，并向程老介绍。程潜对我说：“你与立谟紧密协作，好好掌握那点有力的部队，将来必有重任。”我受了程老赏识和叮嘱之后，心情非常激动，更增强了责任感。6月5日晚，陈立谟回来对我说：“奉颂公面谕：明天（6日）白健生来省府召开会议，您部与程元部（警卫团）在省府附近要严密布置警戒，以防不测。”我即召集各队紧急会议，挑选精兵300余名，组成便衣队，于当晚赶赴省府附近布置妥当。陈立谟指挥内围，其余部队在原地整装待命。6月底至7月末，大局日益紧张，长沙动荡不安，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撤往衡阳，路经长沙，时而要这，时而要那，造成了长沙的混乱局面。桂系特务与长沙绥署特务，狼狈为奸，谣言百出，人心惶惶。陈立谟对我说，此时部队更要严格掌握，除我你率部警卫省府颂公外，其余官兵一律不准外出。可在原地操作或做点防卫工事，保持镇静，以免受特务的谣言煽动。自此之后，我俩轮流过江执勤。7月21日，程潜率领省府和保安司令部向邵阳撤退。陈立谟率领巡艇洞庭号、我率巡艇湘水号，满载武装部队开赴湘潭汽车站码头，护送程潜和省府、保安司令部人员过江之后，总队部驻湘潭汽车西站，武装部队分驻各处渡口码头。7月28日晚，陈立谟对我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明日是用我们的时候到了”。我问：“您怎么知道？”他说：“张际泰今天下午来告诉我，程潜准备于明日上午返回长沙，举行大事。”陈立谟要我明天清晨同他去迎接颂公。我听后，当晚乘巡艇通知各驻地部队，拂晓早餐，整装待命，严密戒备。次晨，我将渡口武装部队和巡艇集中在预定过河码头。等候不久，陈立谟引驶程潜的小车到达。陈问：“情况怎样？”我说：“安全，请快登艇。”于是，他扶颂公登上洞庭号巡艇，我乘湘水号巡艇随后

警卫。巡艇开足马力，顺流而下，于当日上午11时许，安抵长沙水陆洲。陈立谟紧随程潜下榻省音专学校，我即登岸将部队散开，警戒周围。时至黄昏，陈立谟警卫颂公转移至长沙南大十字路。我率本部官兵、巡艇，重返河西银盘岭附近驻扎，继续担任警戒。8月4日，程潜宣布起义。8月上旬，司徒厚率保安团由邵阳来长，对我说：“日前我在青树坪与桂军展开激烈战斗约2小时，突围而来长沙。听说，我们水上保安总队在您和陈立谟率领下，胜利完成长沙起义，特来致贺。”8月中旬，河西岳麓山畔一带各界人士、人民团体、机关学校，在银盘岭以北三华里的学校里，举行一次盛大的迎解茶话会，我被邀请出席。

9月以后，各起义部队开始陆续整编。我水上总队首先属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后不久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五十三军二一七师。师长姜和瀛、副师长陈立谟，当时我在师部任职。不久，陈立谟请求入军大学习，我亦于12月进入军大。

《庆祝长沙解放》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子里，长沙街头流传着《庆祝长沙解放》这首歌。歌词是：

庆祝长沙解放，我们高声齐歌唱，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新的长沙诞生，
新中国的太阳照耀在长沙人民的脸上。
长沙，长沙永远属于人民，新生的长沙将放出万丈光芒！
庆祝长沙解放。我们高声歌唱，我们高声歌唱。

（湘人）

省防空官兵集体起义记

万天石*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我担任湖南省民防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时，我和苏公望副司令也率部响应起义，兹将我部起义的过程概述如下：

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悉数被歼，国民党大势已去，前途暗淡，何去何从，我感到茫然。1949年4月的某晚，家里来了位客人。他带着一副黑镜，我看了半天才认出他就是一别数年的老友王灿然（我任零陵防空指挥部参谋主任时，王任专员公署的机要秘书，两人交往较深，成为挚友）。他坦率地告诉我，他是中共地下组织三一三〇（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长长沙第七总队）的负责人之一，他要求我参加这个地下组织，为解放湖南出力，我高兴地答应了。镜后，他交给我三项任务：一是替他找一间隐蔽的房子藏身；二是暗地里替“三一三〇”邮寄印刷品，劝各工厂工人护厂保产；三是利用我的职务营救被保安司令部保保队所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任迪良等三人出狱。这三项任务，我都设法完成了。

6月，湖南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不少单位纷纷南迁。一天上午，保安司令部高参胡亮凯跑来对我说：“奉上级命令，

● 万天石系省民防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率部起义。

你负责将防空科和防空情报所立即迁到邵阳去。”我未置可否。当晚，我向王灿然作了汇报，征求他的意见，王反问我：

“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宁肯辞职，也不去邵阳。”王考虑了一会，对我说：“那也好，以后，我们再想办法将防空科与情报所弄回长沙。不过，你辞职后要推荐一个可靠的人接替你的职务，以便控制这两个单位。”我首肯了。第二天，立即写了一个辞职报告，并推荐科员、我的学生傅重晖接替我的科长兼所长职务，报告得到了批准。三天后，傅重晖率防空科、情报所的官兵连同器材乘卡车往邵阳去了，我仍留在长沙。

二

王灿然在我隔壁住了一段后，因怕被特务发现，便在麻园岭另租了一间房子。他离开时告诉我：“为了策应湖南解放，我们得筹组一个防空机构，以掌握防空情报，以防白崇禧部空袭。”我表示赞同。第二天，国民党华中区防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苏公望来家找我。他认为再跟白崇禧南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由于我俩志向相同，交谈也就很投机，所以我们决定在长沙重新组织“民防司令部”，待机起义。当晚我向王灿然汇报，王同意吸收苏公望为三一三〇成员，并要我与苏拟订出一个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作法：由三一三〇地下组织与省参议会会长唐伯球事先商量好，委托唐伯球暗地向程潜疏通，成全其事（王灿然与唐伯球关系密切，后唐伯球果然和程潜说妥了）；然后由苏公望直接找程潜，求他批准（因为苏公望是程潜的学生，加之他的一些在程潜身边任职的同学帮他说话）。湖南省民防司令部在得到程潜批准后于194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程潜兼司令，苏公望任中将副司令，我任少将参谋长。衡阳与邵阳两地的防空官兵及器材全都迁到长沙，归并到民防司令部。同时又登报招考了部分防空人员，用附员名义补充到

各科室服务。司令部初设长沙市北门大王家巷，随后又搬到新军路孤儿院（现为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内办公。

三

1949年7月，是长沙和平起义与反起义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月。国民党特务活动更为猖狂，王灿然要我提高警惕。我对他说：“我不怕，因为我公开的身份是少将参谋长，特务不会找到我这里来。同时，我家后面有矮墙，随时可以跳出去躲避。”由于我家地理位置好，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刘润世、吴健人，进步人士李少华等都在我家避过难。

1949年8月3日，经三一三〇地下组织告知，程潜和陈明仁将军将于8月4日通电起义，要我们配合行动。于是，我和苏公望也草拟了起义的通电稿。8月4日早上就发出了起义通电。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空袭，我们除用电话通知各防空监视队、哨不分昼夜监视外，同时派第一科科长王怀光率领部分科员及附员前往省会警察局防护团协助抓紧搞好防护工作，并电话告知省会警察局长兼防护团团团长刘人爵、副团长兼消防总队队长刘孟坚，要他们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减少空袭灾难。果然不出所料，起义通电发出不久，白崇禧暴跳如雷，当天就派了五架飞机侵扰长沙，在北门麻园岭、郊区陈家垅、回龙岭、城内顺星桥、财政厅等处投下炸弹。由于我们及时发放了警报，灾害得以减轻。财政厅中弹，仅被炸死1人，其他各处的损失也较小。长沙市迎解会主任委员仇肇，家住顺星桥五号，他的住房隔壁中了一枚炸弹，幸未爆炸，我们立即派人前往将那颗未爆炸的炸弹起掉了。当天晚上，程潜和陈明仁两将军对我们防空人员进行了表扬。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白崇禧又曾几次派飞机到长沙附近及株洲、湘潭一带盘旋骚扰，但未投弹，只散发了一些传单，企图阻止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并且利诱说：凡是不愿背叛的人员，赶快到衡阳报到，人人可以得到大量奖金，还能升官晋级。我们将搜集到的传单全部烧毁，白崇禧的企图又破了产。

四

我和苏公望率领湖南省民防司令部全体官兵100余人起义后，由我代表全体官兵出席了地下组织三一三〇在松桂园市参议会楼上召开的会议。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长沙工作组主任齐一夫（是随解放军一道进城的）对我们作了重要讲话。随后，齐一夫主任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天心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警备司令部去找王波参谋长，说是由王参谋长代表解放军负责接收我们。我去后，王参谋长带我拜见了长沙军管会肖劲光主任，并指派宋助民参谋住进我们民防部，具体做接收工作。起义后第三天，因为民防司令部的经费无着落，我找到了临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文斌，请他带我去见陈明仁将军。文斌和我很熟，他得知我们起义后没有领到经费，非常同情，立即带我去见临时省政府主席陈明仁。陈明仁将军对我们民防部在通电起义那天减轻了空袭灾害，表示非常满意，他立即批了一笔经费给民防部。

1949年10月1日，长沙军管会肖劲光主任命令将湖南省民防司令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警备司令部防空科（后又改为湖南省军区司令部防空科），任命我为防空科长，任兆丰王怀光为副科长。苏公望则调任高参，后又调任省参事室参事。除选留一部分官兵继续在防空科工作外，其余官兵或到其他单位工作，或送往浏阳教导团学习，愿意回乡的官兵则资送回原籍生产。从此，我们这些起义的防空官兵，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率三〇七师起义经过

张 诚 文*

1949年8月上旬，我在程潜、陈明仁将军领导下率国民党第一兵团所属一〇〇军三〇七师约一万人，在长沙市郊五里堆一带起义，投向人民，参加革命。在这个转变中，共产党、解放军的多方争取和帮助，个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和发展，部队内部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情况错综复杂，仅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

一、起 义 前 的 情 况

1948年秋，潘文华调为四川行营副主任，原驻宜昌的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改派孙震接替。潘文华命我在武汉替他办理结束事宜。那时，潘文华所属部队奉命在武汉附近进行整编，改归武汉行营直辖。将刘湘创建的、长期由潘文华将军统辖的新十七旅改为三〇七师，一六三旅和一六六旅合编为二三四师。这些四川部队，被蒋介石多次编并，官兵极为不满。白崇禧还想吃掉这支部队，派他的副参谋长去三〇七师任师长，被这个师的官兵轰跑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派陈明仁为二十九军军长到武汉来整编这支部队，下属三个师，即三〇七师、二三四师及程潜和白崇禧的警卫团编为一个师。此时，我的好友、陆大十三期同学胡素到了武汉，他知道陈明仁正在为统兵之人选着急，便极力

* 张诚文当时任三〇七师师长。

推荐我担任该军副军长或参谋长。陈明仁与我也是陆大同期同学，听说我在汉他非常高兴，认为我原是潘文华部队的老人，能得到川军官兵拥护，又是陆大同学，互相了解信任，特约我到他的内室谈话。他当时亲口对我说，任副军长是个空头衔，希望我当师长，协助他掌握部队，并说我们是同学，要挚诚相待，同舟共济。那次交谈内容很多，尤其是陈明仁推心置腹的对时局的分析，对我启发很大。1948年10月初，我奉命接任三〇七师师长，编入二十九军建制。陈明仁对我多方支持，部队补充了美式武器和装备，被服也进行了更换。当时该师有五、六千人，另由陈明仁指派他的同乡去湖南接兵，组成一个团，完全配备美式武器和装备。

1949年元月，陈明仁任武汉警备司令，指定我师担任武昌警备，由我兼任警备指挥官，我们从豹子潭整编地开到武昌来。那时，最大的问题是散兵游勇很多，市内常发生抢劫等案件，伤兵闹事更是逐步升级，剧场、影院都不能营业。春节前夕，陈明仁希望我把社会秩序尽快搞好。我部加强了警戒，要道通衢都加岗加哨，并组织武装巡逻队，抓了一些经常肇事的伤兵，大力维持社会秩序。春节期间虽没有出什么大的事故，但我们都有一种预感，蒋家王朝已面临灭亡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已成定局。3月初，警备任务交白崇禧所部接替。

在武汉时期，川军将领郭勋祺路过武汉与我会面。他是在襄樊与康泽同时被俘的，但被俘不久就释放了。出于我内心世界的需要，找他询问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他也主动谈了党的政策。这席话对我后来起义投奔革命，是有一定影响的。他还告诉我，此次去南京，是因为蒋介石对他被释放不放心，凶多吉少啊！早知如此，不如就留在那边。他还谈到了1927年1至5月，我在四川泸县任国民革命军四川总部委员时的老上

级——刘伯承同志的情况。最后，他要我一定掌握好枪杆子，打好基础，不要替蒋介石卖命。

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这样的事。1949年3月，陈明仁率领由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组成的第一兵团南下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白崇禧所属鲁道源部到武昌接替三〇七师警备任务。我师的一些团、营长就在下面嘀咕，认为陈不重视我们，这下过是一种家乡观念的表现。这件事白崇禧知道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趁陈明仁不在时分割我师。他下令我师的两个团，一个去鄂东，一个去鄂北，名曰剿“匪”，叫我仅带师直属部队去湖南。命令一下达，全师上下群情激愤，深表不满。我也在想，这样一来，我的“资本”全让他瓜分了，立即约与潘文华有联系的民主党派人士唐午园和我师各团长及二三四师各团长共同商量对策。决定我师全部集中汉阳，抵制白的命令，二三四师也在汉阳按兵不动，支援我师行动。唐午园给我们打气，并说他速与程潜联系，保证没问题，结果我们这样做了。白崇禧怕逼得我们造反，事态扩大了不好收拾，答应我师不分割，由我统一指挥。此时，陈明仁也从长沙赶来，他向我的下属作了一些解释，并把程潜的信给我看，坦率地向我表示，一定保持我师的完整，不许任何人分割，今后一切事情由他负责，听他的指挥，也希望我一定带好这支部队。此时，白崇禧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想拉我师留驻武汉，继续担任警备。我从唐午园那里得知，白崇禧是主战分子，程潜是主张和平的。所以我只敷衍应付。此时，程潜下令我部去湖南。我部立即行动，于1949年4月到长沙，和陈明仁同去见程潜后，即率部队先驻衡阳，不久即开赴安江、洪江打潘壮飞那一股土豪劣绅的武装。潘壮飞在国民党芷江警备司令杨永清的支持下，作乱黔阳，围困安江，扰害人民。我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叛乱平定。在攻克黔阳城时，我师九二〇团一士兵强奸了一位民

家妇女，被纠警队拿获，我当即命令，枪毙街头，以正法纪。从而整肃了部队军容、军纪。

二、起义与反起义的激烈斗争

我之所以跟随程、陈二将军起义，也非偶然。从我来说，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我在成都中法大学读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27年在四川泸县刘伯承的领导下工作，这时由姚自若同志介绍，我曾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后来因病和其他一些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想到过去与刘伯承同志有一些交往，我如果起义了，定会得到他的关照。这些经历和想法，是我投向人民的思想基础。

1949年5月初，局势一天天紧张，只能和不能打是我的思想基点。风闻程潜主和，但不能肯定。于是我一面派九一九团副团长杜宗冉、参谋处第四科科长阮忠源回川找潘文华及潘清洲联系，准备必要时把部队拖回四川。另一方面我自己到长沙看一看程潜和陈明仁的态度。

1949年5月下旬，我带了少数人员到长沙见到陈明仁，问他的打算。他坦率地向我说，长沙不是四平街，我们决不当蒋介石的替罪羊，湖南只能和平解放，决不打仗。他还说如果我同意，就将部队开到长沙来和他一起行动。他最后诚恳地说，我们都是老同学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并严嘱不要向任何人谈。我当即表示一切唯命是从。次日令副师长余九成，将部队带到长沙来。由于交通、供应等原因，部队于6月下旬到达邵阳。陈明仁又令我师协同一八七师等部队围剿新化、安化一带的姜亚勋部队。姜亚勋部是党的地下武装，陈明仁既然决定和平解决，为什么要围剿姜亚勋呢？我去见陈明仁，陈明仁说是白崇禧逼着干的，你师去新化、安化走一走，做个样子。从那里回长沙来，并不要你们打仗，我心里有了这个底。6月

底，我率部队从邵阳出发，按照陈的指示，向团长们打了招呼，当然我对他们仅说是为了保存实力。所以，在这次长途行军中没有与姜亚勋部打过仗。我到长沙见到了陈明仁，陈与我都感到高兴，因为彼此更加信任了。后来，陈明仁曾私下与我谈了两、三次话，从对蒋介石的不满到走和平道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具体方案等无话不谈。由此我看出他的决心是很大的，他也深知我的内心世界，深信我能跟着他，起义的决心也是不会改变的。后来他将我师的直接属于他控制的九二一团归还建制，由我统辖。

到长沙后，陈明仁明确指示，我师的任务是担任城防，师部驻福星街，部队部署在捞刀河、金盆岭、猴子石一线以西地区，住的是民房。编到一百军，军长是杜鼎，参谋长是刘云楷。下面三个师，除我师外，还有一九七师（师长曾京）和十九师（师长卫扶青）。卫是杜鼎的人，这个师武器装备较差，从实力来看，我师最强。

刘云楷本是陈明仁比较信任的，也是陆大同学。可是，在起义中他扮演了一个不大光彩的角色。记得有一天，他同兵团部参谋长吴迪吉（陆大十三期同学）一起来找我。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要求与我密谈。他俩一唱一和，无非是鼓励我反共到底，而我自始至终坚持要跟着陈明仁走和平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他俩前后与我谈了三个下午，结果他们失望了。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把他们与我的谈话内容向陈明仁报告，以至在起义以后刘云楷随杜鼎叛变，吴迪吉也逃往广州去了。

在长沙这段时期，我抓紧时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找了些下属谈话，与他们拉家常，谈形势，做了一些起义动员，态度十分明朗。在这方面副师长余九晟起了积极作用。

8月2日，陈明仁命我师撤离长沙市区，转移到河西湘潭市、咸家湖一带。8月3日，陈明仁约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正

武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迎接解放军进长沙，和平解放湖南的决定。杜鼎和卫戍青背后捣鬼说什么陈司令官怎么突然变了，表示不满。我知道他们是企图阻扰起义，即向陈明仁报告。陈立即令一百军开驻湘江对岸的望城坡。而后又把我单独叫到一边，交代我师都住五里堆，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严防杜鼎及卫师狗急跳墙。并要我见机行事，加强与他联系。

8月4日，程潜领衔发表了脱离蒋匪帮的通电，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我把报纸和传单向全师散发，公布这一行动。我主观认为，只要再努力做一些动员工作，起义就会成功，哪知还有更艰苦、又复杂的短兵相接的斗争！

因为我师绝大多数官兵与我一样均为四川人，他们家乡观念十分强烈，回四川的情绪普遍存在。同时，部队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无恶不作，罪行累累，他们深感害怕。这些无疑对起义计划的实施是不利的。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绝大多数官兵，对我是信赖的，我的话基本上是听的。所以，此时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他们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8月5日以后，蒋介石三番五次派飞机来，发了传单，丢了炸弹，谣言不断传来，人心惶惶。当时传单的内容主要是煽动下属部队反叛，反叛者赏光洋若干（师长可得五万元），并按照现任级连升两级。加之非湖南籍的官兵对佩戴印有红色“湘”字的白底蓝边三角形符号又强烈不满，认为是降格，是从正规军降成了地方武装。军心十分混乱，这样一来逃跑之风难以遏止。先是驻守湘潭的七十一军军部及其所辖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逃走。接着一百军军直属部队及十九师逃跑了，我师九二〇团第一营，背着我逃跑了三个连。此时情况十分紧急，九二一和九二〇团陈、余两团长也动摇了，希望我快走。一小撮顽固分子，想动摇我决心，朝着我的住房上窜开枪，子弹掠过树叶都清晰可见，到了晚上更是枪声四起。我师辎重营的一伙

人，他们扎了两乘滑竿，冲到我的住处，要强迫把我和我的爱人抬走，并要我调走部队向四川开拔。他们声称愿意把我从长沙抬到成都，说得声泪俱下。此时气氛异常紧张，全师上下都等着我的回答。我想，准备多时的起义，决不能败在顽固派的手中，纵然死也要高举义旗。这时我并没有被恫吓而屈服，反而非常冷静，一板一眼地大声说：“我张诚文活的是不会走的，要抬只种能抬死的。”我这有力的回答，对全体官兵起到一种稳定作用。难怪事后一个下属对我开玩笑说，是我的这句话把他们钉住了，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在这将近七、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同时，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迅猛进军，地下武装的有力配合，我采取了安抚与强制命令并举的措施。加之副师长余九成与我合作，官兵们对我坚定的态度较为了解，总算将部队稳定下来。到整编前，除九二一团逃跑了近两个营，九二〇团逃跑了三个连，九一九团仅有零星逃跑外，部队基本是完整的，武器装备是齐全的。对和平解放长沙，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三、起义后的整编

起义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把部队巩固下来，等待党来接收。由于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起义部队佩带“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符号。根据当时的情况，发给部队的薪饷不用人民币用现洋，这些措施，很快使部队安定下来。

不久，我师奉命移驻浏阳大瑶镇整训。即与驻醴陵的一九七师、驻醴陵白兔潭的二三二师合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军部驻大瑶公路西侧的刘家祠，王劲修任军长。我想到起义成功，总算对人民作了一点贡献，请求调我任兵团高参，由此功成身退。哪知陈明仁认为我起义有功，提升我为第一军副军长。三〇七师改称第一军第三师，师部与军部毗

邻。副师长余九成升任师长，九一九团团团长李瑶含升任副师长。

这次整编后，党组织派来杨树根、吴林焕、周志飞等同志来我部工作。11月下旬，部队进一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原三〇七师改编为五十二军二一六师，我任五十二军副军长。第二次改编后，我部开赴湘南攸县。

议 长 选 举 内 幕

1949年1月，省参议会召开第六次会议，改选议长。原议长赵恒惕辞职，副议长唐伯球选为议长，参议员席楚霖选为副议长。但其间却有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在此选举之前两个月，一些参议员便考虑“抬”出一个人来“顶”走赵恒惕。抬谁出来呢？大家认为，隐居东安的唐生智较为合适，凭唐的资望，是可以博得湖南人的同意的。如何“抬出”呢？东安籍议员席楚霖慨然愿意把自己的省参议员位置让出来给唐竞选议长。接着，由与赵恒惕关系较密的议员周君南游说赵，赵答应辞职。最后，由议员陈云章（赴上海的前一天）出马禀明程潜，程也默认了。

万事俱备，只等唐生智来长后，由席楚霖向唐将大家的意见说明，再由东安县参议会改选省参议员便行了。可是，当唐生智赴上海路过长沙时，陈云章已去上海，周君南又下了乡，而席楚霖竟没有将这些情况告诉唐。

唐生智到上海后，碰到了陈云章，陈问起这件事时，唐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然。陈知此事有了“变化”，便写了两封信回来，探询究竟，但始终没有回信。

原来席楚霖并非真心将议员名额让给唐，而是利用唐生智做幌子挤走赵恒惕，从而好让自己上台。（朋 朋）

在湘国民党部队起义后

陆承裕*

我曾担任起义的第一兵团和改编后的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兹值湖南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特将这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国民党第一兵团起义后的整编情况

陈明仁将军所率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原辖五个军（每军两个师）。1949年6月，改编为三个军（每军三个师），即第十四军（军长成刚），辖第十师（师长张用斌）、第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第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鐸，陈明仁的骨干部队），辖八十七师（师长杨文榜）、第八十八师（师长刘坝浩）、二三二师（师长康朴）；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辖第十九师（师长卫戡青）、一九七师（师长曾京）、第三〇七师（师长张诚文）。当时部队情况非常复杂，有些军、师长与陈明仁素无渊源，缺乏政治思想的互相信赖和情感上的依存关系。尤其军、师长之间，派系斗争，貌合神离。加以白崇禧、黄杰、邓文仪等曾先后进行拉拢活动，特务到处造谣蛊惑，因此，8月4晚长沙起义通电签发后，兵团副司令熊新民（曾受陈明仁之托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沿赴湘潭，与兵团副司令官兼湘潭前进指挥所总指挥刘进、七十一

* 陆承裕当时先后任第一兵团、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

军军长彭鏐等率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向邵阳方向逃离。与此同时，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副军长刘光宇率军部及十九师的两个团相继向南离去。致使兵团在长沙附近及湘潭的部队，就只有曾京的一九七师、康朴的二三二师、张诚文的三〇七师等三个师及十九师的一个团、宪兵第十团、水警总队及绥靖公署和兵团部的警卫部队了。

先是程潜于7月29日由邵阳秘密回长沙主持起义谈判，决定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改为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由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兼任总司令，以总统府参军李觉兼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在邵阳的党政军机关及所有部队，并将原绥靖公署在邵人员一律给资遣散。

8月1日上午，黄杰、邓文仪飞抵邵阳，召集第十四军军长成刚及所属师长训话，并将原绥署参谋长王天鸣拉走，引起邵阳局势混乱，人心惶惶，颇为紧张。李觉于8月1日下午抵邵后，即与绥靖副总司令王劲修、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省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中共联络代表张立武等联系，了解情况。

8月2日，资遣了绥署在邵人员。

8月5日长沙起义通电公布后，白崇禧派飞机轰炸邵阳城，并散传单。成刚背叛起义，派兵向邵阳城攻击，李觉约集王劲修、彭杰如、魏镇等党政军负责人会议，组成联合起义前进指挥所，决定撤出邵阳，指挥各部队向长沙靠拢。先后参加起义的有十四军六十三师汤季楠部（其中一个团出走），保安一、二、三师及保安司令部警卫大队，兵团部警卫团（一个营在长沙），邵阳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大队，戴文所属的湘西纵队，总共约五个师的兵力。经过一番曲折，并与七十一军和十九师等脱逃部队几次发生战斗，于8月14日到达浏阳附近地区集结。经程潜、陈明仁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团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达成协议，并经四野总部请示毛主席批

准，对长沙起义部队仍保留三个军辖九个师，可暂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的番号，由陈明仁兼任兵团司令员，李觉、魏镇等为副司令员，王劲修为第一军军长，辖曾京、康朴、张诚文等为一、二、三师师长，驻大瑶、金刚、白兔潭；傅正模为第二军军长，辖汤季楠、戴文、姜和瀛等为四、五、六师师长，驻跃龙市附近地区；彭杰如为第三军军长，辖何元恺、周笃恭、张际泰等为七、八、九师师长，驻永安市附近地区；兵团司令部驻浏阳县城。

经过这次整编之后，取得了编制系统之一致，纪律制度初步有了整振，官兵思想情绪逐渐有所稳定。然而特务造谣蛊惑之事仍时有发生，尤其是使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在人民群众中，在交通线上，在与各地党政军交往中都发生过误会，官兵由是产生误解，错误地认为是被歧视。此时四野总部派来大批军政干部，进驻兵团各机关、连队，进行政策宣传，开展思想教育，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了起义部队，开始改变了这支旧军队的面貌。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的番号，进行第二次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军缩编为两个军六个师，并从中共河南省陕州军分区调来两个团补足缺员。1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派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为代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的番号和“八一”军旗，并在浏阳城外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正式宣布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为政治委员，李觉、傅正模、魏镇为副司令员，方正平为政治部主任，王劲修为五十二军军长，康朴、戴文为副军长，辖二一四师（师长曾京）、二一五师（师长张镜白）、二一六师（师长张诚文）；彭杰如为五十三军军长，汤季楠、张际泰为副军长，辖二一七师（师长姜和瀛）、二一八师（师长何元恺）、二一

九师（师长周笃恭）。

陶铸代表中央军委将“八一”军旗授给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及各军、师、团长。我奉命担任这次授旗典礼大会的指挥员，感到荣幸而又紧张，从布置内外围警戒，仪仗队演习，指挥队列行动，都全神贯注，惟恐有失。典礼之后又举行了盛大庆祝晚会。经过整编的编余人员，大部分送南岳湖南军政大学学习，约百余人留兵团干部队学习，也有少数转业地方政府安排工作的。

二、驻醴陵整训

1950年1月下旬，二十一兵团奉令移驻醴陵、攸县、安仁之线整训。兵团部驻醴陵遵道中学，直属部队分驻城区附近，第五十二军驻攸县，五十三军驻安仁。

中央军委为了加速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分别从一、三、四野的部队中调来大批军政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部队的建设，健全了各级政治机构，保证了人民军队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对部队的改造工作，首要是抓政治思想教育，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在连队开展了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在机关干部中进行了形势教育和业务学习。接着全兵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干部战士一股劲儿共同投入生产热潮之中，还展开了分工竞赛的活动。我记得当时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为一个独自的生产单位。司令部这个生产单位又分工业交通运输组和农业生产组，前者，由总务科长胡升恒负责，在湘潭开有石膏矿，在醴陵有车站搬运队，后来由于不与民争利都撤回来了。农业组由我负责，首先就将遵道中学的大足球场开垦十来亩菜地，为司令部大食堂供应了蔬菜和喂猪的鲜饲料，改善了大伙的生活。其次是在河西山地垦荒数十亩。当时兵团党委发动大生产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号召大家从劳动中受锻炼，体会劳动改造人，劳动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在开始

大生产运动时，各个生产单位都向后勤部报请发给生产工具、种子和运输工具等经费。当时的后勤部潘报武政委是位老红军，对生产颇富经验，他在会上说：“根据各单位报来的生产工具预算，统计需要付出一笔很大的生产经费，过去我们在陕北搞大生产都是自力更生，精打细算。搞农业生产先依靠上面发一笔巨大的生产费，就好比蹲在茅厕坑上嗑瓜子，进的少出的多。”语言幽默，逗得满堂大笑。通过这次大生产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收获是巨大的，有少数干部过去确实五谷不分，韭菜不辨，初时对劳动有畏惧和怕羞的表露，例如挑粪桶怕脏、怕臭、怕出汗、怕压痛肩、怕走街上遇到熟人，怕同战士一同劳动。通过一段劳动锻炼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官兵关系改变了，劳动观点逐步建立了，皮肤晒黑了，身体结实了。又如在插秧收割的大忙时节，各级机关和连队都主动选派人员去帮助农民抢种抢收，并谢绝农民的招待，获得群众好评，赞为在共产党教育领导之下，真正成了人民的子弟兵。

1950年3月间兵团党委为照顾起义干部的情绪，将全兵团内干部随军家属包括小孩约200人集中起来，成立兵团妇女学校和幼儿园于醴陵四汾，隶属于兵团政治部管辖，进行文化、政治学习，按照战士的供给制待遇发给零用钱、衣服鞋袜、主食，过集体生活，四岁以内的小孩，则分等级发给奶费，每周末放假回家团聚。与此同时，中南军区还拨给巨款为兵团先后建设了文工团、京剧团以及体育设备等，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1950年4月初，兵团在遵道中学礼堂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的批判大会（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都参加了），政治部保卫部将逃走的原一兵团副司令官熊新民和原七十一军副军长鲍志鸿两犯押入会场。唐天际政委宣布熊新民、鲍志鸿等率部逃离，在广西龙洲附近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熊、鲍等没能

逃出人民的手掌，被活捉了，经四野批准押解来兵团进行批斗。陈明仁司令员严肃端坐在主席台正中，表现出无限愤怒的神情。一时对两犯揭发批判的怒吼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将熊、鲍两犯就地镇压。批斗到下午4时后，陈司令宣布批判暂时结束，对于熊、鲍两人待请示中南军区再行处理。后来中南军区军法部指示押送武汉，判无期徒刑劳改。这次批判大会对起义干部的教育很大，熊、鲍两人在起义时坚持顽固立场而逃走，特别是熊新民曾是和谈代表，以一念之差，未当坐上客，却为阶下囚。

1950年6至7月，兵团在起义干部中开展了一次民主运动，结合文件学习进行“三查”。人人都自觉地、详细地交待历史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进行大小会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吸收部分战士参加，向干部揭发问题，提批评意见。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对干部改掉旧意识、旧习气和旧军队的军阀作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等于每人都洗了一次干净的澡。195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25日，兵团政委唐天际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动员大家作参战的思想准备。所有起义干部几乎都递交了参战申请书，真是群情激愤，整装待发，但中央军委并未抽调二十一兵团部队，而是命令我们进行军事训练。

三、赴广西剿匪

白崇禧逃离广西后，不甘于其主力被歼之失败，留置一部残余部队和广西民团，散踞各地，号称30万之众，军师长、司令之类，名目繁多，乘我调兵抗美援朝之机，到处打家劫舍，破坏交通，异常猖獗，白崇禧宣传要反攻广西。1951年1月，二十一兵团部开进桂林时，晚上火车北站附近，仍常闻土匪枪声。

当时中央军委下达二十一兵团的剿匪任务，是限期6个月肃清。广西地形复杂，人民强悍而好斗，语言难懂，加以李宗仁、白崇禧统治广西近30年，~~民团建设~~有基础，要求6个月肃清残匪的任务是较艰巨的。兵团根据中南军区指示，先将两个军的兵力，部署在湘桂和黔桂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筑路工程部队修复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的黔桂路北段，修通柳州至南宁的铁路（南宁至凭祥归友军），逐次向铁道两侧地区推进。采用以班、排小部队筑碉驻守和集结机动兵力进剿的战术，并实行广正面的分区清剿，把兵团的警卫团主力也使用到桂林至鹿寨之线去了。由于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帮助群众，做到军政，军民配合密切，很快就将铁道沿线的残匪肃清了，逐步向全省偏僻边远山区扩展。例如大瑶山区乃瑶族聚居之地，山高路险，贫穷闭塞，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又曾受土匪的歪曲宣传所欺骗，对解放军一无所知，采取抵抗逃避的敌对行动，我军针对瑶民缺盐、缺粮、缺布、缺医药的情况，将这些物资送上山去发放，医疗队为他们无偿治疗。瑶民是诚朴纯厚的，几天后瑶族人民协助我军将大瑶山区土匪肃清了。又如百色地区，贫瘠多粗脖子病。我兵团运去大批食盐、海带、咸鱼等富于碘钙质的食品和药物，解决人民饮水中缺碘钙的问题。由于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侦察匪情，协助解放军搜山围剿，有些藏匿深远山洞的匪首或电台，也在群众的帮助下搜获。有些匪首走投无路，又找不到粮食，只好投降自首。因此，只5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剿匪任务。

在休整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转入正规的军事训练。也先后参加了“三反五反”、土改、肃反等运动。1952年5月，兵团一分为二，由陈明仁司令员率一部开赴海南，由唐天际政委率一部参加荆江分洪工程。

安化解放纪略

黄一俊*

安化县于1949年6月28日获得解放，成为湖南解放最早的三个县之一。

1948年元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派熊邵安回县重建党的组织。熊邵安回到安化后，由参加过北伐的进步士绅熊启疆出面联系，进入安化简易师范（简称友师）教书，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地下工作。首先，熊邵安联络了原隐蔽在安化的老党员熊启凡、熊志宁、周建侯、刘若云、姚一戎、李省三、刘绍贤等，传达了省工委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熊启凡等同志去农村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熊绍安同志在县城作青年学生工作。1948年12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安化县工委，由熊绍安任书记、熊启凡任组织委员、刘若云任宣传委员。先后建立了常丰、仙长、大东、樟龙、蓝田、桥头河6个区工委，并有东坪总支、一都、二都、江家湾、烟溪4个直属支部，党员达1000余人。

1949年3月，全县共建乡、保农会达150多个，农会会员16万多人。1949年4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保农会”的布告。县工委利用这个“布告”进行合法斗争，

* 黄一俊当时任中共安化县工委直属一都支部书记。

立即公开宣布成立“安化县农民协会”，由周建侯任会长，并印发了《农民组织通则》，提出：“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为农民谋利益”作为农会的宗旨。强调农会的中心工作是：执行减租减息，维护农民利益，办理民食调剂。由于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全县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如火如荼，在运动中又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

安化由于党的组织遍布全县，党的战斗力比较强大，加上开展了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这就为安化的提前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根据省工委指示精神，县工委从1948年起，即利用有利时机，策动国民党的党政上层人员和地方部队起义，积极建设人民武装。

1948年夏，县工委对安化县党、政、军上层人员进行了分析，决定采取“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派周建侯、熊启凡去做策反工作。周建侯是大革命时期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后经组织批准，当过国民党的乡长，与县里头目有广泛交往。他利用这些关系，打入县政府当上秘书，为进行策反创造了条件。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金金中、县党部自卫团团团长姚洪中（大革命时期党员）都看到时局对蒋介石越来越不利，思想逐步转变。决心弃暗投明，参加起义。但县自卫团团团长张甫成，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工作难度较大。原来，他在井冈山任过红军师长，后被国民党军俘虏，进过“感化院”，他怕共产党记前过，不敢毅然表态。张甫成是

掌握1200多人枪的实权派，必须力争，因此，县工委决定在他身上多下功夫。

熊邵安同志专程去省工委请示汇报，周礼同志表态说：“张甫成真心起义，不仅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还可以立功受奖。”同时，鉴于湘潭县张鹏飞起义过早地公开打出旗帜，惊动敌人前来围剿，影响了地下工作的开展。周礼同志又指示：“安化起义暂不要公开打出旗帜，就利用原招牌搞合法斗争。”

县工委通过周建侯向张甫成传达了上述指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部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受编受调；二是部队仍用原番号，暂不公开打出起义旗帜，但必须执行解放军的纪律；三是要暗地支持、保护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上金全中、姚协中、熊启凡一齐对张做了多次工作，张甫成的顾虑慢慢消除。但是，他还怕共产党讲话不作数，提出要吃雄鸡血酒搞盟誓。于是周建侯、熊启凡、金全中、姚协中、张甫成等人喝了雄鸡血酒，张甫成才表示决心率部起义。

1949年初，策动县自卫团暗地起义成功，县城两个警察大队也相继起义。至此，全县大部分武装都已控制在我党手中。至1949年5月，根据省工委指示，起义的自卫团正式改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第三团”，由熊邵安任政委，张甫成任团长，姚协中任团政治部主任。

为了壮大武装力量，县工委还发动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将各乡、保警察所枪支收夺过来，组成各乡武工队，并于1949年6月，正式改编为“安化地方兵团”，由彭越任政委、熊邵安任团长，共1200多人、枪。

1949年6月下旬，匪首尹立言率“西南民主联军”3000多人，2000多枪，窜入安化七星街一带，奸淫掠抢，无恶不作。湘中一支队决定歼灭这股政治土匪，部署一团打凤凰仑右翼，二团打左翼，三团打正面，五团担任截击。6月24日凌晨战斗

打响，湘中一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政委官健平，同在严家祠堂指挥部指挥战斗。一直打到傍晚，由一团从右翼突破，敌阵地全线崩溃，尹立言残部100余人向侧水方向逃窜，与蒋祺生匪部合流。还活捉了匪补给司令龙席珍，押到七星街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枪决。

6月28日上午，湘中一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政委官健平率支队第一团与第三团胜利进入安化县城，解放了安化。县城各界放着鞭炮，迎到五里牌，在英武中学礼堂举行欢迎会。大家喜气洋洋，欢庆剿匪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新任县长晏忠承偷偷溜走，旧县政权正式垮台。

6月29日，县工委在安师大操场，召开了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湘中一支队政委官健平、司令员姜亚勋同志先后讲话，正式宣告安化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兴高彩烈，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安化解放，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7月初，白崇禧调集了6个师的兵力，分别从益阳、新化、宁乡、湘乡等地向宁乡、安化、桃江边界地区进逼，围剿湘中解放区。县工委立即部署反围剿，将部队分散到山上打游击。7月2日，敌一六〇师徐淦一个团（番号三一七五）1500多人窜入县城。县工委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切断敌人给养。国民党军下乡抢粮，被我游击队零星吃掉。游击队又放出风声，说要包围县城。这时，解放军即将进入常德地区。敌人深恐身陷重围，全军覆灭，便于7月12日夜，偷偷向宁乡逃窜。13日，在团山桥遭我游击队伏击。至于敌其它部队，都因在途中遭到游击队阻击或牵制，都没到达县城而折返，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

1949年7月，四野战军挺进湖南，乘这胜利的形势，县工

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积极开展了迎解支前工作。

7月21日，县工委成立了“安化县军粮征借委员会”，由周建侯任主任，下设总务、筹借组，负责筹备军粮，以迎解放大军的到来。

7月22日至23日，县工委在梅城召开了会议，研究了迎解支前等项工作，作出了几项决议：

1、加强县工委组织领导。在县工委下设8个小组：肃反工作小组、调研并协助接收小组、军事小组、工运小组、农运小组、青运小组、妇运小组、宣传小组。派龙梅修同志接管《安化民报》，改名为《安化导报》，加强革命宣传。

2、按中共湘中地工委书记官健平同志指示，成立“安化县暂时行政办事处”，由熊邵安任主任，印发了布告，行使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

3、提出地方兵团的方针、任务是：巩固组织，扩大力量，安定秩序，打击敌人。

4、训练干部。为了政权建设的需要，决定举办干部训练班。由刘若云、熊启凡、彭越、梁宇等同志讲课。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七师没耗一枪一弹，浩浩荡荡开进安化县城。县工委组织沿途群众烧茶水、送草鞋、做粑粑、煮鸡蛋欢迎解放军。进城时，县城军民列队3里，夹道欢迎，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汇成一股欢乐的浪潮。并于东门外大沙坪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军民联合大会，整个山城都沸腾了。

一四七师在安化休整了几天，10日向新化进军，在鸡叫岩与白崇禧部激战后，解放了新化县城。为了组织衡宝战役，奉命作战略撤退。8月24日，一四七师撤回安化，休整待命。新化县已暴露的地下党员文诚生、李孝先、潘崇信等30多位同志也同部队转移安化，安化成了解放军的可靠后方。至9月24日，复向新化进军。同时，还有大批野战部队沿资江而上进军湘西。

由于安化驻军和过境部队多，驻军时间长，安化历来是缺粮县，又值青黄不接，所以，保证部队的给养，成了当时一个极其艰巨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县工委把支前工作作为安化全党的中心任务来抓，成立了“安化县支前司令部”，提出了“一切为了支前”的行动口号，具体做了六方面工作：

①筹粮。当时，解放军日需大米约3万斤，马料谷及草约万余斤，柴火3万余斤。县采取借、征购粮、抢收早熟中稻谷等办法，共为大军筹粮300多万斤。

②筹款。一四七师复入新化后，给养发生困难。师长郑贵卿要求安化支援。熊邵安指示将银洋所余票据，折价银洋2400元送往新化，并亲自筹措了25两黄金和400元银洋交给郑师长，解决了部队之急。

③劳军。解放大军进入安化后，县工委组织妇女成立了“茶水服务组”、“洗衣组”、“募捐军鞋组”、“慰问组”，劳军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全县共为大军募捐军鞋4000多双。

④接待伤员。县工委在“培英堂”、“张氏宗祠”设立了“安化县伤兵招待所”，由党员张文毅负责，从8月21日起至9月6日止，共办了半个月，许多治愈出院的伤病员，愉快归队，重上前线，追歼敌人。

⑤输送知识青年入伍。解放军南下，需要知识青年入伍工作。县工委推荐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党员到部队工作，并动员了400多名青年学生报名入伍，随军南下。

⑥配合作战。衡宝战役打响，一四七师奉命向邵阳进军。县工委组织了3000多人的支前队伍，帮助运输、抬单架，派出50名骨干担任向导和侦察，湘中一支队命令第三团，按一四七师部署配合作战。在三角塘、砖塘铺两次战斗中，歼敌30多人，缴获大炮两门，各种枪80多支。

（陈首涛整理）

许新猷在岳阳起义前后

许子行 许巴丘*

先父许新猷，字朗江，生于1893年，岳阳县黄岸市邹家山人。他于1919年4月任国民党岳阳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部起义，为岳阳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些工作。

先父起义前，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青年时代，他从岳郡联中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在校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岳阳。随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刘士奇（共产党员）来到这里。刘士奇与孙稼等人组建了中共岳阳地委，大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城乡开展了工运、农运和其他革命活动，先父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1927年2月，岳阳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先父选为执行委员，任协会教育部长。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岳阳城乡，先父被追捕，从此离乡背井。后服役于国民党军政界多年，难免做过一些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铸成他终生的遗憾。光复前几年，任广东国民党陆军六师预备十七团代理团长，在揭阳、朝阳、乾岗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

抗战胜利，先父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岳阳。1947年10月

* 许子行、许巴丘系许新猷之子，许子行参加了岳阳起义。

任岳阳县政府军事科长。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长江天堑，挥戈南下。驻守岳阳的蒋军二三四师二〇〇团、二〇一团，五十八军、一〇三军、七十九军已成惊弓之鸟，社会秩序日趋混乱，原县长罗毅仁应付不了，电请省府批准辞职，并推荐先父继任。先父成为国民党岳阳县最后一任县长，兼自卫总队长（自卫总队下辖五个中队，一千多人马）。他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在地下党组织谆谆教诲和爱国志士热情鼓励下，为岳阳的和平解放，做过下述一些工作。

一、他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接受共产党有关和平解放岳阳的条件，签订了起义协议书，发出了起义代电。

当时在岳阳地下党工作的有几条线，先父主要与刘润世同志领导的陈步凡、朱西安同志一线建立了联系。因先父与陈步凡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一起工作过，彼此信任。当刘润世同志奉中共江汉区党委之命来湖南策反国民党上、中层人士时，陈利用与李光群的师生关系，首先策反了李光群（原国民党七三军七七师下级军官，旧县政府秘书刘楚贞的女婿）。再通过李光群做刘楚贞的工作，获得了初步成功。后通过刘楚贞转达了地下党的旨意，先父欣然接受，星夜召开了有李毅仁、李穆荃、任早生、刘楚参加的五人会议，商讨岳阳县政府何去何从的问题。会上一致主张起义，此时，先父对和平解放岳阳信心极大，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此我更加慎重，更加有决心，约刘润世同志来岳阳面谈，刘同志不避艰危，到达岳阳，派郭文蔚同志赴十二兵团政治部和江汉区城工部报告实情，当时由陈（成）铁侠（参议）回了一个明确指示。依照指示在反混乱、反破坏的原则下，我即定了一个将功赎罪的计划：一、武装

党的地下同志在乡村活动，乘机打击敌人；二、誓不随蒋军撤退，维持治安；三、暗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以安定人心；四、尽力保护各机关及国家财产，免遭损失；五、联合铁路工人，保护铁路桥梁，以利运输，而保人民财产……”先父多次密晤了地下党负责人刘润世、陈步凡和李西安等同志，同他们谈判并商议有关起义事宜。先父一再表示：愿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有：（一）县政府及自卫总队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指挥；（二）接受监督，由共产党派出专人常驻县政府，并直接掌握一、二中队，负责监督起义事宜的执行；（三）县政府的全部档案和文卷、财产物资及自卫总队的枪支弹药应妥善保管，保证不失片纸只字，一弹一枪；（四）解放军进城时，由共产党保证全部起义人员的人身安全。

约5月中旬，趁王翦波出走的当天晚上，地下党负责人陈步凡与李西安等同志商定后，由李西安同志到县政府与先父签订了书面协议。以后，先父即向中共江汉区发出了关于率部起义的代电，由地下工作人员郭文蔚交给了南下工作团来岳阳接管的县委书记赵冰岩。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专员王翦波残部从中作梗，保证起义协议全部实现，先父还派侄子许志和掌握一个中队的武装，日夜加强戒备，确保地下党工作人员的安全。

二、积极协助地下党壮大革命武装，开展迎解工作。

为了维护革命秩序，稳定人心，保护春耕生产，当时地下党已建立了武工队。先父从县政府武器库中提取步枪80余支，并新建立一个中队，交李光群掌握。不久，又借口原中队长周传本经济手续不清，将此中队进行改编，任命傅依菊（解放社成员）为中队长。这两个中队的武装均由地下党掌握调

遣，能起到左右和监督全总队的作用。先父还对杨贞洋、邹满瑞、方毅人等同志的武装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援助。先父起义以后，地下党多次向他提起注意军粮问题，要他把协助地下党为解放军筹集粮食，保护仓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5月间，得知驻黄沙街七十九军军长蒋当一计划将岳阳沿铁路的仓储粮食运往长沙去的情报后，先父即报地下党采取了措施，动员游清湘（原国民党师长）和黄继香（民主人士，刘润世的表哥）二人亲赴黄沙街对蒋进行劝阻，终于将蒋当一准备运走的粮食留下了。在毛田方面还协助武工队及当地群众运粮数十万斤至通城，交给了解放军。

三、维护社会治安，确保起义实施。

先父根据地下党刘润世、陈步凡等同志的授意，将河西的一个中队调回，将胡坤（此人顽固不化）中队驻地限制在城郊，不使离开交通线，以便控制，避免哗变。平时将自卫总队武装驻防东乡山区，真空时进城维持治安。5至7月上旬，自卫队一直驻防渭、饶村一带，与武工队配合作战，打击顽敌。将解放时，进城协助武工队维持治安。这样一来，人心稳定，四乡安宁。六月份，湖北保安第三团窜入黄岸市进行骚扰，先父即率兰天一、王子贵和许子行（当时任县自卫队排长，作先父贴身通讯员）等二个中队进行堵击，保护了黄岸市人民财产的安全。1949年7月16日清晨，南津港铁路大桥被炸，全城震动，敌军全部撤出岳阳。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兼之临湘李长江部纠集王翦波残部冒充解放军，企图强行进驻岳阳，乘机劫掠，先父洞悉其奸，严阵以待，将其拒于城外五里牌，使县城未遭破坏。为确保起义实施，还收编了地方游勇。如麻塘乡副乡长范中岳、邓荣观为首纠集乡丁游勇，在地方上打家劫舍，搞得四邻不安。先父三次令长子许子行进行劝阻，

敦令范、邓二人改邪归正。后见范、邓有悔改之心，将其收编到自卫总队，使乡村免遭其害。

解放大军即将进城时，为防万一，先父严令长子许子行到进城路线的前沿据点马壕里枫树桥，监督当时守军三中队三分队胡如林，严格执行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命令。

1949年7月20日，阳光普照，古城人民载歌载舞，鞭炮齐鸣，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午8时左右，先父精神焕发，随同党的地下人员，到马壕里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九师副师长杨力率领的四七五团进城。在原岳阳县政府大操场召开了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解放军四七五团王政委庄严宣告岳阳解放。

过后，杨力副师长，王衍铎团政委，乔羽生团长会见了先父，祝贺他率部起义成功，并指示岳阳暂时实行军管，一切行动听从南下干部工作团的安排。过了二天，根据解放军的指示，先父集合了自卫总队全部人马、枪支、弹药，在现一中大操场列队，下达了接受解放军整编县自卫队的命令。这样，岳阳未放一弹、未损一木，而得到了和平解放。

7月25日，共产党南下干部工作团从临湘云溪乘船于当日傍晚抵达岳阳，先父在县政府会见了他们，在坐的有县委书记赵冰岩、县长罗西芳、组织部长王三金、宣传部长李满全和公安局长范福海等同志。赵书记、罗县长表彰了先父能执行和遵守起义协定，对其起义表示欢迎，赞扬了先父对岳阳和平解放所持的明智态度和所作的贡献，并接受了先父愿为新政府服务的请求。后经长沙地委批准了这一请求。先父起义参加革命，担任岳阳县独立团副团长，岳阳县支前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1950年，先父奉命参加了荆江分洪指挥部工作。

陈采夫与常德解放

陈克理 陈克琛 陈克璇*

家父陈采夫，又名陈泽芹，在省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蔡大情。1905年出生于临澧县修梅乡（原四区叶腊乡）。1925年1月26日，他在上海经同乡林伯渠介绍，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历任排、连、营、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总队副。1938年改任第八十八师副旅长、旅长，参加过保卫武汉的大别山战役，后调任八十七师参谋长（陕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率部由滇入缅，对日作战。1944年调重庆军官总队任第一大队长。1945年调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指挥部任副指挥。1949年1月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地下党的掌握下，通过程潜出任湖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常德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在此期间及解放初期，在常德地区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军搞两面武装，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配合解放军行动，为常德地区和湖南的解放做了一些工作。

一、组织“民促社”

1948年，父亲由广州迁驻长沙，在国民党联勤总部粤汉铁路

* 作者均系陈采夫之子，陈克理于解放前参加过“民促社”联络工作。

军运指挥部任副指挥，接受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在省工委书记周礼指示下，组织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军官中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家父任“民促社”总干事，并要其长子陈克琅从香港回来任“民促社”秘书。因为该社的发展对象为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组织的中上层人物，而他们中有些人态度暧昧，个别人甚至立场顽固。工作一旦失误，便有人头落地的危险。父亲受党的指派，置生死于度外，积极进行组织发展和策反工作。1948年秋，他在宪兵第十团团长沙和瀛家中（长沙新河面粉厂楼上），与姜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姜说：“我们打共产党是打不赢的，……我向张镇（宪兵司令）上了一个条呈，劝他把宪兵部队集中到湘西、湘南，看看时局的变化再作打算。他没有理我，必要时我只好一个人干，你觉得怎么样？”父亲很镇静地说：“蒋介石已垮，国民党必亡，你说的上山的办法，恐怕也保不了你的身家性命。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共产党。”姜团长非常激动地说：“我是宪兵团长，难道叫我投降共产党不成？今天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父亲继续说：“我很了解你，你现在很徬徨苦闷。我虽然说得冒失一点，但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以为靠拢共产党是我们大家今天的唯一出路。”姜说：“我倒从来没有碰到象你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说客，竟然要我投降共产党。”父亲又说：“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好汉要弯上转。你我都是黄埔学生，你一贯反共，我也是反共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再反就很危险！这不是开玩笑，我是提起脑袋来和你说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相信你不会把我怎样。”姜听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以后少搞义务宣传，今天碰到我，算你走运。”说完，姜就送父亲出门。以后父亲又通过马子谷等人做姜团长的工作，父亲并多次邀姜团长到我家吃便饭，消除他的顾虑。在父亲的多次劝导下，姜终于下了决心，愿意接受

共产党的领导，率部起义，不仅自己加入了“民促社”，还在宪兵团及其朋友、同事中发展“民促社”成员，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解放后，宪兵第十团在安仁改编，姜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五十三军二一七师师长。在二亲的劝说、影响下，国民党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湘东师管区司令员蔡杞材、补充第四团团长刘鸣球、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刘人奎、省政府警备大队长姜定华等人先后参加“民促社”。父亲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一个个地向军、政、警、宪、特组织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宣传党的政策，发展“民促社”成员，分化瓦解敌人，化敌为友，化阻力为助力，使许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对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建立“突击队”

1949年元旦，国民党退伍军人谭杰（慈利县人）来到我家，父亲与大哥陈克琅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认清了前途，决心跟共产党走，并加入了“民促社”。父亲要他回临澧、石门县一带，建立地下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父亲对谭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只能送你1支手枪和20元光洋，作为你的活动资本，一切全靠你自己好自为之。如果有可能，我会派人来协助你领导部队。”谭杰受命之后，于1949年2月10日晨，率陈松桂、郭玉乾、秦国栋、明季政等人夺枪起义，上太浮山打游击，2月下旬发展到40多人枪。省工委于3月委派正遭受特务追捕的长沙专学生、中共党员朱明超（原名刘静）与其妻共青团员朱芳（原名杜桂珍）假扮兄妹来到这支部队，在这支部队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四处袭击敌人。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二百多人枪，成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谭杰为大队长（后加入了共产党），大队政委樊士元（中共桃源区工委书记）、副政委朱明超。这支部队发展迅

速，活动于常德、临澧、桃源等地，是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1949年4月，湖南省工委通过程潜调家父任国民党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韭菜园会议上，把全省各地壮大武装、公开起义作为各地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周礼在面授方用成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方用任书记）的同时，嘱建地下武装组织——“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令家父任总队长，方用任政治委员，下属六个突击大队。武装斗争烈火逐步遍布现在常德、益阳两个地区的十多个县市。1949年7月1日，突击总队由家父与方用同志签发了第一号《战斗命令》，要求各突击大队“立即在精神上动员各级干部和群众，人人都应有‘明日起义’的准备，以配合解放军的主力来解放这一地区。”随后发出第二号《战斗命令》，给各突击大队下达战斗任务。

同年6月下旬，澧县三贤、荆南、官垸的第四突击大队在左承统、谭徽岗、刘裕舫、李代宣、龚剑萍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武装起义，夺取乡公所枪支，被国民党当局察觉。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副总司令周磐（驻常德）下令通缉家父，“活捉者赏光洋五千元，打死者赏光洋两千元”。父亲被迫转入地下，在石门、澧县、临澧、桃源、安乡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当时，特务四处追捕他，他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一个晚上转移两三个地方。1949年7月中旬，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对突击总队下达命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军行动。”因为父亲在不停地转移指挥所，一时联系不上。陈克琅（“民促社”秘书，代替父亲联系地下党与策反对象）便派负责联络工作的陈克理随方用由长沙到常德传达上级指示。“民促社”骨干湘东师管区第二团团长刘鸣球为陈克理搞到湘东师管区司令部所发的军队服装、符号与证件，陈克理化装为师管区上尉副官，随方用同往常德。到常德后，方用拿出两本黄色小

说、米汤与新毛笔，口述命令内容，由陈克理记在小说上，即离开常德到临澧。陈克理找到“民促社”成员、临澧县警察局长侯方宇（父亲的挚友），他也不知道我父亲的准确行踪，只告诉了几个秘密联络暗号。陈克理步行了3天找了8个联络点，才找到父亲，他身边只有十多人的警卫。父亲看了用碘酒显示出来的华中局指示后，当即下达了第三号《战斗命令》，派人分送6个突击大队，并将所指挥6个大队的人员武装分布、战斗情况向陈克理作了介绍，要求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并一再叮嘱：

“你在临澧县城读了几年书，很多人认识你，一旦认出，你身上这套军装也救不了你，我的一个优秀联络员李忠涛已在临澧被捕了，至今下落不明（后英勇就义）。你不能再在临澧露面了，迅速返回长沙，这些情况只能向涂西畴同志当面禀报。如果被捕，宁可死在酷刑之下，也不能说出半个字来。这是党的机密，关系到突击总队的存亡啊！”从来不将父子之情形露于色的父亲，此刻也流露出一缕离别之情。他看了次子一眼之后，挥手道：“走吧！多多保重。”不满17岁的陈克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迅速绕道返回长沙，在长沙市化龙池找到了涂西畴同志，如实作了汇报。

“突击总队”及其各大队成立后，遍布安乡、华容、澧县、临澧、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一带，对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打击游杂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促进常德地区的解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追寻宋希濂

1949年7月下旬，常德解放，国民党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率部队20余万人经西往南溃退。为了动员宋希濂起义，中共中央华中局委派一位解放军副军长为代表，偕父亲（他与宋是黄埔军校同学，又是宋的老部下，私交甚厚）和宋希濂的堂兄等

人，化装成商人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去追寻宋希濂。当时湘西各县尚未解放，又是土匪的老巢，而且各据山头，烧杀抢劫，无所不为。父亲虽然认识其中几个土匪头目，也说得几句土匪的行话，但毕竟土匪股数太多，又不相互制约，所以此行沿途危机四伏。父亲临行前回家与母亲告别，并给子女们留下了遗书：“此去凶多吉少，不成功，当成仁，愿尔等继承父志，追随共产党革命到底。吾九泉有知亦瞑目矣。”随即启程。因宋部系机械化部队，行军快，而父亲等人乘民用客车，沿途受到土匪搜查盘诘，所以速度很慢，从常德到沅陵只有一百多公里，却走了好几天。到达辰溪以西30多公里处，遇到了一股新组合的土匪。他们不听国民党的命令，也不听其他匪首的号令，只是抢财物，父亲等人身上的旅费、钢笔、手表全部抢走，他们所带的解放军布告，党组织给宋的信件也被洗劫一空（放在车顶行李中，不便随身），再也无法前进了，只得返回。后来，1985年8月宋希濂先生从美国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会后到了湖南，住在蓉园宾馆，见到陈克理、张家懿夫妻二人时说：“你父亲是我的好朋友，人很能干，为人正直，可惜离世太早了，好在你们兄弟都已成材，令尊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又说：“在向贵州、云南撤退时，我一直在等一封信，但没有等到。”大概就是指父亲去送而没有送到的那一封信了。

1949年7月24日，经地下党和“民促社”的策应，临澧县长袁平凡、党部书记长蒋蒸初、警察局长侯方宇率部起义，临澧宣告和平解放。7月29日，常德解放。解放后，陈采夫任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第二副专员。

我到益阳前后

陈 扬 汉 *

湖南和平起义前，我参加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并与湖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我将长沙警备区兵力驻地表，人员武器装备等按照要求交给了地下党。还将军服符号、公差证明等交给地下工作人员涂西畴、欧阳方、刘禄铨、陈克刚等使用，从此地下党的联络工作搞活了。并对岳麓山、水陆洲、左家垅、望城坡、三叉矶、新河铁桥、黑石渡、回西渡、东电渡、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轮渡码头等交通要点，以及电厂、剧院和有关单位仓库物资集中的地方，加强戒备，并安装专线电话。

1949年7月初，我与地下党的来往传到了白崇禧的耳里，白即电话程潜，指责“长沙警备司令部第一警备区指挥陈扬汉私通共产党”，即令押送总部军法处查办。省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为了应付白崇禧，只好将我暂时扣押，并借故拖延时间而没有送军法处。7月18日，我恢复了自由。这时，程潜正准备赴邵阳。

程潜赴邵阳前夕，曾召集陈明仁、彭杰如详细研究了起义准备工作。彭杰如即将会议精神，对我作了简介。他说：“这次会议，决定起义指挥中心设在长沙，但内部仍区分为三

* 陈扬汉当时先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部第一警备区指挥、省保安司令部突击大队大队长、益阳保安副司令、第三军副官处处长。

个指挥系统，即第一兵团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长沙警备司令部（全省绥靖总司令部未设办事机构）；并决定将一些顽固分子调走，选派一些和平积极分子接替。”两天后将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鲍志鸿调走，派宋英仲接替，就是贯彻这次会议决定。

7月20日早晨，我奉命到了彭杰如的办公室，参谋长程邦昌已先到。彭说：“我明早随颂公赴邵阳，在那里设立临时指挥部，具体掌握驻潭宝路一带的部队，要岳岭、赵佳倬（均系副参谋长）、丁葆真（参谋处长）同行，长沙司令部的工作，就请两位（程邦昌、陈扬汉）负责。因为子公（陈明仁号子良）一再表示他离开湖南太久，对地方部队的情况不了解。”彭又对我说：“突击大队已于前天开赴益阳，必要时你去协助蔡杞材（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指挥部队，促进益阳地区完成迎解工作。一定要做到使家乡（彭杰如、陈扬汉皆为益阳人）父老兄弟姐妹安居乐业，公私财产不受损失。何时去为宜，可请示司令。”

1949年7月下旬，我遵命赶赴益阳任保安副司令，协助蔡杞材司令指挥部队。一方面令突击大队，加强城区各交通要点的警戒，防止敌对分子乘机破坏；另一方面令突击大队挑选官兵60人，组成巡逻执法队，日夜乘车巡逻，肃清散兵游勇，维护城区秩序，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由于我们正副司令都亲自随车监督巡逻，对无组织、披着军服的散兵游勇，当街剥下其军装，抗命者严惩。果然散兵游勇绝迹，地方秩序安定，广大群众称快。

当时，益阳系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益阳、沅江、汉寿、宁乡、湘乡、安化六个县，各县保安团队（大县设团、小县设大队）共约八千人，派系林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为了完成和平迎解工作，经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就汤下面”的办法，而令各县保安团队，根据本县实际情况，将部队适当集中，加强训练，肃清散匪，维护地方治安。其次如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不许鸣枪抵抗，并迅速报告区司令部，如果一时得不到指示，即挂机撤退，向益阳县城靠拢。

益阳县保安团长熊建勋，不听调遣，擅自将部队移驻桃江、沅江一带。我曾三次与之通电话，要他立即将部队开回益阳县城。第一次答复“遵命”，第二次答复“正在准备开拔”，第三次答复“开不动”，结果被歼灭了。

8月1日，驻益阳的第一〇三军被迫南巡。它的后卫部队，指派某营李副营长，率兵一排，携带汽油等燃料，准备放火烧毁资江渡口轮船、汽车等，被我守备部队制止。

8月3日晨，蔡司令接到沅江县长刘民英电话，知道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沅江县城，除指示他热情欢迎外，还要他转告解放军负责人，说明益阳已派出代表到沅江甘溪港迎接〔专署派科长刘梦荷、县府派秘书符清俊（地下党员）为代表〕。当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第一四六师先遣部队乘轮船达到益阳县城。专署和县府人员以及各界代表和群众，在益阳东门口轮船码头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与此同时，机关正常办公，市场正常营业，人民没有受到一点惊慌，欢庆益阳和平解放。

8月4日，将突击大队等部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六师整编。5日，益阳县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颜建任主任，杨朴庵等任委员。6日，益阳各界举行庆祝解放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群众大会，推杨朴庵为代表在大会致词，祝贺益阳解放胜利。6日下午，蔡杞材、郭洁诚（省工委派到益阳去的）和我认为已完成地下党和程、陈两将军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即乘民船（当时轮船、汽车均停开）离开益阳回长沙。

8月7日晚12时达到长沙水陆洲（沿江大道戒备森严，不许船只停靠），直到8日凌晨才上岸。蔡杞材回湘东纵队司令部，我回省保安司令部。获悉已有3天（五、六、七三日）与

各部队和彭杰如等断绝了联系，程邦昌卧病在床，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焦急万分。我从8日中午起，集中4部无线电台，日夜不停地督导电务人员发出呼号，与此同时，利用有线电报电话以及传达人员，多方联系，直到8月11日才与彭杰如联系上，获悉他和李觉、汤季楠师等部，已到达湘乡杨家滩，保安第一师驻谷水，保安第三师驻青树坪一带，保安第二师驻新化大桥。程潜、陈明仁才松了一口气，当即指示：“速电彭杰如率汤、何、周、张各师，开回长沙。”

由于和平起义通电名单，事前考虑欠周，没有将湘东、湘西、湘南、湘北四个纵队司令，湖南各地区保安司令、衡阳（第二区）、邵阳（第六区）、沅陵（保安第五师）三个警备司令列入名单，造成些矛盾。直到与中共代表团对话后，我接到中共一个新的任命电报，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任命唐星为第二兵团司令员，彭杰如为第四军军长，魏镇为第五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戴文为第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我收到这份电报时，已是8月中旬，当即请示陈明仁，并说明现在部队已跑掉不少，编一个兵团恐还不够，这份电报怎么办？陈即指示暂存。

原第一兵团辖9个师，参加起义接受整编的只有4个师，即第一九七师（师长曾京）、第二三二师（师长康朴）、第三〇七师（师长张诚文），以上3个师改编为第一军（军长王劲修、副军长康朴、参谋长陈庚），第一师师长曾京、第二师师长康朴兼、第三师师长张诚文，第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改编为第二军（军长傅正模、副军长汤季楠、参谋长程焯）、第四师（师长汤季楠兼）。

受省保安司令部指挥的4个纵队（湘东、湘西、湘南、湘北4个师管区）参加起义接受整编的只有2个纵队，即湘东纵队（司令蔡杞材）和湘西纵队（司令戴文）。即以湘东纵队为

基础，将警卫团（团长程元）、宪兵团（团长姜和）、水保安大队（曾一度改称水警总队，队长陈立漠）、警卫第一大队（大队长易瑞棠）、警卫第二大队（大队长姜定华）等部改编为第二军第五师（蔡杞材坚辞师长，改由姜和瀛任师长），湘西纵队改编为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戴文）。

原省保安司令部辖5个师，参加起义接受改编的只有3个师，即第一师（师长何元恺）、第二师（师长周笃恭）、第三师（师长张际泰），以上3个师改编为第三军（军长彭杰如、副军长蔡杞材、程邦昌，参谋长廖秉红）第七师师长何元恺、第八师师长周笃恭、第九师师长张际泰。当时，我任第三军副官处处长。

1949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

长 沙 市 和 平 促 进 会

1949年1月7日，经长沙市参议会议长周翰同意，市参议会出面通知各界各行业及进步人士在市银行大楼召集座谈会，到会者有一百四五十人。座谈会由仇鳌主持，大家一致拥护成立长沙市和平促进委员会。不久，该会即在市参议会成立，推仇鳌为主任委员，胡达为副主任委员，张匹青、黄性一、周世钊、三季范、周乃霞、左学谦、陈伯勋为常委。陈伯勋为总务组长，驻会工作，黄性一、胡书卿、罗树声、刘孟坚分任秘书、宣传、财务、消防组长。办公地点设市参议会内。以后成立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推仇鳌为主任委员，刘公武为常委兼总干事。市和平促进会即迁省参议会内，与省和平促进会合并办公，指定黄国兴为秘书兼记录，陈伯勋为总务兼收发文件。5月初，省、市和平促进会参加了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

（湘 人）

到湘南策动欧冠起义

肖如柏*

1949年9月，湘南还未解放。徐启文同志函请湖南省公路局的军代表刘韵秋同志（即后来的局长）派我（系民盟成员）前往湘南做策反工作。给我的任务是尽快地策动我岳父欧冠先生起义，欧先生当时任衡阳警备司令和国民政府湘南行署主任。由于时间紧迫，要我迅即乘船去湘潭，然后徒步前往衡阳，正是1949年10月1日的晚上，整个长沙市沉浸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狂欢之中。当晚，我是在由长沙去湘潭的木船上度过的。

在沿途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当我们不只一次地越过封锁线到达衡阳时（大概是10月4日），国民党湘南行署等军政机关已南撤零陵。我只得穿过大量从邵阳等地南逃的国民党军冒着细雨，连夜步行向零陵方向前进。因为我自称是来塔上南迁汽车的公路局工程师，比较容易地混过国民党军队的多次盘查，于黎明赶到洪桥。洪桥汽车车站站长一见面就知道我是长沙来的，我向他作了一番简单的解释，并示意要他做好保护路的工作。通过他帮忙，让我顺利地塔上一军用卡车，和国民党下级军官挤在一起，于10月5日上午到达零陵。

下车后我立即奔向湘南行署，以前认识的何副官出来接我进去。首先接待我的是欧珠园，她认为我来得非常及时，她说

* 肖如柏系地下民盟成员，欧冠女婿，当时在省公路局任工程师。

白崇禧派来的专车正在等待她们姊弟和曹茂琮的家属吃完面点就动身去桂林。由于我的到来，使他们姊弟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一道回宁远去接母亲，欧珠园很快就征得了欧冠先生的同意。白崇禧派车来接欧、曹两家眷去桂林，这个做法的用心是不难洞测的。欧冠先生因我到来而不同意家属去桂林的决定是明智的，使我还没有同他见面之前，就增强了这次策动起义的信心。

中餐时，同桌有国民党军政部黄杰派来的特工人员，他们一再问及长沙解放后的情景和我南来的目的。我装出一副不问政治的技术人员的样子，和他们谈长沙解放后的情况。并说这次回家乡宁远去照顾年老的父母和小弟妹们，还有我两岁的孩子，以免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遭到意外。因我既是欧冠先生的二女婿，又的确是从未从政的年轻工程师，他们也不怀疑。

白天，欧先生一直未与我见面。晚上，欧珠园方领我去欧先生的寝室，我们用宁远土话进行了交谈。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并指出现在已是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可以接受白崇禧委托的“湘南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总指挥的职务，我说只要能得到武器就可以答应。商谈结果决定第二天清早即由我带着欧珠园、欧贤定（欧先生的大儿）途经道县去宁远，他将派李清献先生（原衡阳警备司令）赶到途中与我联系，他说周围耳目多，要我多加注意。

我和欧珠园、欧贤定姊弟从零陵步行去道县，在途中，李清献先生随后赶来。我过去在长沙岳父家见过面，所以很快就商谈起有关起义事宜，决定由我去宁远与县长郑兆昌取得联系，做好宁远自卫队的工作，他则去某保安团团长李可才处。我们刚到道县不久，欧先生也率湘南行署人员来到道县，住在一所中学里。这次，我们较为详细地交换了关于起义的意见。我在回宁远的途中，经过道县岳母的老家，顺道到下河洞将母

亲、弟妹、还有我的孩子接回到宁远城北门外肖村我的老家。

10月上旬，经过李清猷的介绍，我到宁远县政府与郑兆昌见了面，谈得比较好，看来他们都是愿意听从欧冠先生指挥的。以后还陆续见到了自卫队的各个头头，他们最关心的是起义后的地位，主要是欧先生的态度使他们消除了顾虑。为了出入方便，他们让我戴上一枚宁远县政府的徽章，谎称我是县府秘书。这时我住在北门外老家，为了工作和安定人心，我每天来往于住处和县府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宁远突然到来一批国民党的军队，据说是白崇禧的桂军，在宁远闹了几天就仓皇离去了。在他们呆在宁远城的时候，全部自卫队人枪均暂时离城躲藏起来。

后来，欧先生率湘南行署人员和一个警卫队来到宁远，住在北门内他的住宅里。深夜派人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居住，一直到我完成任务于11月中旬离开宁远。

欧先生回宁远后，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较多，有机会向他介绍一些革命的道理，以打消各种顾虑。由于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从政多年、对中国共产党毕竟缺乏了解、虽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在白崇禧恐吓利诱、软硬兼施的情况下，难免心存犹豫。对这位老人来讲，转变过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他在发出起义通电之前，每晚都收听敌我双方的广播，睡得很晚，不断地向我探听党和人民政府的意图。也就是说，欧先生对党的政策和我这个人，也有一个由怀疑到相信的过程。

大概是10月下旬，欧冠先生召集高级官员开会商议起义事宜。他预先要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取会议情况，必要时要我出面说服反对者。那天晚上的会，气氛显得相当严肃。欧先生穿上了国民党将军的军服，他首先发言，对解放战争特别是湘南情况作了比较认真的分析，然后提出起义是唯一出路的结论。在讲话中也提到湖南省党政机关已派人来此促请他率部起义，能确保

起义者身家性命安全和合理安排。到会的人大都支持起义，只有蒋鹏翥一人坚决反对，并以北伐战争的胜利说成是国民党的功劳，用北伐后国民党的逐渐走向腐败，来预言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将走向反面等逻辑混乱的东西来力劝大家不要上当。因为他是国民党的省参议员，在宁远地方颇有名气，一时竟使会场变得紧张起来。这时，我走进会场并请求发言。我指出，和平解放将为解放事业特别是湘南人民的利益带来莫大的好处、这是愿为人民服务的各位前辈先生们最明智、最光荣的选择。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欢迎你们，人民会感谢你们的。”当我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欢迎时，会场变得活跃起来，王者兴等也相继作了拥护起义的发言。会后，欧冠碍于多年的老朋友之情，没有逮捕蒋鹏翥。欧先生终于决定起义了，对于一个长期在旧中国政府工作的他来讲，的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决定。

记得在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欧先生当着我的面给谢声溢打电话，敦促他随同起义，说：“我还不敢打游击，谁敢打游击？”并说省里已派人来到这里，可以保证起义后的安全和工作等。谢在电话里表示有身不由己的意思，未作肯定回答。后来听说谢被捕经过宁远时，跪在欧先生面前，后悔已来不及了。欧先生也以同样的方式警告过曹茂琮。

不知欧先生过去曾与成铁侠同志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以致使他和他的许多部下都表示不能让成来接收。我提到湖南有位蒋澍同志也是宁远人，大家都不认识他。可他们马上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派蒋澍同志来宁远，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条件。我当即向零陵军分区李猛同志写了汇报材料，并请求派蒋澍来宁远。我的汇报材料是由樊少雄师傅（宁远东门樊家人，原省公路局一个电工）送去零陵的，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11月1日，欧冠先生发出起义通电，通电湘南27个县市，要他们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不准放枪。因当时有线电报被桂军

破坏，延至5日才将起义通电发出。不久即收到长沙发来的由黄克诚、肖劲光、王首道、陈明仁四位首长署名的贺电等，可以说，欧先生此时对我才完全放心了。11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过驻宁远，我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久就离宁返长了。回长后，向省公安厅汇报了工作情况，他们对我这次湘南之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底，欧冠先生携眷来到长沙。会见了黄克诚、程潜、王首道、肖劲光、徐启文等，他们对欧冠率部起义表示赞许和鼓励。

衡 宝 战 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后，白崇禧在衡阳重新部署兵力。将他的主力部队张淦、徐启明、黄杰、鲁道源、刘嘉树等5个兵团11个军30个师共20余万人重点摆在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衡阳、郴县间铁路沿线，并将其精锐部队“钢七军”用于衡阳正面作为总预备队。妄图凭借湘江、洣水、永耒江、资水的天然屏障，东联广东的余汉谋，西接湘鄂西的宋希濂，组成一道所谓“湘粤联合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但解放军早已给白崇禧撒下了天罗地网：右路，四野十三兵团从湘黔边境向南猛扑、迂回，断桂军往云南、贵州的逃路；左路，二野由赣南直下广州，继而挥戈西向，于粤桂边境断其退路；中路，四野十二兵团象一把利剑直刺衡宝地区。10月6日深夜，白崇禧为保存实力，令全线撤退，四野十二兵团日夜兼程向南追击。10月8日晨，白崇禧仓惶离开衡阳飞往桂林。同日，我四十六军攻占衡阳。10月9日，一三五师在黄土铺全歼“钢七军”军部及直属队。10月10日，一一九师又在玉峰山歼白崇禧主力4个师。10月11日，一四五师解放邵阳。10月16日，衡宝战役结束。（朋 朋）

既不殖财亦不植党决以政绩以谢乡人

程氏在欢迎会致词

我（程潜）于本年三月间回到长沙一次，虽然仅住了三天，但是见了许多的老朋友、老同志，并且说了很多的话。今天到场的各位女士、各位代表，大概都曾见过听过的。我对于本省的一般的感想和意见，上次说得很多，各位想必还能记得，无容重复再说了。今天我以绥靖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的资格，再与各位相见。在这盛暑的时候多蒙各位盛大的欢迎，各位的热情流露愈多，我的不安愈盛，各位的希望愈大，我的责任感愈深。我不好用什么话表达我心处的感应，只好用将来的工作说明今日的意思罢了。

先从大局说起：国家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剿匪以后，元气大伤，到如今可说是民穷财尽了，但共匪好乱成性，毫不悔改，他们那种残忍暴戾的作用，不亡国灭种不止，这真是一个空前的浩劫！无论是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不能侥幸求免，要想免灾惟有拼命去救灾。我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翁，从事革命工作已经够了。革命五十多年，性命之理，政治之学，所得于古圣时贤的不算很少，智名事功在我看来如浮云一样，……只有勇往向前，决不后退一步。

（载1948年7月25日《湖南日报》）

对共党所提八项条件程主席发表意见

和平固为全国上下所企望

然索价甚高则交易难成

中共发表和谈条件后，引起此间一般强烈之反应，记者下午四时许，特访程兼主席询其观感，程氏哭谓：“对共党八项条件，本人实无甚批评。”沉思有顷，始以沉重态度谈称：

“此为共产党故作之难题，足见其无悔过之新与和谈的诚意。”旋反问记者观感如何，当告以一般意见，认共方现既有反应，虽条件过苛不失开启和谈之门，似仍有一般和谈之希望。程氏继谓：“和平既为今日全体人民的希望者，惟个人所见，共党所提条件，索价过高，意即原价不过价一元者，今叫价数以亿兆共计之，如此交易势难接近。”并谓：“共党一贯作法，今见诸所提前件，益排其绝不止於所标榜之经济革命，而谋根本否灭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来一个总清算。倘今日为渴求和平，不惜根本否灭我国五千年的重大代价，此则胥以人民之公意如何以为定，吾人此际似不宜多作主张。不过个人之意，深认今日社会上并存的不好的事，无疑地力予改革。例如共党条件所提清算官僚豪门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因为吾人所赞同，但历史上文化上所应保存的东西，仍应予以保留。总之，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其自身殆无独立的性格与意志，故根本无国家无民族的观念，其最后目的无非藉武力的威力以夺取政权，以遂其毁灭我国历史的企图，至所提和平条件，不过是继续拥兵倡乱而已。

（载1949年1月16日《湖南日报》）

对共党八项条件程主席表示态度

目前总统二十一日退休后，行政院孙科曾致电各省市市政府、各绥靖公署、各总司令部一电。昨日午后程主席已复电孙院长，对共党前所提八项条件表示态度（电文云）：“南京行政院孙院长科（密）。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指其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所谈起，二三两项是二而一者，宪法非不可修改者。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之标志，改编军队事如有必要，吾人不如更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全部接受。至如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承询、特覆、弟程潜巧。”

（载1949年1月23日《湖南日报》）

今日湖南应变的总方向

——程潜主席四月十一日发表书面谈话（摘录）

我们人民希望和平甚切，我更希望和平甚切。至于我内名为战犯之一，我不加辩白，我愿接受人民的公判，倘真认为我有战犯的罪行，虽碎尸万段亦所不辞。

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我不承认少数人以主人自居而能左右大多数人民的命运，更反对存心偏私不顾大众死活的人出卖湖南，我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於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於炮火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这是我的愿望，我相信这也是人民的要求。我为三千万人民服务，我希望在这安危所系的关头，大家努力，协同一致，满足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中 共 中 央 军 委
关于四野继续南进的方针的指示(摘录)

.....

二、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李默庵到香港已和我方接了头，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入我方。

.....

1949年6月2日

周恩来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
我方反美反蒋问题给乔木①电(摘录)

乔木：

（一）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周 恩 来

（1949年）6月2日

注：①乔木，即乔冠华

备 忘 录

潜（程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四十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政治。去年返湘以后，更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只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皆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莘莘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更为强。忻所幸迅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桂系大军退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著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蒋历年所卵翼之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来，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予转移，诚非易事。曾深思熟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系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唯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藉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威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惜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潮流不致阻抑。论者咸指责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惟以本省过

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形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壁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任建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极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著，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为融洽，惟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勾通人民情感与理解，藉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慰，匪可言宣。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持本省元气，实属当前唯一要务。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份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住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虽然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以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

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惟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菲薄，尚能协力维持地方治安，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二十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极少数顽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俟。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幸甚。此亦潜职责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

程 潜

（摘抄自中央档案馆，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给程潜电

颢云①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午支②

注①颢云，即程潜。 ②“午支”即7月4日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一)

(摘录) 1949年7月4日

(一)王首道、肖劲光三十日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彪、邓子恢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

(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

(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号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四)如程潜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五)李明灏已到否。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长沙作战的部署

(1949年7月10日)

林彪、邓子恢、肖克、赵尔陆：

(一) 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46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7军一个师已至莲花，48军一个师有向永新的消息。这些是防我陈庚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

(二) 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茶、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线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于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撤退。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维持安定与保存元气

程主席信心坚定如故

(本报讯) 据隔昨参加主席宴会的某参议员称：程兼主席对维持湖南安定与保留湖南元气的一贯心意与信念，在席间致辞中表露得仍很明朗而坚定。主席并以最沉痛的情绪郑重提出

保证：“我决不会做出完全牺牲湖南人民的事来！”渠于叙述其一年来施政之概要情形后，即无限感慨地说：“回到湖南后，我做了两场梦。第一场是拥护李代总统的和平运动，不遗余力地支持他这个政策，可是终为失败，到如今仍然是战争，一场和平的梦幻灭了；第二是去年湖南水灾那么严重，而且又面临战祸，这也是始未料及的事情！”程主席对目前省参议会之尴尬处境，表示诚恳之同情，对该会决定于八月一日召开大会一事，仅谓经费甚感困难，且国共军事形势已到箭在弦上之势，并无其他类似不赞成之意。

（载1949年7月12日 《中央日报》）

林邓肖赵^①关于我与程潜谈判情形给军委电

1949年7月17日

中央军委：

甲。我九日派人携毛主席给程潜信，已送到。刻接我派出干部来电如下：

十六日晨与程晤谈三小时，兹将其所提意见及行动步骤详述如后：

（一）程与陈于十五日晚会商，指挥该部已无问题。陈之一切由程全负责。

（二）程陈^②部现住湘西、益阳、湘潭、宁乡、湘乡、邵阳一线。

（三）白准备撤退时，由陈留长沙守卫。

（四）当白确定撤退计划宣布时，程为避免白之疑心，拟

注：①林邓肖赵，即林彪、邓子恢、肖克、赵尔陆。

②程陈，即程潜、陈明仁。 ③白，即白崇禧。

在口之先去湘西，到达后，即宣布脱离伪中央之指挥。

（五）在宣布脱离后，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俟我军整个解放湘省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此名义是否准用或用何名义，请速电示。

（六）当桂部遭受我们压力或双方反胶着状态时，即进行截击行动，配合我军作战。

（七）伪行政院副院长贾景德十四日来长，邀程去穗调解蒋李之间矛盾，程已婉绝。

乙，我们考虑可暂给予湖南人民自卫团名义，究以何种名义为宜，请中央考虑示复。

林邓肖赵

七月十七日二十三时半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二)

（摘录）1949年7月18日下午4时

（一）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

（二）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澧，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深固镇

静，不要恐慌。

（三）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阴、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岗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

陈代主席训词

22日上午九时在省府大礼堂召集各厅处留职人员训话：

“今天我可以明白而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等到那一天能安心工作的时候，自然有个打算。我有把握。长沙当然没有问题，要是没有把握，本人自然会把各位送到安全区域。……老实讲：如果我有决心守长沙，我敢说长沙什么时候都没有危险。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光凭个人的意气，使长沙市五十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的意气守长沙，就会变成四平街第二。那时守四平街是九个营，敌人拿三十多万人打，四十九天把四平街打光了。……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要使长沙市不能听到枪声。”

他表白：他只是暂时代理主席，一切都遵循颂公的指示及老百姓的需要去做。

（载1949年7月23日《湖南日报》）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三)

——同意对程陈之估计及我方所取对策(摘录)

1949年8月1日

(一)同意肖、王二十九日电对程潜、陈明仁之估计及我方所取对策。

(二)你们对程潜、陈明仁应作两种准备。(甲)在我军未占衡州、郴州、永州将白崇禧驱入广西之前，程、陈占领邵阳、武岗、芷江地区后面有退路不受威胁，很可能不会急于谈判改编及通电反蒋。(乙)早日谈判改编及通电反蒋。在程、陈采甲项态度时，你们不要和他们决裂，双方代表可时谈时止，直至我军占领衡、郴、永，那时有可能谈好。你们应于限期满后(五日至七日)，占领长沙、湘潭、益阳、宁乡、湘乡等五县(这五县是极富庶区域，为向湘南进军必需的基地)。然后休息渡过三伏，再向南进，占领衡、郴、永。留下邵阳、武岗、芷江等县给程、陈。大概要到那时，程、陈才会就范。甚至要待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压迫邵、武、芷(这三县亦是富庶区域)，他们才会就范，亦说不定。

(以丁略)

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程潜将军和人民站在一起

通电全国呼吁和平

指斥蒋介石独裁自利残民以逞

盼各秉政者翻然憬悟继续和谈

(本日将有两个爆炸性事件发表)

〔本报讯〕长沙发生了一个震撼整个世界的伟大事件，广州反动政权和残留在西南各省的反动势力，将在这伟大事件之前颤栗动摇、崩溃，加速地走向灭亡！昨天晚上八时，前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的发言人刘伯谦，在长沙市中央日报会客室内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出席各报的发行人、记者、编辑共计四十余人，热烘烘的挤满一堂，人们的心情是充满着惊喜和激荡的。刘氏即席首先宣读程潜主任对记者的问答如下：

问：主任何日来长，沿途情形如何？

答：我由邵阳到长沙是在三天以前，沿途情形很好。前天本市时代日报所载本人在途中被解放军俘虏的话，完全不正确，显系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以作继续散布谣言的准备。

问：主任对最近时局如何看法？主张如何？

答：我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没有变易，在四月二十一日和谈没有破裂、解放军还没有军事行动命令以前，我曾多次表示（见诸报端）我的主张，始终一贯的、彻底的、为人民迫切需要的真和平而努力。

问：主任最近对时局有何表示？

答：为着齐一步骤，发挥整体的力量，适应人民共同的要求，日内我会有所表示的。

问：今后主任的行动有何新的计划？

答：今后的行动应该是靠拢人民大众的行动起来。人民大众所需求的是真理，人民大众的方向是正确的，由思想的一致到行动的一致，我坚信未来新社会的创造一定顺利成功。

“答记者问”宣读毕，即当场散发程氏一日晚上八时发出致西南各省军政当局的通电一纸。原电如下：

“广州李代总统、阎院长，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重庆张主任、衡阳白长官、兰州马长官、马主席、广州薛主席，昆明卢主席、成都王主席、西康刘主席、贵阳谷主席、福州朱主席、赣州方主席、宁夏马主席、桂林黄主席、青海马主席、新疆鲍主席、长沙陈主席，广东省参议会、广西省参议会、四川省参议会、云南省参议会、贵州省参议会、福建省参议会、江西省参议会、甘肃省参议会、西康省参议会、青海省参议会、宁夏省参议会、新疆省参议会、湖南省参议会，香港黄季宽先生、章行严先生、贺贵严先生、刘恢先先生、刘为章先生、陈长（□）先生，长沙唐孟潇先生、仇亦山先生、曹籽谷先生，潜参加革命已历四十五年，早岁追随总理，入参机密，出掌兵戎，亲承明教，习闻大道。深知革命目的在求人民解放，其对象则为打倒专制独裁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侵略，以此揭之三民主义挽救中华；不意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当国二十余年，背弃总理遗教，惟务独揽大权，专己自利，姻亲私昵，贪黷成风，罗织飞罪，遍於全国。以致正人结舌，宵小盈庭，政治经济，日趋腐败，不惜皆亡之怨，初无罪己之辞，迹其所为，盖无一事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全国人民处于长期压迫之下，复经八年抗战，国家元气，铲削无遗。中共应民众之要求，起而抗

争，犹不知自为检讨，共图挽救，复凭持武力，假借外援，饰非作伪，徇私怙恶，数百万精锐之师，一旦崩溃，苟非见弃於民，何至败亡如此之速？李德邻先生代总国政，起而倡导和平，全国同声响应，潜依据民意，竭力赞同。行政院以中共和平条件征询各省意见，潜即复电主张全部接受，乃经代表磋谈之后，不征各省同意，遽予反对，惟逞私人意气，置全国人民利益於不顾。旬日之内，首都倾覆，师徒挠败，措置无能，古所未有，尚欲困守一隅，残民以逞，此而不忍，孰不可忍！湘省在抗战期间，负担最重，破坏最剧，连年水灾惨重，救死不遑，潜呼吁罔闻，维持无术，数月以来，神形交瘁，近闻共军南下，桂系军队复不战而退，麇集全湘，民众困于诛求，咸思自救，潜铎嫡余生，恭持省政，岂忍坐视地方蒙祸。久亦缄默，用是询于父老，系我袍泽，举人人心中之所欲言以陈于当世爱国者之前，尚望常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即恢复，国家命脉，不至中绝，人民生理，得以苟全，以为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翻然憬悟，立致祥和。粤、桂、川、康、滇、黔、甘、宁、青、新各省人民，求安厌乱，同此心理，务望一致惊呼，消此浩劫，慎毋再为反动宣传所误，甘自绝于和平康乐之途。潜毕生尽瘁革命，誓守总理遗教，为实现革命之三民主义而奋斗，谨陶至诚，告我同志。程潜，未东。”

刘氏并郑重宣布：今天正午，程主任将有两个具有爆炸性的电文发表，这电文将昭告全国和全世界：湖南已经和平解放了，湖南人民将接受一个翻天覆地的空前伟大局面！

（载1949年8月4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程潜为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

致毛、朱、林的电文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

（本省各军政机关）：

潜等业经未东①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暂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特电请查照（知照并转飭所属知照）。

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 潜

未江② 戌

（载1949年8月4日《小春秋》）

注①“未东”日，即8月1日

②“未江”日，即8月3日

林彪、邓子恢转程潜来电

中央：

兹将程潜来电转上，明予指示。

林邓 八月四日

附：程潜来电：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

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日来说服各部队长，默察军

心，知驟予转变殊非易事，必须略俟时日，乃可潜移默化。此时配合行动，在如何争取军心，如何安定军心，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其原第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司令部。暂时军政委员会为空洞名义，不设机关，亦无职权可行使，仅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由委员会推定派出。省政府移收会议略延时日，多则一月，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当前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至于上项权宜设置，为时甚暂，但期减少刺激，安定湘境军政干部心情，并进而争取西南各省。对于改革大计，实无阻碍。望见所及提请鉴谅之。希俱赐同意毋任感禱，并明复电。

程 潜

林、邓、肖、赓转李明灏等来电

军委：

李明灏、刘梦夕八月三日来电照转：

（一）当程潜收此报时为了说明内中意义及苦衷谨将其所提理由如下：

1、按照常例，必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然后行动，双方一致。惟湘事之进行，远在渡江之前，早与贵方不断接触，意见取得一致，以受白之压力，致未能表现，迄白离长则为时已迫，为取得军事行动时效，遂先采取行动。

2、因未经谈判，立即宣布脱离广州政府，已无根据谈判。在形式上必须经过谈判，否则必招投降之议，影响干部心情匪浅，即对于西南各省亦招误会，对争取西南工作当恐受影响。如必须经过谈判，临时有一临时机构，以为对象，此种情况实难避免。

3、所提临时措施均属空洞名义，实便于谈判及避免投降误会而矣。绝不妨碍贵方行动实施实权及各种工作进行。以上系所提理因。

(二)程本人对我方措施均无意见，惟陈个性刚强，对脸面问题非常注重。同时此次湘事之解决与应付桂系之压力，陈力最多，加之干部思想关系，此时打通其中困难，确是不少，况程一切又非依陈不可。

(三)根据以上理由及时对程陈之了解有以下两点意见：

(1)为使陈了解上级对他的态度起见，首长等最好与陈明仁速来电慰勉，并电毛主席在电报上予以鼓励。

(2)所提临时机构为湘事进行顺利，及争取宋部与西南各省关系甚大。如何？祁详为指示。

林邓肖赵

八月四日

程主任发表告湖南民众书

脱离广州政府驱逐白崇禧

各革命阶级一致联合起来

建立真正人民的民主政府

(本报专讯)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将军顷发表告湖南民众书，历述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背叛主义，出卖祖国，专制独裁，残害人民的种种事迹，并揭发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假和平运动为名，攘夺政权，搜括财务，压迫人民的狡猾变诈、阴险欺骗之丑态。最后宣布：长沙已经成立和平协议，脱离广

州政府，驱逐白崇禧。各革命阶级一致联合起来，成立真正人民的民主政府。兹录全文如后：

“多灾多难的湖南父老兄弟姊妹子女们！

我从去年七月回到本省，眼见地方凋敝，民力枯竭，贪污暴戾，正气消沉，不觉老泪纵横。鼓起当年革命的勇气，要为地方为国家起死回生，因此曾经陆续发布告土豪劣绅各书。那时候环境是很恶劣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反复叮咛，还不能完全道出我的苦心。自后我就以事实来启发，首先撤销戡乱委员会，拿办贪污的省田粮处长，裁撤各县上劣把持的自卫副总长；跟着减少中央征借粮食的半数，最后停止征兵，呼吁和平，公开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促成蒋介石的退位。

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追随总理孙中山先生最早且久，做过他的讲武学校的教育长（黄埔军官学校的前身，总理自为校长），做过他的军政部长。他的革命事业，我是亲见的，他的革命理论，我是亲闻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我因意见不合，置身事外八年之久；但为促成抗战之故，曾出任参谋总长，司令长官等职。我的才具虽是不长的，我的信仰却是很坚定的。我年近七十，何求于世？投机固所不屑，忘本尤所不忍。然而我明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甚至反对广州政府，反对蒋介石、李宗仁诸人的政权，并不是和他们有什么私怨，更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害打算。我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

一个革命的党，一个革命党的党员，其行动绝对不可离开主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针对中国的乱源而下的药。中国立国五千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最早，然而近百年来，衰弱不堪，几乎降为殖民地，那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我们要翻身，先要求得民族的独立。

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背叛主义，出卖祖国，专制独裁，聚敛资财，残害人民。

民族主义，是以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打倒帝国主义，才是民族主义的实现。试看南京政府二十年的外交，无时不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或竟勾结为恶。到今日日暮途穷，还在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好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

民权主义，是针对专制独裁的。总理逝世以后，党内全由蒋介石独裁。一流无能无耻的党棍子阿谀取容，把持党务，忠实党员，尽被排斥，党部化为衙门，党官充斥于城市。党员尚且脱节，何况民众？党内尚不民主，何况政府？又复醉心于法西斯，揣摩酷肖。军统、中统，特工遍徇，杀人如麻，残忍毒辣，集曹操、朱元璋、希特勒、莫索里尼之大成。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绝无自由。道路侧目，谁不寒心。

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孙先生曾亲口说过，并已笔之于书。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政策，其目的是要使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关系能够合理化，逐渐泯除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但在蒋政权卵翼之下，有裙带关系的、把持党务的、掌握军队的、割据地方的、管理财政金融的那一群穷小子，几年之间，莫不田连阡陌，富可敌国。资本集中了，豪门出现了，人民枯瘦了，民生主义束之高阁了。

我们信仰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官僚资本的。但政府所行所为，完全与主义背道而驰。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铺子，还不应该取缔吗？还值得我们流血流汗去维持他，拥护他吗？古今中外各国的政权，没有永久操在某一党派，某一集团的道理。所谓“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成功的尚且有退去之必要，不成功的，更应该早退快退，让贤

老能者来为人民好好服务。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领袖独裁，主义变质，政治腐败，人民痛苦。旧的封建意识未除，新的封建势力抬头，从南京流亡广州以后，更其不成东西。法币害人已够了，去年又以金元券欺骗人民，搜括民间黄金白银几万万两，秘密运到台湾，以供四大家族及其奴才挥霍逃亡之资。人民因金元券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政府既不要人民，也不要军队，只培植作为鹰犬的那些嫡系部队，其他一概不管。湖南境内驻扎六十万军队，最近数月从不公开发饷，连军粮都向人民强抢强借，弄得哭声动地，怨气冲天。这样不负责任，毫无办法的政府，还要压迫人民一齐跟他们走向坟墓里去。白崇禧口口声声要湖南空室孀野，这不是要逼迫三千万人死光吗？忍心害理，比黄巢、张献忠还要毒辣。

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假和平运动为名，攘夺政权，搜括民财，排除异己，较蒋介石更有过之。

这里，我们补充说明和平运动的经过，使得大家明瞭白崇禧的作风是一个标准小人、道地军阀、彻底的自私自利者，绝对没有主义和信用的。徐蚌会战以后，蒋介石的主力消灭了。那时候，白崇禧手握重兵，盘踞湖北、安徽两省，不但不去救援，并且乘机攘夺政权，逼迫蒋介石退位，好让李宗仁来假总统。我们明知李、白是不可信任的，但他们既以和平号召，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反对和平。况且和平本是我们湖南人民全体一致的愿望。因为抗战期间，本省牺牲最大，出兵达二百万人，出粮超过五千万石。三湘之间，敌骑蹂躏五十多县，所过之处烧杀虏掠，寸草不留。先贤先烈的公诚刚正的教泽深入人心，威武不屈，誓死抵抗。这种民族精神，可歌可泣，值得我们骄傲。但这种精神的代价太贵重了，地方的元气大伤了。抗战胜利结束，内战又连续打了三年多，双方死伤的湖南人又占了第一

位。这真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只要稍有转机，我们自然不能放弃，并且要多方促其实现。所以李、白呼吁和平，我们不问他的动机怎样，首先起来赞成。全省各界，莫不很热烈的发出停战讲和的呼声。这实在是人民的公意，良心的主张，并不是被人利用或自己别有所图。

我们是老老实实的，谁知道李、白却是鬼鬼祟祟的。他们那时所以主和，不过要借和平以倒蒋。蒋介石倒了，李宗仁上台了，和谈代表派出了，和平条件商量好了，忽然转变态度，拒绝签字，并且大擂战鼓，大弹总体战之旧调。凡是蒋介石前此所行所为，如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排除异己，搜括金钱，植党营私，反共媚外等等，李、白一一仿效，惟妙惟肖，甚至青出于兰，更有过之。由主和以至主战，李、白都是主角。翻手成云，复手为雨，极尽人间豺狼变诈阴险欺骗之丑态。根本错误，在于自私自利。他们以为主和可以取得各方之同情，夺取政权；主战又可以迎合台湾的心理，骗取金银外汇；更可以劫持地方人民，搜括财物。白崇禧在武汉以反共备战之名，榨取金钱及物资价值十亿，乃所劫物资运往广西的千余列车，沿途停放待运的，还有几万吨。湖北的膏血吸尽了，立即转其凶锋于湖南。误把湖南看作肥猪，又欲张其血口肆其饕餮，那一副豺狼贪饕的样子，令人见之欲呕。我为顾全大体，施行感化教育起见，尽量容忍，不与计较，希望他有觉悟的一天。所以自从今年四月以后，我就缄口结舌，未发一言。偶有应酬敷衍之词，无非力持镇静，以消戈矛。现在解放军大举南下，白崇禧狼狈逃窜，他所率广西军队窜扰湖南，而胁迫湘军在前线作战，无事则利权尽属于己，有事则艰难尽以付人。我们湖南人向来赴义恐后，决不规避义务。但义与不义之分，必须认识清楚。帮助残余封建，维持贪污集团的政权，那是最不义的，反之联合人民的武力，解放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才是大仁大义。

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湖南获得和平解放。

我对广州政府及白崇禧等，已经尽了最大的容忍，进了最后的忠告。我劝他们赶快放下屠刀，立即停战议和，切勿再以人民作为赌注，可是他们执迷不悟，定要同归于尽。其实他们的家小财产，早已寄顿在外国；战争失败的痛苦，受之者还是我们穷苦大众，糜烂的是我们的地方，死伤的是我们的骨肉。他们隔岸观火，无关痛痒。经大家长期检讨研究，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脱离广州政府

驱逐白崇禧

农工学兵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另建真正人民的民主政府

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籍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大家一向热诚要求和平，现在和平到了，大家应当拍掌欢迎。在湖南境内，桂系军队和蒋介石路线的某些反动分子，仍是和平的障碍，大家要起来肃清他，然后再把和平引向西南和西北，使全国迅速实现和平，永远根绝内战，一致在新的民主政府领导下，脚踏实地，从事新民主主义建设，把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理想彻底实现，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载1949年8月4日《国民日报》号外）

程潜发表告将士书

(本报讯)程潜将军昨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兹志全文如下。

告将士书

亲爱的将士们！

我们保卫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免于灭亡，我们曾经勇敢地热烈地为抗战而流血，八年抗战的吃苦和牺牲是值得的，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一九四五年的胜利以后，我们是为谁而武装，我们为谁的利益而内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不是矛盾，我们在苦海浮沉自苦苦人的生活，有没有价值，我们的思想准则是什么，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怎样？将士们！我们大家坦白地分析、检讨、反省，认识真理，判明方向，以果断代替犹疑，以行动表现决心，朝我们应当走的路走，选择我们应当干的，坚决地干！今天不容再怯弱，再怀疑，已经是时候了。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是针对中华民族所处环境，中国社会先天的缺点和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而立论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三大政策的决定都是以代表北伐初期的革命精神，但是由于独裁者蒋介石个人的私欲和新军阀的封建意识，背弃了孙先生的主张，由假革命到不革命，由不革命到反革命，终于向帝国主义投降。不惜吸吮人民的血液，屠杀无辜的同胞，饲养官僚政客，利用买办财阀，以法西斯残酷无人性的手段培养他的无能的卖国反动的政府，驱使几百万武装同胞，为他个人和一群帮凶们的利益而牺牲。他们早已离开了三民主义的立场，丧失了三民主义的精神，他们

是反三民主义者，他们是叛徒。我们要反对这班反三民主义者，我们要消灭这班叛徒，我们要很快地走入人民的阵营里，顺着具有三民主义真精神的新民主主义所指引的方向，本着孙先生三大政策的正确路线，勇往直前，为人民复仇，为和平而战斗。

将士们！我们要认清蒋介石反动派和封建团的军阀戴的是假冒伪善的面具，明白了他的本质，粉碎他们的歪曲理论和阴谋。如若我们还要盲目地为反动派的残余政府而战，那就是自杀。我们要马上跳出死亡之谷，改向新生，不要走那自杀杀人之路，否认反动政府的一切，树立新民主主义的信念，跟着广大的人民武装，一同讨伐人民之敌，替新社会奠和平基石，为人民大众而斗争，为神圣的中国人民解放立功。

代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官僚资本、豪绅家族利益的反动派同封建剥削的桂系集团，多年来的欺压掠夺，残害人民，有血写成的债责，有泪眼含恨的悲歌，多少人吃人的事实，多少饱尝苦难和凌辱的兄弟姊妹们，在热望着我们奋勇无畏地驱逐这群恶魔。将士们！我们自己本身和大多数善良的人民何以会遭受不平等的穷困的生活之累，谁使我们陷入一个经济生机断绝，父母妻子不能顾，本身不能保的境地？反动派的头子们，财富惊人，骄奢淫佚。而我们，尤其是士兵的非人生活，苦不堪言。这种痛苦是反动派给我们的，我们要抓住这批敌人，惩办清算，彻底毁灭了他们！

蒋介石和桂系反动卖国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的凶恶下流的丑象，比袁世凯卖国的罪行还要凶。将士们！若是我们独立自主的观念还存在，若是我们还有些许人类自尊心和正义感，我们就必要打倒这厚颜无耻，勾结帝国主义者，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动卖国政府，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世界和平。

就中国人民共同一致的需求言，就世界人类爱好和平进步的愿望言，中国人民解放的任务是迫切的、是神圣的。

将士们！我们马上要行动了，从今天起，我们已成为人民的武力，我们这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武力，现在要指向人民的敌人。在这个时候我具体指示四项，凡我勇敢智慧的部属，立即切实遵照：一、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坚决反对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美帝国资本主义；二、坚决拥护和平主张，反对一切挑拨阴谋；三、听候指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配合行动；四、站在人民的立场，严格遵守纪律，绝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程 潜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十二时

（载1949年8月5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陈 明 仁 发 表 文 告

表示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

深盼各方万众一心群起响应

（本报讯）省主席陈明仁顷发表文告，告全省各级官员、暨所属军师官兵、及全省人民，表示即日起脱离广州政府，绝对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望各安岗位，勿自惊扰。兹志原电如次：

“各专员公署转各县政府、各机关、团体、学校、报馆及全省群众：十余年来，吾国抗战戡乱，国家元气损伤，沦为万劫不复。惟抗战抵御外侮，当为天经地义。而戡乱阋墙之斗，实属师出无名。人民饱经锋镝，创巨痛深，渴望和平，全国一

致。政府当局，亦曾数度蓄谋及此，卒惜中途变化，功败垂成，方今人民奄奄待毙，已至油尽灯枯，准情酌理，实难再战。况政府措施种种，悉与三民主义相违，致令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挂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势将土崩瓦解，不足以系人心。尝思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革命为顺天应人之义举，似此自相残杀，徒使祸国殃民，主义不行，更何革命之有。明仁忝膺省政，服务桑梓，既爱国，复爱乡土，实不忍以三千之生灵，徇个人之权位，掷乾坤于孤注，为万世之罪人。本良心主张，倡导和平，弭兵罢战。自即日起，脱离广州政府，参加人民解放阵线，服膺新民主主义，重振革命精神。现与人民，共庆新生，为我国家稍效棉力。深信义旗一揭，定荷全国同情。吾湘民性淳朴，向义素不后人，近年久苦苛政，积困待舒，自更能万众一心，群起响应。为此通电晓示，务希各守岗位，各安生业，切勿自相惊扰，将来全局底定，咸与维新，必有以告慰于我全省同胞者也。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印）。”

（载1949年8月5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

（新华社汉口十五日电）（迟到）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等在长沙举行起义后，于八月五日发表通电如下：①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安彭副总司令，南京刘司令员、邓政委，汉口林司令员、罗政委、邓政委，上海陈司令员、饶政委：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

注：①应为8月4日。《东北日报》发表时误为8月5日。

②杨文榜，《东北日报》未刊杨文榜之名，但经查证起义通电手稿中列有杨文榜之名。

生的遗教，以致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谁料蒋与奸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利，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既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灾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复，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谎言空空，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扭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特此布闻，诸维察照。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熊新民，军长谷炳奎、彭 鐸、杜 鼎，副军长李精一、方宝凡、汤季楠、鲍志鸿、杨 馨、文于一、刘光宇，师长张用斌、夏日长、杨文榜②，刘 熏浩、康 朴、卫轶

青、曾 京、张诚文，湖南全省绥靖副总司令刘 兴、李 觉、王劲修、成 刚，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保安师长何允恺；周笃恭、张际泰、丁 廉、颜 梧，宪兵团长姜和羸。

（载1949年8月18日《东北日报》）

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号召

完成全国解放事业

唐生智等通电西南西北

顺天应人迅采一致行动

（本报讯）本省耆宿及各界人士为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解放之伟大号召，特于昨日发出通电，吁请西南、西北各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各湘籍将领、湖南各区警备司令、各专员、县长，迅即采取一致行动，以完成全国解放事业。其原电如下：

国贼蒋中正，出卖革命，背叛主义，专政二十余年，剥削民膏，培养豪门，虐待士兵，大伤元气，植党营私，祸国殃民，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封建余孽，巧夺政权，反蒋而袭其故智，自利自私，主和而食其诺言，孤狡狐猾。综观蒋桂之所行所为，实为反动集团之一体两面，此贼不除，国难未已。顷读程颂云先生通电，呼吁和平，谴责蒋桂，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蒋桂冥顽不灵，负隅肆虐，湘中军民愤激，义帜高悬，毅然脱离广州政府，而与人民解放军合作，顺天应人，利群克己，导和平解放之先路，后统

一建设之契机，凡有血气，莫不赞叹，惜乎行之不早耳。湘人在蒋中正魔掌玩弄之中，廿年生意垂绝，近在白崇禧铁蹄蹂躏之下百余日，压迫敲诈，如火熨热，群盗伺恶相济，与民为仇。今幸军民同心，自行解放，而暹罗西南各省，尚被劫持，以痛苦之经验，起深切之同情，敢请各省贤达，奋起自决，慎毋为反宣传所惑而徘徊瞻顾，延长痛苦。湘人在革命军中，赴义向不后人。自灭清以来，倒袁、北伐、抗战无役不从，牺牲最大。今当进入真正人民民主时代，自应精诚团结，为西南各省作后援，自救救人，愿共努力。唐生智、周震鳞、仇整、曹典球、龙致瑞、陈长簇、彭国钧、曹孟其、彭汉怀、方鼎英、黄山、徐崇立、唐伯球、席楚湘、曹伯闻、左学谦、冯天柱、周颢、周鳌山、彭一湖、程一中、程屋龄、雷 颢、岳 森、易鼎新、汪士楷、陈裕新、凌兆尧、方叔章、周用吾、周继寅、栗成、周 翰、李佳白、刘岳厚、谢慕韩、邓介松、肖作霖、李觉、李维城、胡善恒、胡 迈、宋仁楚、段梦晖、唐生明、周君南、杨任严、刘公武、杨盛嘉、杨宙康、陈 兴、蔡杞材、陈云章、陈芸田、黄 雍、李序族、温汰沫、蒋 峨、张严佛、李祖阴、邓飞黄、肖 训、仇颢夫、程 燮、程 炯、龙毓宝、戴朝震、周翊襄、甘复初、汤继成、蒋绍葵、石晶川、高伯融、何家鹏、石冲白、刘伯谦、罗益增、唐葵宁、李维国、唐哲明、许松圃、荆芳冈、龙历初、汪 皓、苏本善、罗 湘、黄寅戒、陈粹芳、文斌、赵可夫、钟德耀、李人士、周乃古、张福云、张以藩、陈采夫、周昭惜、杨惜宜、王慎武、劳启祥、栗显扬、黄英博、何 畏、周匡年。

（载1949年8月6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湘全省在乡军官会拥护程潜将军通电

该会推定邀解代表

〔本报讯〕湖南全省在乡军官会筹备委员会，为欢迎人民解放军，特推定该会常务委员孙常钧、黄雍、黄鹤、张元福、王认曲、李骧骐、王梦、郭芳梧、周翰、姚潮达、杨一舜等十一人为代表，参加欢迎。又该会为拥护程颂公支电，特发表宣言如下：贤明伟大的革命元勋程颂公领导本省三千万人民，并号召全国，为了发扬光大革命历史，毅然与中国共产党暨人民解放军携手并进。我们今后得早日参与人类的新生活，实令我们万分鼓舞奋发。我们于颂公的正确领导，及其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绝对竭诚拥护与服膺。

我们都是反革命政权下，被遗弃或自动放下武器的军人。我们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多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及国民革命北伐的战役出过力，全数在为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拼过命。我们的初衷，原是要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行三民主义，不料抗日胜利后，少数反革命的野心家，为了一己的权利之私，甘心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残民以逞。我们不愿国家与人民沦于万劫不复之境，更不愿做少数人升官发财残害人民的工具，才相率解甲归田。

我们深深地知道，革命者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们过去曾盲目地从事假革命，白流了血汗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也辜负了自己。现在于极端惭愧之余，今后原本服膺三民主义的绝对信心，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导下，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昨死今生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全体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共同致力建设人民民主共和的新中国，谨此宣言。（载1949年8月6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

颂云、子良先生勋鉴：八月三日电悉，为对抗广州伪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面，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子良将军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的省政府主席，及临时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之移交，亦可嗣后进行。我们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我军已接受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凡对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两先生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毛泽东 朱 德 八月五日

陈 明 仁 就 任 通 电

特急，沅陵行署、各警备司令、各专员、各县市长：

明仁依据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之推定，于本日在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除分电外，仰各照常供职，并转飭所属一体知照为要！

主席 陈明仁

府秘，未微①，印

注：①“未微”，即8月5日。

中 共 中 央 军 委
对程潜的方针指示(四)
(1949年8月5日)

林彪、邓子恢、肖克、赵尔陆，并告肖劲光、王首道：

四日电及转来李明灏、程潜两电均悉，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中共中央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五)(摘录)

1949年8月6日

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

(一)(略)

(二)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以便利用这种报纸，登载我们的消息及文件，分化程潜、陈明仁系统中的党政军给进步分子以武器，教育和争取多数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

(三)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即进行物色，并拟定名单电告。

(四)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

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潜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

（五）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林彪、罗荣恒、邓子恢复电程潜、陈明仁

颂云、子良先生勋鉴：支电诵悉，此次先生等毅然率部脱离广州伪府，义旗高举，薄海同钦，影响所及，蒋李匪类，将益穷蹙一隅，束手待毙。而湖南人民，亦庶几元气少损，痛苦减轻，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为安定军心，维持秩序，便利谈判，进行交接，号召各方，对抗伪府，由先生等组成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此时此地，实属必要措施。除已由我军接管之地区外，湖南其他各地皆有赖此两机构行使职权，进行安抚民心，维持秩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继续进军，人民解放事业之继续推进，来日方长，各事当可共谋解决，从容协商。临电神驰，敬致祝贺。林彪、罗荣恒、邓子恢。八月六日。

（载1949年8月8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程主委与解放军和协代表团

书告湘省起义官兵

〔本报讯〕本省和平解放，老幼腾欢，惟同胞中尚有少数不明国内外大势及此次湘省与解放军合作之实情者，易为外间谣诼所煽惑。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潜将军，顷书告一九七及二三二各师全体官兵，对此次本省和平解放的政治意义，阐述甚详。又第四野战军及华中军区和平协商代表团，亦有致湖南省参加起义的武装部队全体将士慰问书发表，对起义官兵，勉慰有加。兹并将原文志次，

程主任告全体官兵书

×××全体官兵均鉴：此次湘省和平解放业已圆满完成，其目的，在脱离贪污残暴的广州政府，与中共在平等的立场，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其动机及经过，已备详于东日通电及告全体将士与全体民众之文告中，谅早获悉。此闻同胞之中，尚有不明瞭国内外大势及此次湘省与解放军合作之实情者，兹不惮烦琐，愿再申述之：查此次湘省之解放，完全于平等立场，我们的政治机构是标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我的名义实施解放职权。我们的军队，是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仍然是陈司令官明仁统制，并不是外间错误的宣传一样，说什么“放下武器”或者“投降”，更也不是“向傅作义看齐”，因为我们的和平解放，与傅作义当日的情况是有分别的。他那时的情况，是被围后被动解放的，我们是自发自动的。贵部相随我很久，在革命的过程中，已有光荣的历史，我不但不会领导你们向错误道路上走，还希望你们更能发扬光大。深望一体了解此种情形，切勿为外间谣诼所煽惑，力持镇定，严明军风纪，振奋精神，为革命大业而努力。光明

的前途，已经普照湖湘，其他西南西北各省，即将风起云涌，群相响应。现在解放军已进入长沙，军纪良好，军民安堵如故，彼此开诚合作，相亲相爱，有如手足，可为事实见证。特并附及，顺询

戎祺

程 潜 手启八月十日

解放军和平协商代表团致起义官兵书

参加起义的全体将士弟兄们：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渡长江、进入南方各省、最后歼灭蒋、李、白残余反动势力、争取全国解放之际，湖南全省国民党军队，在程颂云、陈子良两将军领导下毅然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举行光荣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反动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使湖南全省获得和平解放，缩短了战争时间，减少了军民痛苦。对于这种光荣的正义行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平协商代表团副代表林彪将军表示欢迎，并向程、陈两将军及所部全体将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参加起义的全体将士们：你们这种正义的行动是非常光荣的，对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功劳，这不但使你们自己从今以后站到人民方面来，得到了光明的前途，并将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欢迎，由于你们的光荣义举和湖南和平解放，而给予蒋、李、白反动集团以严重打击，给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作战以很大的帮助，同时也给至今尚在蒋、李、白反动派强迫下进一步绝望挣扎的国民党官兵、以及西南各省指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湖南虽以获得和平解放，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十

分艰巨的，今后人民解放军还将继续胜利前进，湖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还必须肃清，因此我们热诚的希望你们在程、陈两位将军和人民解放军统一指挥下，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政治认识，坚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战的意志，加强纪律，团结自己，爱护人民，把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结合的武力，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湖南，解放全国，为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湖南、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和平协商代表团
谨启

一九四九年八月七日

（载1949年8月12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陈明仁急电毛主席

请转令接收人员即日接收
以便提早成立湘人民政府

〔本报讯〕湘省府临时主席陈明仁，于昨急电北平毛主席，请早成立湖南人民政府，兹志其电文如次：急，北平主席毛、总司令朱钧鑒：明仁依据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之推定，于本月五日在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以维过渡时期政务；惟湖南人民获庆解放以前，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多不适用，政务进行，深感困难；拟请转令接收人员，即日接收，以便提早成立湖南人民政府。谨电呈察核，敬乞示遵！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陈明仁叩。府秘，未文①，印。

（载1949年8月13日《中央日报》长沙版）

注：“未文”，即8月12日

毛主席答陈明仁电

长沙湖南省政府陈主席明仁 勋鉴：未文电敬悉，湖南举义，退迓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有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籍维秩序，并科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毛泽东 朱德 未元①印

（载1949年8月16日《新湖南报》）

注：①“未元”，即8月13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复程潜、陈明仁

（新华社北平十六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电复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等电文如下：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八月五日①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

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载1949年8月18日《东北日报》）

注：①应为八月四日。

程、陈复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新华社北平廿七日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八月十六日电敬悉。辱荷藻饰渐感交并。承示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潜等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自解放军代表团进驻长沙以来，推诚相处，军民欢腾，秩序安宁。至于军政机构，正次第重组，部队正作初步整编，进行均甚顺利，凡此差可告慰。来日艰巨，潜等菲陋，当秉临深履薄之诚。尚盼随时指示为禱。

程 潜 陈明仁

八月十九日

（载1949年8月29日《东北日报》）

程潜将军离汉北上前
答复记者七项问题（摘录）
（1949年9月11日《新湖南报》）

〔本报汉口专讯〕程潜将军于四日下午离汉北上前，以书面答复武汉新闻界所提七项问题如下：

问：湖南的和平解放有哪些因素促成，在目前各方人士民主合作中，将军有哪些观感和希望？

答：湖南和平解放的促成，主因由于人民厌战情绪强烈和解放军的军事进展顺利。本人回湘以后，坚决反独裁、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是本人反蒋反桂，主张和平，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基础。这些主张，迅速获得人民的支持。我们试分析北伐和抗日的成功，都是由于人民的拥护，以及与中共合作。胜利后，蒋介石违反了民意，把政协撕毁，他的党政军无一不与群众脱离，而又和中共决裂，所以有今日的惨败，这是很显然的历史教训。本人这次的和平主张完全根据人民的意旨，与中共合作，所以迅速获得和平解放。目前湖南各方人士的民主合作非常融洽，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厌恶战乱，厌恶专制，至为强烈，期望安定，期望革新，至为迫切，这是一股洪流，谁也不敢阻遏；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的主张恰好迎合了这股洪流，如之中共干部态度谦虚宽和，作风笃实谨慎，更增加了社会的好感和信念。我相信这种民主合作，只有日益增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使湖南全省获得彻底安定，进而建设一个崭新的湖南。

问：湖南人民，在将军率部起义前后，怎样支援这个正义的行动？目前湖南和长沙的一般情况如何？

答：今年年初起，我便先后废止了征兵、征粮，这两件事，使我与人民之间构成了密切的关系。期间李、白虚伪地“倡导和平”，湖南首先响应，拥护真和平。这时全省人民，到处活跃，籍此时机，宣露中共和解放区的真象，揭露过去特务的种种谣言，在这一两个月，便奠定了和平解放的基础。不久李、白的虚伪和平揭穿了，白崇禧率部入湘，对于和平，极表破坏压制之能事，这是李、白只能自欺，不能再欺湘人了。湘人巍然在高压之下，仍不断主张和平。例如新闻界一致消极抵制白崇禧，产业界一致逃避白崇禧的破坏和迁移的压迫，社会人士，除二三败类甘心为虎作伥外，也团结一致为和平的后盾，白崇禧的青年工作团，始终组织不起来，便是一个例证。这次湖南的和平解放，完全是湖南人民的成就，本人不过是群众里面的一个代表。目前湖南一般情况，以长沙最好，解放后的秩序是一样的安定，未放一枪，便解放了。解放后，大家狂欢了，大家都带着除旧布新的心情，一致努力。长沙以外，解放了的区域，也很迅速地恢复了秩序，有些地方，还有散匪，不久皆可肃清。至于还没有解放的地方，一面忍受桂匪的蹂躏，一面散匪甚多，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秋季了，大军即将进击，全湘的解放，也很快了。

问：我们听说，在将军率部起义前，蒋桂匪帮，曾多方阻挠破坏，将军是如何排除障碍，毅然顺利起义的？

答：湖南在蒋介石统治之下达二十年，到处是他的爪牙，湖南是广西的门户，桂军出入必经湖南，所以湖南是受两重压迫的。但是蒋桂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多少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来部署和平工作。因为桂系的压迫，使我们更容易做些说服工作，或者溯以驱逐一些顽固分子。同时我们也利用了蒋系原有力量，限制了桂系施展，在这样矛盾之下，人民的和平力量，更得了生长的机会，虽蒋桂匪帮，多方阻挠破坏，使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

特别邀请代表陈明仁发言

(1949年9月25日)

本届会议所提出的三大草案，经过筹备会反复研讨，确实能够针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一句不合实际的高调。不但是保护中国人民利益的大宪章，而且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政治文献，我表示衷心的赞成和拥护。尤其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军事制度，乃为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一种行动轨范，我以军人身份更要竭诚拥护，并为其全部实现而努力。

新的中国虽然诞生，但还有若干地区急切等待解放，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解放战争还需要继续发展。在残余的反动派里面，有些是罪魁祸首，罪在不赦，也有些是中了反动宣传的毒素，或若是被威力挟持，没有适当机会可以自拔。对于这后面一类的人，为了保存元气，我们应该本着毛主席宽大为怀的意旨，去唤醒他们，挽救他们，引导他们向人民靠拢，走向光明的道路。

我是一个军人，我是黄埔第一期的一个学生，本来是以卫国救民为天职的。二十多年来，参加北伐，参加抗日，打了不少硬仗。不料蒋介石在抗日胜利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他欺骗我们，驱使我到东北与解放军作战，我仍旧也和胜利以前一样，替他出过不少死力。但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渐渐发觉参加这种内战，徒然为蒋介石私人作工具，完全

我们经过不少的曲折，但人民的力量是和平的广泛而坚强的基础，任何诡谋毒计，无法摧毁。

(以下从略)

违反人民利益，心理上总是耿耿不安。嗣后和各方面接触较多，了解进步，对于这种内战，更属越加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苦闷，最后终于觉悟过来。觉得我们国家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军人应该靠拢人民，不能再作某一个人的工具。只是当时虽有这种心理，而限于环境困难，无法实际行动。适逢今年二月回到长沙，程潜将军主张和平，我便决心在他的领导之下，拥护和平主张、脱离反动政府。这时，我之拥护和平，主要目的还只是因为看见人民痛苦，实在不堪再战，而对中共的真象还不十分明白，甚至还听到许多歪曲宣传，是以令人害怕。但我想只要人民真心获得解放，将来解放之后我个人便遭受中共的严厉惩处，也是甘心情愿的。

因为后来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相当雄厚，对我监视防范非常严密。我一方面要暗中策动和平运动，一方面又要忍辱负重，虚与周旋，时机未熟，不能轻举妄动。直到八月初战事形势紧张，白军开始南撤，我们才得在长沙起义。那时蒋介石只知道程潜将军主张和平，还不明白我的态度。在起义前几天，他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部十万死守长沙，不惜全军牺牲，否则便向湘西撤退。并且还要我在撤退之先，把长沙那些主张和平的人士一律处决，以图泄愤。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了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的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学生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而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当时，白崇禧也派专机送来一个命令，叫我派兵包围程潜

将军所住的水陆州，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殊不知程将军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大道，他的行为乃是极其正确，要实行什么兵谏？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动确是需要给他一番兵谏的，我的起义即为兵谏的有力表示，可惜他冥顽不灵，任你如何兵谏也都是枉然的。

这次长沙解放，我们只是服从我们湖南人民爱好和平的公共意志，但求能拯救人民，实行真正和平，并不需要什么条件，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签订和平条款。我们与解放军接触以后，发现彼此一切都是为人民，觉得只要有这个共同的认识便已足够，何必要商订什么形式上的和平条款呢？如果象蒋介石过去那样不讲信义，那么就是千言万语也是无用的。

但是，在起义前，我对中共真象，确实不很明白。直到解放军进驻长沙后，才确实瞭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中共和解放军对我们起义军多方爱护，多方帮助，犹如兄弟手足一样，一切措施，都极其公平。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共产党一桩不合理的事。我多年在蒋政权之下，徘徊惶惑，到现在才如大梦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来。在黑暗中挣扎过多少年的我，一旦获得光明，可以大步迈进，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尤其来到北平，目击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士聚集一堂，那样谐和，那样振奋，那样勤谨朴素，确是生平所未见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大团结，这是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拿来肃清残余反动力量，拿来抵御外侮，拿来建设新中国，都是绰有余裕的。诚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过去我在他（蒋介石）的欺骗之下，我替他们打了不少的硬仗，这是我的一种错误，也可说是一种对人民应该担负的罪过。现在我已站在人民方面来了，一切服从人民，在人民政权指挥之下，在贤明的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我相信能

发挥我的勇气，贯彻我们来参加革命的初衷。今后，打两广、打川康滇黔、打台湾，我一定更要追随解放军各位前辈之后拼命去打，务使残余反动势力完全崩溃，战争彻底胜利。同时我愿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

（载1949年9月27日《东北日报》）

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给林彪的指示

（1949年10月5日）

林彪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

（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办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我认为陈明仁这点意见是合理的。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

（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

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以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潜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六）程潜、李明瀚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叫他们回去时和你们谈一下，此点亦请你们加以注意。

（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而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在三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

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①

注：①酉微，即10月5日

北 京 归 来（摘录）

本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许，记者会见了参加人民政协返回长沙的陈明仁将军，与记者畅谈此次到京会见毛主席、参加人民政协的经过，并谈到归途探看王耀武、杜聿明的情形。陈将军首先追述了长沙和平解放的情形：“四月间（应为二月间），当我回到湖南来时，许多老友都问我湖南怎么办？我当时即回答：湖南老百姓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今天，我是这样做了，符合了人民的要求，结束了跟从蒋介石二十多年的黑暗道路，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朝着光明大道上走来了。”陈将军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追述长沙和平解放前长时期与白匪崇禧之间的种种曲折的经过。而当解放军逼近长沙市，陈将军即以快刀斩乱麻的气魄，高举义旗，接受了共产党的和平条款，率领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创造了长沙式的和平解放。在这之前，蒋、白匪一直是毫不怀疑地信赖着他。

“假如有一点蛛丝马迹的显露，那就将一切落空了。”陈将军把两手一伸说：“甚至个人的安全亦大有可虞！”

陈将军取出一厚摺的电文和信件，其中有蒋、白匪的急电手令和亲笔书信。令陈将军“坚决扫除和平空气”、“肃清和平分子”。甚至要对程潜将军采取“断然处置”、“大义灭亲”和“出於兵谏在所不惜”。

“叫我肃清和平分子，那即是叫我血洗湖南”。陈将军指着这些电文和手令愤慨沉重地说：“因为湖南老百姓都是和平分子，我陈明仁是湖南人，湖南是我祖先坟墓的所在地，我能为了蒋介石而用人民的血来染红湖南这片土地吗？我自然不能执行这反人民乱命。我尽量拖延，而一俟时机成熟，解放军到了长沙，我就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反革命的蒋介石。不错，我今天是反革命眼中的‘叛逆’，但是我实际是顺从了人民的意志。是的，我是黄埔学生，但当初孙中山办黄埔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革命。我进黄埔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为的是参加革命。蒋介石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什么时候不革命我们就可以打倒他。好，今天我要打倒他，因为谁都知道他不仅不革命，而且早已在反革命。”

谈话进行了两小时之后，陈将军提议休息几分钟。此时，他取了十几张照片出来，其中有在北京毛主席陪游天坛及散步时的留影。记者随即探询在北京的情形。陈将军说：他到北京之后，九月十九日即接到毛主席邀请到北京饭店会晤的电话。见面时毛主席对长沙的和平解放极感欣愉。当谈到部队问题时，毛主席曾给了明确指示，认为要把这久受反动教育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人民的武装，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而耐心的从思想改造做起。陈将军谈到毛主席对起义部队的关怀与爱护时说：“毛主席胸怀之宽大只有海洋可比。毛主席很亲切地对我说：‘只管放心，有饭，我们应先给起义弟兄吃，有衣，先给起义弟兄穿，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所乐于执行的团结友军政策。’你们看，我在国民党里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人、一件事能与这种伟大的胸怀相比呢？国民党有各派各系，党内之党，派中之派，什么嫡系杂牌，乱七八糟。而在革命队伍中，大家是一个平等统一的整体。”（以下从略）

（载1949年10月26日《新湖南报》）

毛泽东给林彪、邓子恢、湖南省委的电报（摘录）

（1949年10月31日）

林彪、子恢、湖南省委，并告刘、邓，

（一）程潜、程星龄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二）陈明仁返湘后表现如何，陈明仁兵团的改造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程潜等一行已到汉口否？（三）请湖南、湖北两省委各将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众运动工作向中央做一次报告。（四）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外重要人物。……（五）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毛泽东

10月31日

湖南和平解放大事记

1948年

6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于7月到长沙就任。

8月4日 行政院会议通过：特派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黄杰、刘膺古、唐式遵为副主任。

9月 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决定成立统战工作组，余志宏任组长，开展争取程潜及其部下的工作。

秋 程星龄应中共湖南省工委之邀，自台湾回到长沙。

10月下旬 余志宏组织进步人士程星龄、马子谷，邀请刘岳厚、蒋昆、唐文璧等在长沙王家菜园举行时事座谈会，每周一次，一直延续到12月。

11月19日 方叔章出面邀请李达、伍慧农、肖遵頌、肖作霖、邓介松和程星龄、余志宏等，在桃子湖方叔章家聚会，漫谈时事，分析形势。李达说：“程颂公应替湖南人着想，内战不能再打了，湖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是出路。”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李达谈话的内容转达给程潜，使他大受影响。次年4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秘密赴北平，程潜赠送旅费500元，并委托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投向中共的决心。

12月25日 新华社公布陕北权威人士提出的包括程潜在内的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

12月31日晚 程潜与程星龄密谈。程潜明确表示，决心脱离蒋介石政权，投向中共，并委托程星龄作为他的代表同中共地下党联系。

1949年

1月1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发表。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同日 蒋介石发表元旦求和声明，提出愿与共产党商讨恢复和平方法，但又提出所谓“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的条件。

1月5日 湖南省参议会发出呼吁和平通电。

1月14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的八项和谈条件，并愿意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自此，省工委即把争取程潜的工作转到推动他响应我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

1月17日 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孙科电程潜，征询对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意见。

1月18日 程潜召集省会军、政负责人开会，征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意见。

1月21日 蒋介石宣告“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宣告代行总统职权。

1月22日 程潜复电孙科，对中共所提和谈条件明确表示，除对第一项有疑虑外，其余七项均“可全部接受”。为促进和谈，程潜下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释放政治犯等。同时，通过程星龄向省工委书记周礼表示愿走和平道路。

1月 由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转移到长沙的共产党员成立中共长沙特别支部，书记刘靖波。

2月18日 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第二十九、七十一军从武汉到湖南编训。兵团司令部设长沙，陈明仁兼任长沙绥署副主任。陈明仁接见记者时表示：要重振革命精神，挽回军事颓势。同时向程潜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拥护和平。

2月 省工委部署开展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一是由余志宏联系一兵团经理处主任温汰沫、一处处长李君九；二是由涂西涛联系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及张严佛。不久，陈明仁确定温汰沫、李君九作为他同中共湖南地下党联系的代表。

2月 省工委通过李达、程星龄协助，将程潜长子程博洪从上海请回长沙，促其父子谈心，消除程潜对“惩办战犯”的疑虑。

2月28日 程潜离长沙去南京同李宗仁、白崇禧商讨同中共和谈问题。行前，程潜回答记者时说：“和平极有希望，中共具有和平诚意。”

3月5日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强调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遵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省工委加紧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

3月6日 章上钊从上海到南京同程潜作了较长时间谈话，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程潜期望殷切，不仅会不咎既往，而且会受到礼遇的态度。

3月 唐星任长沙 署副主任。

3月 陈采夫筹组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成立。

4月5日晚 程潜召集军政负责人谈话，对学生游行，政府不应予阻拦，所有军宪警出动维持治安秩序，绝对禁止携带武器，不能与学生借故发生冲突。**6日晚**，他又令飭军宪警严禁阻拦干涉，徒步维持秩序。

4月6日 刘人奎率省保安独立团1100多人在浏阳县永安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营垒，接受共产党指挥。省工委派罗振坤到该部，整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独立支队，任命刘人奎为支队司令员，胡慎行为政治委员。

4月7日 长沙市大、中学生10000余人召开“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争取真和平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程潜与学生一道为争取真正的和平而奋斗。对此，程潜表示：（一）学生声援“四一”惨案，寄予无限同情；（二）克尽个人力量争取和平；（三）游行运动，决不阻挠，并予以安全保障。

4月10日 程潜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要“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

4月15日 中共公布《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20，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

4月18日 在湖南省政府扩大会议上，程潜表示不能附和某些人“继续盲目作战的打算”，“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民族留一线生机”。

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时宣布，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可以照最后修正案的大意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4月下旬 余志宏面见程潜，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欢迎程潜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并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三项要求。

5月2日 “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成立，唐生智为主任

委员，陈渠珍、仇鳌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为总干事。程潜规定各县、市都要建立人民自救委员会，负责编练地方武装，实行“自保自救”。该组织后为白崇禧强令解散。

5月5日 国民党广州政府明令免去邓介松的湖南省政府委员职，任命陈明仁为省政府委员。与此同时，又免去肖作霖兼任的长沙警备区司令，任命陈明仁为长沙警备区司令。

5月6日 白崇禧率部溃退湖南。当日，白崇禧晤程潜、唐生智，斥湘鄂桂局部和平“谣言”。

5月18日 白崇禧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华中作战，企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

5月 程潜派唐鸿烈作为他的代表秘密去香港找共产党，转达他的意向。下旬，乔冠华在港接见唐鸿烈，听取关于程潜情况的报告。此后唐鸿烈几次去香港，向乔冠华通报程潜方面的情况。

6月2日 周恩来电告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6月 程潜派程星龄赴香港，邀请刘斐回湘。程星龄在香港还分别会见了乔冠华、章士钊。章士钊托程星龄带回他给程潜的信。信中赞扬了毛泽东，并转达了毛泽东对程潜起义期望甚殷，还表明中共对陈明仁是既往不咎的，只要他站过来，还要重用他。

6月 中央派周竹安在长沙建立“迎解秘密电台”和“策反情报小组”。

6月6日 白崇禧在省政府扩大会议上对程潜的和平倾向倍加污辱、讽刺和斥责，说谋取“局部和平”就是“自取灭亡”。8日，又迫令程潜召开专员、县长座谈会，白崇禧亲自布置贯彻他的“总动员”、“总体战”的反革命措施，实行

“空室清野”等。

6月3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收到程潜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程潜明确表示：“本反蒋、反桂系、反内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

7月1日 白崇禧调动7个师22个团的兵力，开始对湘中游击队进行“围剿”。21日，白崇禧离开长沙，陈明仁即下令停止“围剿”。

7月4日 毛泽东复电程潜，对他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并告诉他，已派李明灏至汉口，请他派人到汉口洽商。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肖劲光：中央“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

7月初 余志宏面见陈明仁，代表省工委对陈明仁的意愿表示欢迎，并申明我党是绝对不会纠缠他的旧账的，对他的行动绝对保密。

7月7日 在白崇禧威逼下，湖南成立“反共宣传委员会”。

7月8日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梦夕和李明灏委派的陈大襄携毛泽东给程潜的信，今日自汉口出发，11日秘密来到长沙，直接同程潜接触，并在市内筹建秘密电台。

7月10日 程潜派刘纯正作为他的代表去汉口，向四野领导人转达程潜请求人民解放军从速入湘。

同日 人民解放军发起湘赣战役，兵分三路，向湖南进军。

7月14日 广州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乘专机来长沙“迎接”程潜赴穗“共商国家大计”，程潜婉辞谢绝。

7月16日 刘梦夕与程潜晤谈。程潜提出在宣布脱离广州政府后，部队暂时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等要求。

7月18日 中央军委电示林彪、邓子恢：中央认为16日晨程潜同四野代表所谈诸点甚好，均可照办，同意程、陈起义后可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并指示派出代表与程潜代表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具体事宜。

同日 白崇禧自广州返回长沙，迫令程潜将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交陈明仁“代理”。

7月21日 程潜被迫出走邵阳，同走的有省保安副司令彭杰如等人，拟在邵阳设立临时指挥部。同日，白崇禧离长沙赴衡阳。

7月22日 陈明仁以代理省政府主席身份召集省政府各厅处留职人员训话：“我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受损失，总要使长沙市不能听到枪声。”

同日 人民解放军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自武汉到达平江县城。刘纯正随代表团到平江后，即返回长沙。

7月23日 陈明仁先后召集第一兵团各军、师长会谈，明确表示：现在政府无能，军队力量薄弱，不能再战；程潜、刘斐、李明灏同情共党，决遵循其主张，决心实行局部和平，与共党签订协定。

7月25日 湘阴县宣告和平解放。

7月27日 陈明仁派程星龄、李君九在欧阳方陪同下前往平江，邀请李明灏先来长沙，商谈具体事宜。

7月29日 程潜自邵阳返回长沙。同日，李明灏也从平江到达长沙，即分别会见了程潜和陈明仁。双方各自介绍了有关情况，初步交换了和平起义的有关问题。

7月30日 广州政府行政院会议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任命陈明仁为总司令。

同日 安乡县县长吴铁铮宣告安乡脱离国民党政权，自行和平解放。

月底，长沙人民治安临时指挥部成立。姜和瀛、刘鸣球分任正副指挥，涂西涛任政委。

8月1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程潜、陈明仁应作可能不急于和我们谈判改编及通电反蒋和早日谈判改编及通电反蒋两种准备。明确指示，应在五至七日限期内，占领长沙、湘潭、益阳、宁乡、湘乡等五县。

同日 程潜发出致西南各省军政当局通电，表明对中共会谈八项条件“主张全部接受”之态度。

同日 广州政府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从广州飞抵长沙。

8月2日 陈明仁下令第一兵团及保安部队开始撤出长沙市内及交通要道，于3日撤退完毕。

8月3日，程潜和李明灏、刘梦夕分别致电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邓子恢。当日晚，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及林彪，并告本省各军政机关：“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委员，陈明仁任临时省政府主席并兼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同时，陈明仁派军事代表前往长沙县春华山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驻地，洽商接管长沙具体事宜。

同日 沅江、益阳和平解放。

同日 长沙市各群众团体发起组织成立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统一领导全市迎接解放的工作。

8月4日 程潜、陈明仁、唐星、彭杰如、李觉等30多位国民党将领正式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8月5日 湖南耆宿和各界人士唐生智等104人，黄克等140名全省在湘军官分别通电拥护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参加人民解放事业。

同日 广州政府通缉程潜，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程潜等人党籍。

同日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同意程潜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陈明仁任临时省政府主席及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同日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举行入城式，列队进入长沙市内。长沙市民10余万人出城8里之外迎接，夹道欢迎。

同日 广州政府给陈明仁以“撤职缉办”处分，任命黄杰为所谓“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8月6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并指出：“湖南军政委员会、湖南省政府应成为统一战线临时过渡机构。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

同日晚 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入城。在东电渡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金明说：“人民解放军愿与湖南3000万人民共同建设新湖南。”

8月8日 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与湖南地方和谈代表团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就湖南省政权机构和起义部队改编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几次会谈，就正式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湖南临时省政府和改编起义部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8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成立，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陈明仁、韩先楚，副政委唐天际、

刘道生、金明。

8月16日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及全体起义将士，对他们的起义深表祝贺，并希望他们“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8月19日 程潜、陈明仁电复毛泽东、朱德，表示：“潜等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同日 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肖劲光，副主任陈明仁、王首道。

8月中旬 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约77000余人移驻浏阳整编。整编后的建制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辖3个军、9个师。自11月1日起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12月1日，在浏阳县城举行兵团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代表中央军委向部队授予军旗和军印。第二次整编后，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政治部主任方正平。兵团辖2个军6个师。五十二军军长王劲修，副政委杨树根；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副政委王振乾。全兵团共约37000余人，列入第四野战军建制。

8月20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王首道、肖劲光、金明、高文华、周礼为省委常委，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25日，南下的原中共湖南省委和原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举行会师大会，庆祝新的湖南省委成立。

8月24日 湖南临时省政府成立，陈明仁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

8月29日 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程潜任主任委

员，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肖劲光、王首道、唐生智、陈明仁、仇鳌、金明、唐星、唐天际、李明灏、周礼、袁任远为委员，李明灏兼任秘书长。

8月31日 程潜、李明灏应邀离长沙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同赴北平的有程星龄等。

9月7日抵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100多人前往车站欢迎。

9月8日 陈明仁应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日到达北平时，在车站受到聂荣臻、罗瑞卿等的欢迎。程潜、陈明仁先后到达北平后，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宴请。

9月16日 组成“支援二野迎送委员会”。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程星龄（因仇鳌应邀未到，补为特邀代表）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出席了会议。程潜在9月21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陈明仁在9月25日的全体会议上发了言。在这次会议上，程潜、陈明仁、李明灏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程潜还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9月23日 晚上，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诚、李明灏、刘斐、陈明仁……程星龄等26人。在宴会上，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诸人举行起义，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主席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0月1日 程潜、陈明仁等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本刊曾发表过的湖南解放 史料篇目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 (程星龄)	(12.14)
奉命去长沙促成程潜起义 (李明灏)	(12.51)
我的武汉之行 (刘纯正)	(12.66)
赴春华山迎解记 (罗文浪)	(12.71)
追随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 (潘培学)	(12.77)
跟随程潜起义琐记 (朱明章)	(12.80)
回忆程潜起义前后二三事 (杨敏先)	(12.85)
我参加湖南起义的活动 (李 觉)	(12.91)
湖南起义亲历记 (肖作霖)	(12.106)
<u>我所知道的湖南起义经过</u> (邓介松)	(12.124)
关于浏阳县王某被杀的订正 (陈新明)	(14.239)
长沙和平解放的片断回忆 (周武彝)	(12.147)
跟随唐生智投向人民 (张度珂)	(12.152)
赞襄陈明仁起义的回忆 (李君九)	(12.156)
第一兵团长沙起义经过 (文于一)	(12.169)
第一兵团起义前后 (黄克虎)	(12.184)
追随陈明仁起义的片断回忆 (陈粹劳)	(12.196)
关于陈明仁的几件事 (程 杰)	(12.208)
✓ <u>湖南和平解放的一个侧面</u> (刘公武)	(12.212)

注：括号内第一个数字是辑数，第二个数字是页数。

关于长沙市和平自救运动的补志 (陈伯勋)	(14.238)
我参加湖南和平解放的回忆 (陈芸田)	(12.223)
湖南解放前夕新桂系的一些活动 (苏民)	(12.234)
我在长沙解放前夕的复壁藏兵 (龙伯坚)	(12.241)
蒋军第二三二师长沙起义记 (康朴 张镜白)	(13.1)
第六十三师邵阳起义前后 (汤季楠)	(13.11)
新七军湘南起义经过 (曹茂琮)	(13.24)
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经过 (程杰)	(13.36)
宪兵第十团起义始末 (姜和瀛 孟文楷)	(13.58)
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活动纪要 (罗文浪)	(13.74)
回忆长沙空军起义 (蔡晋年)	(13.82)
党指引我走上光明的道路 (牟忆学)	(13.89)
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些情况 (李昊)	(13.100)
对《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些情况》的两点 更正 (李昊)	(14.241)
长沙绥署迁驻邵阳纪实 (马培荪)	(13.118)
参与湖南和平起义的回忆 (彭杰如)	(13.125)
湖南保安第一师起义前后 (何元恺)	(13.137)
参加湖南起义的回忆 (张际泰)	(13.145)
湖南保安第七团起义经过 (何正凡)	(13.154)
我在浏阳率部起义前后 (刘人奎)	(13.164)
关于抢运交警总队仓库军用物资的质疑 (严振世)	(14.241)
湖南和平解放的点滴回忆 (陈立漠)	(13.173)
从黑暗走向光明 (瞿波平)	(13.176)
我去益阳迎接解放的回忆 (蔡杞材)	(13.180)
我在湘南起义始末 (欧冠)	(13.197)
回忆常德起义迎解 (熊壮猷)	(13.202)

新宁和平解放经过	(黄君石、徐君虎)	(13.209)
株洲事件始末	(张先正)	(13.217)
湖南和平起义回忆	(唐生明)	(13.226)
湖南和平运动鳞爪	(姚渐逵)	(13.264)
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	(郭翼青)	(13.277)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补述	(程星龄)	(18.145)
国民党三一四师积极准备起义及被击溃 的真相	(祝 凯)	(18.177)
我送信给程潜将军	(陈大寰)	(12.59)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整编经过	(唐天际)	(19.15)
参加整编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的 回忆	(钟明彪)	(19.36)
唐生智参与湖南起义侧记	(霍福光)	(13.281)
湖南和平运动片断回忆	(陈云章)	(13.244)
回忆父亲刘岳厚	(刘笃平)	(24.214)
补充刘岳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点滴事迹	(傅白芦)	(16.227)
关于我在起义后叛逃问题的几点订正	(熊新民)	(16.232)
一九四九年冬黄杰入越纪实	(老 兵)	(24.62)
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胜利	(金 明)	(12.1)
回忆长沙和平解放	(唐天际)	(12.7)
回顾湖南和平解放	(周 里)	(19.1)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的余志宏同志	(李文锦)	(12.248)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一事的订正	(刘笃平)	(13.287)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同志的问题	(李文锦)	(14.242)

奉命赴解放区递送重要机密件经过(黄人凌)	(13.271)
解放前夕的片断回忆 (凌敏猷)	(18.165)
回忆湖南起义时的秘密电台 (郑挹梅)	(18.165)
<u>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前在湖南的活动</u>	
(钱去非、龚业隆、周荣光)	(25.1)
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民盟省委文史委)	(25.21)
对《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一文的 一点补充(刘文炳)	(25.230)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 (钱去非、唐耀晖)	(25.39)
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各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民建省委文史办)	(25.54)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地下斗争(刘寿祺)	(14.1)
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的回忆 (张立武)	(14.33)
奉命赴华中局汇报的经过 (刘禄铨)	(14.43)
地下斗争的一个据点——长沙市立补习 学校(刘梦华)	(14.48)
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市地下党的斗争 (沈立人)	(14.56)
解放战争时期邵阳地下斗争的回顾(叶 苓)	(19.140)
解放战争时期攸县地下党的斗争(尹辉等)	(14.166)
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始末(刘晴波)	(14.82)
湖南经世学会和公务员工协会 (肖 规)	(14.103)
岳阳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 (陈平凡等)	(14.174)
回忆锡矿山的护矿迎解斗争 (颜述之)	(19.117)
解放前夕湖南海员工人进行的护船保产 斗争(黄曦龄)	(19.134)
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 (孟树德)	(14.115)

对《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一文 的订正和补充（孟树德）	（16.235）
我所知道的新化两次解放（刘道源）	（19.102）
武冈解放的点滴回忆（李守义）	（19.114）
解放湘南（刘亚球）	（25.62）
对《解放湘南》一文的订正意见 （郭明龙）	（34.197）
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的湘南游击斗争略忆 （刘国安）	（25.70）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的 建立与斗争（谷子元、何大群）	（25.95）
建立湘南游击司令部直属六中队（蔡新民）	（25.124）
湘南人民行动支队始末记（罗立德）	（25.136）
“湘游一纵”回忆录（赵琦等）	（22.233）
湘中一支队的战斗历程（陈明）	（14.179）
参加湘中一支队活动的片断回忆（李伏波）	（14.208）
湘中一支队第一大队的建立（毛际寿）	（25.148）
湘中一支队第三团地下斗争概况（封岐山）	（30.97）
浏阳起义前后（成立湘中一支队浏阳 独立团），（王绳祖）	（30.103）
《浏阳起义前后》一文首句失实（王兴刚）	（34.201）
湘中二支队始末（谢德明）	（30.77）
坚持敌后斗争的湘中二支队第三团（莫新春）	（14.216）
关于湘中二支队第三团的一点补正（莫新春）	（16.232）
湘中第三支队第三团述略（李致中）	（14.228）
湘中总队五支队一团队二三事（衡山县政协）	（25.91）
湘中地下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张生力）	（25.151）
回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湛鸿章）	（25.182）

湘东纵队回忆（邹继衍、谭源育）	（25.189）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的始末	
（胡耀福、陈新明）	（25.203）
参加组建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回忆（言乃克）	（24.32）
记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十师和师长焦达梯	
（刘逸秋）	（25.218）
接管湖南省财政厅的片断回忆（欧阳迁）	（19.44）
解放初期湖南教育事业接管经过（刘寿祺）	（19.53）
接管湘潭（杨第甫）	（18.151）
回忆对湘潭财经的接管（杨 恺）	（19.97）
平江接管前后的回忆（梁书文）	（19.92）
挥戈南下 解放岳阳（郑酉年）	（19.71）
南下湘北 接管益阳（郭清文）	（19.77）
接管宁乡史事片断（周德民）	（19.109）
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沈醉）	（18.191）
保密局湖南站始末（黄康永）	（32.102）
回忆47军在湘西剿匪（晏福生）	（27.20）
湘西政局变迁的回顾（石玉湘）	（27.119）
1949年至1950年湖南剿匪概述	
（黄远炽 王吉云）	（27.1）
回顾湘西剿匪（袁福生）	（27.36）
解放江垭战役的回忆（李先荣）	（27.80）
规劝湘鄂川黔边区“九路军”投诚	
（杨昌禄）	（27.97）
我在翟伯阶部十余年的一些经历	
（瞿波平）	（27.104）
回忆长沙和平解放（唐天际）	（12.7）
<u>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胜利</u> （全 明）	（12.1）

湖南和平谈判

1949年8月8日，湖南和平谈判会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段楚贤（新化矿业资本家）私宅地下室举行第一次会议。

中共方面的代表有：金明（首席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政委）、唐天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政委）、袁任远（临时省政府副主席）、解沛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参谋长）、李明灏（新政协主席团代表）。

湖南方面的代表有：唐星（首席代表，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代表程潜）、熊新民（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代表陈明仁）、刘云楷（原国民党第一百军参谋长，代表陈明仁）、唐生明（原总统府中将参军，代表唐生智）、刘公武（原省民政厅长）。因熊新民、刘云楷于8月6日逃走，程潜、陈明仁改派彭杰如（原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原绥靖副总司令）为代表。第一次会议由刘伯谦担任记录，因解放军方面不同意刘伯谦参加会议，故程潜改派毛注青任纪录。

双方在举行第一次会议后，会址即迁至衣铺街乐嘉巷唐生明寓所继续举行。经双方商定，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一个兵团，番号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集中在浏阳、醴陵一带整训。成立临时湖南省政府，陈明仁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设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陈明仁、金明、唐天际、袁任远、周里、仇鳌、唐星、李明灏为委员，李明灏兼秘书长。这些问题，在商谈中一致达成协议，报经党中央核准后执行。

（朋 鹏）

